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3

一九六四年



比学赶帮运动是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法.....	孙 孺 (1)
再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张江明 (7)
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高 钻 (15)
学习态度、目的和方法 (学术评论)	路修远 (19)

——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点感想

关于农产量抽样调查方法的商榷.....	祖延安 庆 华 (23)
关于粮食产量抽样调查方法问题的探讨	许 隆 (31)

文
摘

在农业生产中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孙凌云 (37)
---------------------	------------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阶级矛盾的产物	杨荣国 (40)
略论农民起义的政权问题	关履权 (51)
美帝国主义对广东教育事业侵略简史	黄廷柱 (56)

短
与
论

科学家和社会主义战士	丘谷间 (64)
——学习马克思治学的革命精神	
一定要在基本功上过得硬	鍾 夏 (66)

评周谷城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论	毛 军 (68)
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	王季思 (73)

潮州方言词考源.....	李新魁 (91)
--------------	------------

改造山坑低产田的主要措施及其经济效益	酆国基 (103)
(广东省清远县南冲公社白芒大队的调查)	

动
态

广东教育学会举行第三届年会 (6)	
广东省经济学界探讨农产量抽样调查的理论问题 (55)	
讨论祖国医学阴阳学说的哲学问题的一些论点 (63)	
文学教学工作座谈重新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问题 (102)	
广东经济学界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问题 (110)	

比学赶帮运动是贯彻执行 总路綫的一个重要方法

孙 孺

去年以来，首先在我国工业战綫上开展起来的“比学赶帮”运动，已經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所謂更广泛，就是这个运动已經从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之間，从工业部門扩展到农业、交通运输、商业、科学文化事业等所有国民經济部門，从少数城市扩展到全国各个地区，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所謂更加深入，就是已經从单項經济技术指标的对比发展到多項經济技术指标的对比，发展到企业經营管理水平的对比，发展到各部門工作之間的对比，进而发展到政治思想工作的对比、个人革命化的对比。特别是在号召学习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先进經驗和学习大庆精神以来，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已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热潮，成为群众性的經济运动和政治思想运动。

比学赶帮运动，是我們党领导全体人民群众，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設方針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不断革命、不断进步的革命化的方法，是解决怎样才能鼓足干劲、力爭上游，怎样才能达到多快好省的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比学赶帮运动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建設成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方法，也就是說，它是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們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具有极为深刻的、丰富的內容。它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在建設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創造性的高度的重視。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貫认为，社会主义建設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自觉的事业，不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就不可能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曾經指出：社会主义生活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群众性运动；群众性的生气勃勃的創造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他說，这种“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們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們对这种

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他认为，这是一条“最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①毛泽东同志也一再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在我们中国，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不能认为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②

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号召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提高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把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出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要把他们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他们就能发挥伟大的力量，干出翻天覆地的事业来。

为了将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组织起来，使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党开展了各种运动，采取了各种方法，取得了不少效果。同时，在开展各种群众运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当前的比学赶帮运动，正是上述各种群众运动的提高和发展，是更加完备的劳动竞赛形式，是一个更好地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组织起来加以发扬的有效方法。

比学赶帮运动之所以是能够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创造精神，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真正成为有广大群众自觉地参加的、规模巨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因为它具有比以往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更完善、更全面的特点。它表现在：

（一）比学赶帮运动能使每个劳动者都知道，从自己承担的工作任务出发，应当从那里鼓干劲，向那里争上游。我们都知道，由于社会主义消灭了对群众的奴役，因而才有可能开辟真正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坦途。社会主义竞赛同资本主义的竞争是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斯大林曾指出，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则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因此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而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使落后者赶上先进者以达到普遍的提高。这就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情。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参加工作，使他们能够在这种工作中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天才。”③比学赶帮运动是在竞赛中不仅发挥个别先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31卷，第452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8页。

进者的本领和天才，而更主要的是发挥广大劳动群众每个人的本领和天才，使每个人都能大显身手。在运动中树立的个人、单位或地区的先进标兵，不是表明高不可攀，而是通过这个榜样，使后进的个人、单位、地区向先进的比较各方面的差距，学习先进的经验，定出赶先进的具体指标，又通过先进方面的帮助，这样就使得后进的个人、单位或地区比有对象，学有榜样，赶有指标，自己应当从那里去鼓干劲，向那里争上游，并提高后进方面的信心，认识到不仅先进的个人、单位、地区做得到，而且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地区都能够做到，每个人都有大显身手的可能和机会，从而吸引了真正的大多数劳动者来参加工作，发挥每个人的革命和劳动热情。

(二)比学赶帮运动，紧紧抓住了“人的因素第一”的精神。在比的过程中，不仅比各项经济指标，比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比思想，比政治。在树立先进单位、先进人物榜样时，不仅说明它们做得怎样好，更主要的是总结为什么做得好。因为每个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之所以做得更好，主要不是由于物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它们具有自觉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的集体观点，处处以国家的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和劳动；它们具有艰苦奋斗、不为困难所屈服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具有把革命热情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作风。只有具有这种可贵的革命的自觉精神，才能在物质条件差不多或相同的条件下，创造出先进的事迹。因此，比思想、比政治应当放到第一位。也就是说，地区、单位、个人改变为先进，主要的关键在于确立这种革命精神，使它们自觉地提高思想，将后进地想觉悟。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就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比学赶帮运动的过程中，许多职工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千差距，万差距，归根到底是思想上的差距。”从这里他们就认识到，只有政治思想的革命化，才能做到企业和个人工作的革命化。所以，比学赶帮运动大大促进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提高了自觉性，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的创造精神。

(三)这个运动的更突出的特点，是有意識有领导地提倡先进帮后进，无私地帮助别人共产主义风格。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把他们企业的内部组织和技术成就看作商业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就是在工人与工人之间，为了保持自己的劳动力的出卖价格，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技术、技能保守秘密，为自己留下一手，不把“绝招”告诉别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消除了这种由于竞争而产生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观念，使得每个企业、个人都有可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给别人，使后进赶上先进，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已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每个企业每个人的生产搞得好，都同自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只有共同提高，才能使社会的和每个劳动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大的满足。

比学赶帮运动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大大发扬了先进地区、单位、人物的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发扬了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无私帮助别人的精神，使后进地区、单位和个人能迅速赶上先进。同时，还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教育广大劳动群众，使他们知道先进中还有薄弱环节，后进中也有积极因素，在先进帮助后进的过程中，不是单纯

地帮助，而是互相学习，可以使到先进的求得更加先进，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在后进学先进、赶先进的过程中，克服各种思想障碍，看到自己的可能赶上先进的前途。这就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要求，通过比学赶帮运动，不断地解决了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动员起来，就是要达到这样目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要进行得多又快又好又省，中心问题是一个速度问题。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不求高速度，就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也就无需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尽可能的最高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用缓慢的速度来建设？这不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的方针问题。因为我国人民的革命虽然胜利了，但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经济上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①在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改变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贫穷和落后的面貌。同时，在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和它的各色各样的代理人在捣乱。所以，无论从国内范围看或从国际范围看，都要求用尽可能快的最高速度来加快建设，把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尽快地都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轨道上去，才能迅速地彻底地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贫穷和落后，才能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用尽可能快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将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因此，毫无疑问，我们党采取的是前一种方针而不是后一种方针。所以，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精神。

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政权如何去解决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呢？那就是要不断地、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面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作一些探索。

通过比学赶帮运动，可以使一个企业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改进劳动组织，这些都归结为一点：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体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增加生产设备、采用生产力更高的新机器以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程度。另一种方法是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提高劳动者的纪律性、工作技能、效率和改善劳动组织。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当前的比学赶帮运动，则是着重于利用后一种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8页。

方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办法。因为比学赶帮运动是在解决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中来迅速地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

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从生产上、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它集中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比较起来，总是存在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三种状态。用什么标准来划分这三种状态呢？是以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以生产同样产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来做标准。所谓中间状态，就是它的劳动生产率处于一般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即它消耗的劳动时间大致是等于一般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谓先进状态，是它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一般的社会平均水平，即它消耗的劳动少于一般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所谓落后状态则相反，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一般的社会平均水平，即它消耗的劳动多于一般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从全社会来说的。在某一地区、某一单位来说，先进的，其劳动消耗未必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样，落后的也未必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别又是相对的。

解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抓两头，带中间”，也就是两点带面的方法。在事物的三种状态中，先进和落后这两头，是事物的对立面。比学赶帮就是找出这两头互相转化的条件。一手抓住先进的一头，总结经验、树立样板；一手抓住落后的一头，同先进的比各种技术经济指标的差距、比企业管理的差距。差距找到了，后进的就学，先进的帮，然后将先进的经验和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使它转化为本身内在的因素，就使后进的赶上先进。两头一动，中间也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这样，就能将中间的和落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原来先进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变为一般的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一个企业内，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结果就是整个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结果就是整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就使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新的差距又会产生，通过不断的比学赶帮，不断地把先进的生产水平迅速变成全社会的生产水平，这样循环不断地上升，就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决于许多事情。马克思曾说：“劳动的生产力，由许多种事情决定，其中有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发展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数量和效力，以及各种自然状况。”^①这就是说，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调整和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合理使用劳动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有计划地、合理地利用生产资料；有计划地培养技术力量，不断地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等。在这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当中，根本途径是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因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可以创造出先进的机器、工具，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更广泛、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资料，等等。为了开展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11页。

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必須充分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比學趕幫運動，正如上面所說的，是調動勞動群眾積極性、創造性的好辦法。在比學趕幫運動的基礎上，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就可以把群眾的革命熱情引導到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上來，解決發展生產的關鍵問題，把革命熱情和科學精神結合起來，把革命精神和現代技術結合起來。

大家知道，人是生產力中最主要的因素。社會主義制度大大促進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但是，向自然界開戰，是不能離開物質條件的。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是要善於改變和創造物質條件，要善於巧妙地利用物質條件，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有時，物質條件相同或大体相同，而勞動生產率却有高低，這就是由於在人的主觀條件上存在着差距。開展比學趕幫運動，就有可能消滅這些差距。物質條件差的，通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也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落后面貌，迎頭趕上。開展比學趕幫運動，無論對提高勞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說，對改變落后的生產條件、創造較先進的生產條件來說，都是一個好辦法。它能使生產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得到高度的結合。

總起來說，開展比學趕幫運動，一方面，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人与人的關係得到進一步的改進和完善，充分發揮了勞動群眾的革命熱情和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另一方面，它又充分發揮了生產力中的人的要素的作用，更有效地利用物質因素，使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這樣，就能更好地貫徹執行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的要求。

廣東教育學會舉行第三屆年會

廣東教育學會於四——五月間舉行第三屆年會。參加年會活動的有高等院校的教育系、科教師，中小學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行政部門的同志等，共達三百多人。

提交這次年會的論文，共有三十二篇，其中大部分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總結實際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探討青少年學生階級教育問題的文章，此外，還有一些德育心理和教育史方面的論文。

這次年會，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着重探討了有關學生的階級教育問題，同時，就資產階級“愛的教育”與“母愛”問題進行了討論批判。此外，還組織了有關的教育學教師、各科教學法教師以及優秀的中學教師，就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問題舉行了座談。在學生階級教育問題的討論中，與會的同志對階級教育在德育以至全面發展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並且就抓活思想、因材施教、感性与理性、認識與行動等方面，來探討學生階級教育的理論聯繫實際問題以及階級教育的經常化問題。在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座談中，同志們密切結合當前學校教育工作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在如何改進教學方法，減輕學生負擔，提高教學質量方面，暢談了自己的體會；並一致肯定了要以郭興福教學方法的革命精神來改革學校的教學工作，更好地培養堅強的革命後代。

通過年會，檢閱了廣東教育學界1968年來的研究成果，交流了經驗，對廣東教育科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起了促進的作用。（梁）

再談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

張 江 明

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包括着許多方面的內容。要弄清這個問題，需要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在《論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一文（載于《學術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已就階級分析方法的一些問題作了初步的說明。在這裡，擬就階級立場和階級分析的關係問題，提出一些淺見，以作引玉之磚，共同探討。

明確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是進行階級分析的首要前提。在階級社會里，每一個人都是作為階級的一分子而存在，都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的。

所謂階級立場，就是人們立足于哪個階級的基礎之上，用哪個階級的思想、觀點分析問題，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來說話、做事，替哪個階級打主意。階級立場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是決定人們對事物的看法和進行階級分析的出發點。不同階級的人，有着不同的階級利益。立足于某個階級，就會從這個階級的利益出發來看待事物。凡是從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如果沒有從根本上由原來階級的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仍然堅持其原來的立場，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而奮鬥。即使他們在口頭上表示要為無產階級服務，但實際上總是有意無意地、極其頑強地表現着他們原有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利益。

階級立場支配着人們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站在那一個階級的立場，就會說那個階級的話，以那個階級的思想為指導，為它的利益而服務。雖然有的人可能并不自覺到這一點，甚至不承認自己有什麼立場，但在實際上卻代表特定階級來辦事。站在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立場的人，絕不會說無產階級的好話，不會贊成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鬥爭，從他們的口里放射出來的必然是各種各樣污蔑革命的毒箭。在他們看來，推翻反动階級的統治、實行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實現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這樣天經地義的革命行動，却是“大逆不道”，而他們這些剝削者，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敲骨吸髓，以及在他們被打倒以後進行反革命復辟，夢想恢復被奪去的“天堂”，却是“理所當然”的。這是站在反动階級立場上所發出來的聲音。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則完全不是這樣。無產階級認為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要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獲得解放，必須經過革命的道路，推翻反动階級的統治，才能達到。在無產階級看來，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都是應該消滅的。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就

是要在人类社会中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以及最后地彻底消灭一切阶级。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等，这些是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的重要步骤，是好得很的事情（在完成这些步骤以后，还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镇压反动阶级的阴谋复辟和反革命活动，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从根本上保证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发出的真理之声。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反映了两个根本不同的阶级立场。由于阶级立场的对立，因而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以及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的看法，就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立的观点。

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他们看问题的是非标准不同，爱恨也不同。因此，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既没有共同的思想，也没有共同的语言。立场不同，看法便不同，决定处理事物的方针也就根本不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决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必然会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决定处理问题的态度。

阶级立场是认识事物的社会基础，也是阶级分析的基础。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必须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要认清阶级斗争的各种现象和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加不能不站稳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必然地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要认识这个规律，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才有可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受它的狭隘阶级利益的限制，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它们如果承认人类社会必然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话，这就等于宣布自己的灭亡。这是它们誓死反对的。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它的阶级特性所限制，不可能有远大的眼光和科学的预见看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过程。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如果发生立场的错误，就会敌我不分，认敌为友，丧失革命立场，犯根本性的错误。

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除了阶级立场之外，还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的思想方法存在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只是看见这一个方面，看不见另一个方面，不能全面地客观地认识事物，即使我们的阶级立场很坚定，也会犯错误。所以，对于立场坚定的人，也要注意加强思想方法的修养和锻炼。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般地说阶级立场决定思想方法；而思想方法又会影响立场。

二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是贯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所有领域，在这一切方面，都必须有鲜明的正确的阶级立场。阶级分析和阶级立场是不可分割的。阶级立场是阶级分析的“灵魂”。

階級立場問題涉及各个方面，我們應該站穩無產階級立場來對各方面的問題進行階級分析。

第一，在分析和處理敵我矛盾中要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在社會主義時期分析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也要有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

在社會主義時期，敵我矛盾還是長期存在。只要國外還有帝國主義，在國內還有反動階級復辟的危險，敵我矛盾就不會消失。我們就仍然要堅定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明確認識敵我矛盾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

在我國，地主富農階級雖然早已被打倒，它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已經被消滅，但是地主富農階級的殘余還存在，地主富農分子和地主富農的思想影響（封建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還存在。要把他們徹底地改造過來，需要很長的時間。有的人認為在合作化以後，地主富農分子參加了合作社或成為候補社員，地主富農老實了，大家都一樣出動賺工分，沒有什麼分別。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同地主富農階級的矛盾已經不存在了，不需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看待這個矛盾了。這種看法是根本錯誤的。我們知道，目前我國的地主富農分子確有不同的情況，其中，有的守法，有的基本守法，有的有一般破壞活動，有的則有嚴重的違法行為。但從總的方面來看，被推翻的反動階級總是不甘心滅亡的，它們必定要用一切辦法，企圖復辟。他們曾經採用多種多樣的手段，向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進攻。例如，有的地主富農分子破壞生產，盜竊情報，投機倒把；有的進行反攻倒算，打擊貧下中農，甚至搞反革命活動；有的用“打進來”和“拉出去”的辦法，千方百計地腐蝕幹部，篡奪基層組織的領導權；還有通過封建迷信的活動，宣揚封建宗族觀念，以模糊農民群眾的階級觀點，恢復其封建宗族統治，等等。對於反動階級的復辟活動，必須堅決地給予打擊。這是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這個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當着社會上還沒有徹底消滅地主富農階級的殘余及其思想影響，還沒有把地主富農分子徹底地改造為新人——使他們從世界觀到思想感情和生活習慣都從根本上改造過來以前，就仍然要明確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來分析和處理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同地主富農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是使我們的眼睛雪亮，正確認清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維護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腳點。

敵我矛盾是敵對階級之間最尖銳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在認識和處理敵我矛盾時，必須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這個道理人們一般地在口頭上是會同意的，因為這是敵我問題、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但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卻發生模糊，特別是當敵我矛盾同自己有關係，或者牽涉在內之時，就不容易站穩立場了。例如對待有違法活動的地主富農階級的家庭，在親屬中有反革命分子，需要自己去進行分析和處理的時候，就有可能划不清政治界綫，以致出現包庇行為，喪失革命立場。然而，在這樣的時候，正是考驗人們在階級鬥爭中的階級立場是否正確和堅定性的如何的一個重要關頭。我們大多數同志是經受得起考驗的，但有少數的個別的立場不穩的人，在階級鬥爭的考驗面前過不了關，掉了隊，離開了革命。在土地改革，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反對地主富農階

級的复辟活动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都曾經有过一些事例。这些事例說明了：对待敌我矛盾，一定要有坚定的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并从这个立场出发，正确处理問題。

我国在目前，除了敌我矛盾之外，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同样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在人民内部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范畴包括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既然在人民之内还有阶级和阶层，那么，在人民内部也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人民外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不相同的。前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按照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去解决。后者是属于敌对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右派，是属于这一类的矛盾。

我国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它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而民族资产阶级也愿意接受这个政策，因此，“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①。当我们处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时，不能站在中间立场，更不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去分析和处理这个矛盾。因为处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最重要的是解决走什么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問題。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就会坚持资本主义的方向，拒绝社会主义改造。而无产阶级是最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能使我們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正确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比較順利地解决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长期存在的問題。只有到了在人民内部没有阶级和阶层，彻底消灭了社会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才不需要有阶级立场。这是在进入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后的事情。

第二，在革命工作和革命斗争中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中同样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工作和斗争，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都是共产主义这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做好这些工作，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例如，在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对资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2—3頁。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阶级立场是无比重要的。阶级立场越明确、坚定，阶级分析就越深刻、透彻，也就越能够把革命工作做好。这是已经为无数事实所证明的客观真理，也是容易被人们所承认和接受的。

然而，阶级立场问题不仅表现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还表现在平平凡凡的细小工作中。党委的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公安工作、法院工作和监察工作中，当然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在文化艺术工作、教育工作，以及经济工作中，也都存在阶级立场问题。

人们的阶级立场，不仅是表现在工作和斗争中，还表现在学习和研究的各个方面。我们进行学习、研究，首先就有一个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党的事业，是追求个人名利、地位，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还是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改进工作、改造思想和提高阶级觉悟结合起来，以便把个人的一切更好地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在这里就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归根究底，在学习上的不同动机和不同目的，是由于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还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立场来决定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指南，是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但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就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这样的人即使读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也只不过是猎取一些词句。这种人根本不能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由于他们的根本立场同无产阶级相对立，一有适宜的气候和条件，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

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人（包括从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个人有多大的天才，他对社会的认识，总是受到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限制。他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能正确认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有从根本上转变立场，才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和在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也都有阶级立场问题。

社会科学是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科学，研究这门科学应该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这是很明显的。

自然科学则是包括生产斗争和自然界的规律的科学。它是反映人和自然的斗争问题，不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问题。因此，这一门科学的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各个阶级的人，都可以找到或应用同一个自然规律。

但是，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中也存在阶级立场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任何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政治方向由哪个阶级来领导，为哪个阶级服务，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它的阶级性的表现。自然科学的政治方向不同，它所起的作用就不相同。我国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它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有着无限光辉的前途，必将获得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加伟大的成就。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科学的发展受着资产阶级的利润法则所支配。资本家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才要自然科学工作者作各种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否被采用，完全决定于对资本家是否有利可图。他们在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为资本主义服务。

与整个自然科学的政治方向相联系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阶级立场问题。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工作者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人，站在一定阶级立场上，为一定的阶级而服务。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本主义服务，有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是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有的为帝国主义制造大规模屠杀人民的武器，用以发动热核战争；有的是为了把原子能应用于造福人类和保卫世界和平。至于涉及到政治问题，例如对待国家政权、政党、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态度，那么，自然科学工作者的阶级立场就更明显了。阶级斗争的现实，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表明自己的立场。

从自然科学理论的本身来说，它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去研究自然科学理论，总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指导，而世界观则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是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得用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不同的世界观，反映不同的立场。有些自然科学家是教徒，信仰上帝。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尽管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有所成就，但当他们一涉及到世界观的问题时，就会站在唯心主义一边，发生错误。可以预料，这些自然科学家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来研究自然科学，必定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处理社会上许多事物，都必须明确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们能够正确的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无产阶级的方法；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才能掌握和运用这个科学的革命的方法，也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进行阶级分析，才是唯一客观的公正的科学分析。这是因为：

第一，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大公无私，最有远见。

无产阶级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集体劳动，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它有最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领导，能够站在

一切革命运动的最前列，担负领导的责任。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最彻底的，它要扫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障碍，彻底解放生产力；它要解放自己，同时要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推翻一切剥削制度、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性，集中地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的根本不同。在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都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剥削制度仍然存在。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则要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形式和剥削制度，消灭产生剥削制度的根子——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时，又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消灭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把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是最革命的立场。

现代化大生产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具有大公无私的特性。这种特性是任何其他阶级都不能具有的。因为它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占有大量生产资料，依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而生活。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人，必然千方百计保护剥削制度，他们的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剥削思想最严重。个体劳动者的小资产阶级，由于占有有一些生产资料，具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就会维护小私有制，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看问题。所以，一切或多或少地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它们都是有“私”的，都会受他们的私有观念和阶级偏见所束缚，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不可能客观的公正的看问题。只有站在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立场，才能够不为私心所左右，消除狭隘的阶级偏见，真正做到客观的正确的认识事物。

无产阶级是最有远见的。这一点同大公无私分不开。一切其他阶级看不到或不敢看的，它都能看得清，看得明，敢于看到“底”。无产阶级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不但能看清楚产生它的历史时代，认清阶级斗争在社会中的发展，而且看到阶级的消灭，指出从有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的道路。这是其他任何阶级都不能看得这么远的。所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能够使我们具有远大的科学远见，对事物看得深刻、透彻，并且能看到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既知道它当前如何发展，又知道它向着哪里发展，预见它的未来。

第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使我们能够客观地正确地认识事物。

这个世界观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地认识世界；世界是怎样的，就怎样去认识它，不任意夸大，也不随便缩小，一是一，二是二，决不把红的说成白，也不把白的当作红，实实在在的認識事物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反对把事物本来没有的一切外来的东西附加在它上面，要求人们实事求是的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用这样的世界观来认识事物，这是最公正最客观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最能够以客观的态度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因为它认为，客观物质是第一性的，主观精神是第二性的，客观决定主观，而主

观又反作用于客观。人們对事物的認識，不是別的，就是主观对于客观的反映，就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因此，人們的認識是否正确，不能依主观上觉得如何来决定，而是看它能否正确的反映客观事物，能否在实践中做到主观符合于客观。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正确，所以万能，在于它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回到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証明。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理論和政策，是中国客观实际的如实反映，是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斗争經驗的总结，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践証明，三面紅旗具有无穷的威力，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

把客观放在第一性的地位，以实践作为檢驗認識的标准，这是任何別的世界观都不能够做到的。資产階級唯心主义世界观有各种表现形式，但它們的共同本質是把主观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認為先有主观、精神，后有客观、物质。人們对事物的認識，以是否符合于“我的感觉”、“我的精神”作为是非的标准，实际上，这是一种唯我主义世界观。用这种世界观来看事物，必然犯主观主义的錯誤。

第三，无产階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它要解放自己，同时要解放全人类。它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

无产階級的階級地位，决定它是一切剝削制度和压迫制度的反对者。无产階級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受着残酷的剝削，过着牛馬一样的生活，它深深地了解剝削制度的罪恶，坚决地要为消灭一切剝削制度而斗争。所以，无产階級的革命，不仅要求本階級的彻底解放，同时也要求一切被剝削的人民和被压迫的民族都获得彻底解放；而且，无产階級只有首先帮助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以后，才能解放自己。所謂无产階級的最后解放，就是实现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共产主义高級阶段。这就决定了无产階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是一致的，决定了无产階級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我們从以上三点說明中可以知道，站在无产階級立场进行階級分析，是最客观最全面的。这是保証正确地运用階級分析的唯一正确的階級立场。

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广东省佛山市紅棉絲織厂女工 高 钻

我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到一九六三年底，我从《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中选讀了一百一十六篇文章，另外还讀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經常有人問我：“你为什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的回答是：“要从毛主席著作中获得做一个革命的人的道理。”如果說得更具体些，我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認識到只有今天工人阶级才有学习的权利。在解放前，工人連参加社会活动都不可能。今天工人阶级翻了身，当家作主了，有权参加一切管理，应该加强政治学习。我经常想过去，对比现在。解放前，因为受到恶霸的欺侮、老板的剝削，我家是很貧困的，六岁我就在家里帮助父母做工，拿起蚕絲劳动了。因为无錢到学校念书，有一次我爬到学校旁边的树上去偷听講課，給人罵“穷鬼！你也要讀書？”后来我們村里又被土匪洗劫，又鬧了几场水灾，父亲死了，我們的生活就更加苦了，姑媽帶了人販子来我家，想把我卖給人当了头。我媽媽不肯，說“死也要死在一堆”。但生活无着落。一九四二年，我只好带着三个妹妹到佛山来“搵飯吃”。我那时才十七岁，三姊妹日做夜做，才掙得三十六两米，吃不飽，只好用竹笋、野菜充飢。飯都吃不飽，那里还談得上学习呢？在过去，工人連起碼的生活都維持不了，那有学习的机会！现在生活有了保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有权参加一切管理，党又这样关心我們，組織我們学习，我怎能不好好学习呢？

第二，一九五九年三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时刻記住，自己是一个党员，党员义务第一条规定要努力学习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我申請入党时，是經過反复的思想斗争的。在未入党之前，我对党是拥护的，但政治觉悟低，怕困难。究竟自己能不能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对这个問題是考虑来考虑去的。在党的教育下，我的觉悟提高了，終于一九五九年参加了党。入党后，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我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做到死的那天。要革命就要改造思想，要彻底改造思想，就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自己的立场、观点才明确，工作方法才对头。

第三，我觉得，学习是做好工作的本錢。我过去办法少，碰到困难就哭，学了毛主席著作后，使我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办法。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詳細說一下。

我学习的决心是一步一步加强的。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后，觉得自己的思想提高了，工作改进了，所以决心就更大了，学习的目的性也就更加明确了。我体会到要做人——做一个革命的人，就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我总结了这几年的学习成绩，觉得有下面这几条收获：

第一，立场坚定了，分清了敌我，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过去，我有这样的看法：资本家出本，工人出力，虽然资本家有剥削行为，但他们不出本，我们就没有工做，也出不了力。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后，才知道这是一种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

当我读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感到文章内容丰富，很清楚地讲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过去中国受那么大的灾难，是由于没有团结好真正的朋友，打倒真正的敌人。现在，党领导了全国人民把阶级敌人打倒了，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了，但是要千年万代保住我们的江山，不能让敌人再爬起来。这样想着想着，我的阶级觉悟就有了提高。学习这篇文章以后，我才知道：三种人对待革命有三种不同态度。我一边看一边对照自己。我想，我们是受苦人，是属于受苦最深、革命最坚决的一种。因此，我就决心选择坚决革命这条道路，做革命最坚决的那一类人。

在我的思想转变以前，我只知道解放了，工人翻了身，苦到尽头了，可以一心一意拼命生产，好多拿工资。我那时对钱“睇不开”。有人给我提意见，我还不服气，觉得我又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有什么不对。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后，我才知道这种只顾赚钱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不对的，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二，学会运用《实践论》、《矛盾论》的道理，来解决生产上的问题。

学习了《实践论》以后，我知道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做工作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是没有发言权的，还懂得了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践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实践，不深入老虎穴是不能得到老虎仔的。不能光讲不做。做，一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就在工作中逐步的学会运用。

我觉得《矛盾论》的道理最好用。

学了《矛盾论》以后，我知道整个世界到处有矛盾，样样都有矛盾，时时刻刻都有矛盾。我又知道，每一种矛盾都有自己的特点，要认识事物就要抓住它的特点。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性质的方法来解决。我还知道，在事物内部好多矛盾中，必定有一个是主要的。一切工作都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抓住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矛盾也就好办了。我们还要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我还知道，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象我们一切工作都有有利条件的一面，也有困难条件的一面，只有有利条件一面，没有不利条件一面的事情是没有的。当然有时有利条件超过困难条件，有时困难条件超过有利条件，但是，革命者主要是要努力克服困难，发展有利条件。有些

人只看到困难，沒有看到順利，有点困难就垂头丧气，不懂得困难可以轉化为順利。

学到了这些道理，我就把它們运用来解决問題。例如，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我調到丙班一組后，不久就到工业学校去学习。这个組长期一直落后。一九六二年七月，我学完文化回厂后，决心改变組的落后面貌。起初我不知道这个組存在什么問題。我記起毛主席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的教导，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进行調查研究，摸情况。我向人說，本来小組的条件不錯，为什么老不进步呢？她們說：“这个組是‘家山尾’、‘风水尾’。从別組調来的人，不是思想波动就是搞病了，好人来了也会变坏。”我学了毛主席的著作，知道即使是“风水尾”也是可以改变的。我决心以毛主席的思想作指导，去改变这个落后組。經過摸情况，我摸清了造成小組落后的原因，第一是組員之間不团結，思想上自甘落后，說領導上不重視，做来做去都是一样，生产劲头不足；第二是領導核心不起作用，骨干之間合作得不好；第三是交接班制度执行不好；第四是組員的技术差距大，厂党委号召看四台机的任务还没有落实。我又把这些矛盾进行排队，找出骨干不团結，起不了核心作用是主要矛盾。我就把情况向厂党委汇报，党委同意我的看法。我便召开骨干会，研究如何改变小組的落后面貌。骨干信心增强了。領導也大力帮助我們。但实际問題还未解决。原来这个組的織机是最后安装的，部件較杂，因而經常发生停机事故，我們便大家学修机。結果，思想問題、核心問題、机器問題、技术問題都解决了。这个小組也就改变了落后面貌，全組二十二人，有二十一人得奖。

又如，一九六三年十月，我們組生产质量最差，污漬很多，质量任务沒有完成，經過找原因，学先进，到十二月份便沒有污漬了。但这时又出现了“幅撑漬”的問題，这是几年来都未曾发现的，怎么办呢？工友們情緒很低，值班长也苦悶，問我說：“鈺姊，解决了五漬又出现了这个漬，怎么办？”我想，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矛盾是不断解决又不断出現的。所以我“胆定”，不慌张。后来从鏡子中得到启发，把鏡子安到織机上去，污漬就可以从鏡子里看到，把問題解决了。这个革新項目虽然簡單，但正好說明毛主席思想的威力。

这是我学习《矛盾論》的一些体会。

第三，树立了勇于革命的思想，不怕困难了。以前我碰到困难，常常沒有办法，只会哭，学了毛主席著作，我知道困难会不断出現，只要想办法就可以克服，这样就使我敢于去克服困难。

我学了毛主席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道理后，把困难看成是紙老虎，在战略上藐視它，在战术上重視它。一九六〇年，我在学习筆記中曾这样写道：“毛主席过去說过，在战略上要藐視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視敌人，我們生产和打仗一样，从全局來說，要藐視困难，对优质高产必須要有信心，但对超額完成生产任务的具体安排和行动上，又必須重視和預料到各种困难和問題。”“不能向困难低头，反而要坚决克服困难。”我对主席說的“愚公移山”的道理，很“入心”。

第四，懂得了党的群众路綫，学会了一些正确的工作方法。

“四化”运动开始时，我們心里像是在“造反”，很想搞革新，但由于未掌握走群众路綫的方法，又害怕讲出来搞不成反被工友們笑，于是我便和另一工友梁雪琼一起悄悄試驗，結果四次都不成功。党委知道后，鼓励我，启发我，并派出保全工、电工帮助我們。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走群众路綫的道理，心里才明白过来。我便和大家一起研究，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苦战了四昼夜，結果制成了“电气閘梭不断經”、“断經自停”、“自动回花”等項目。这就是毛主席說的“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和关于走群众路綫的理論的指導的結果。以后我又学习了毛主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明白了更多的道理，也就更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

我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后，得到很大启发。毛主席說，書記要当好“班长”。我想当小組长也要带好一班人。主席說，在开会研究問題前要出“安民告示”，让人家知道討論什么問題，好早作准备。我便检查有沒有做到。主席又說，要先做学生，再做先生。要先征求下級意見才下命令。我在工作中也学会这样做。

有人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都是讲打仗的。但是，我觉得打仗的道理，在生产上也是用得上的。譬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篇文章是讲战争問題的，但“先打分散，后打集中”的道理，在我們工作中同样适用。运用起来可以解决許多問題。我們小組有一个时候停机很多，三十六台机，十台是經常停机的。停机就是我們的“敌人”。怎样集中优势兵力？我組織了骨干，共同研究。我們决定先打分散，后打集中。十台机都会出問題，但問題有大有小，有的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解决，有的一个钟头可以解决，有的要整天才能解决。以前我們碰到停机，不管它是大問題还是小問題，需要多少時間，那里停机就搞那里，碰到閘梭要搞整天，影响了其他。学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們就先打分散，后打集中。这样，停机的時間就大大縮減了。

我体会到要学好毛主席著作，一定要活学活用。要勤学，要学得“入心”才能运用。如果不“入心”，就无法用。我有这样的体会，用了也就“入”了心，随时想得起，念得出。否則，碰到問題就想不起毛主席是怎样說的，应该怎样做。一九六〇年十月，我曾写过一篇学习心得，說了自己的一点体会：“毛主席在《实践論》中教导我們說，馬克思主义看重理論，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所以我学理論的主要方法，就是学以致用，边学边用。学懂一点就用它来指导实践，又从实践中反复思考。这样，在提高理論水平的同时，也解决了生产和工作中的問題。”“理論指导生产的事实，进一步打消了我对学理論的神秘观念，也摸到了学理論用理論的門径。”

我看《毛泽东选集》时，先找与自己思想、工作比較有密切关系的来看，先学容易領会的道理。起初我只会用一个道理解决一个問題，后来逐步做到能用一个道理解决几个問題，或者几个道理加在一起来解决一个比較大的問題了。我觉得，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要学为了用，用来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解决自己工作和生产上的問題，而且只有在用的过程中，才能更深地領会毛主席的思想，才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学习态度、目的和方法

——重讀《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感想

路 修 远

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学习》，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对于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改造，已經起了和繼續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现在，当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自觉地掀起一个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的时候，重讀这篇报告，感到特別亲切。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毛主席在这篇报告里反复提出的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学理論的教导，再一次为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实践所深刻体现；第二，对某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來說，时至今日，在关于学习的问题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毛主席在这篇报告里所批評的那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即“理論和实际分离”的态度。因此，从当前的学习的实际出发，重新认真学习《改造我們的学习》，也即是以这篇报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之“矢”，射我們的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之“的”，彻底地改造我們的学习，清除主观主义的态度，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是使我們在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中真正学有所成的重要保証。

毛主席在具体分析学习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时候，特別強調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一定要有“的”放“矢”，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也就是“理論和实际統一”的态度。我們从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实践中，看到他們的学习，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目的性非常明确。广东省佛山市紅棉絲織厂挡車女工高站，在談到她为什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說：“我体会到要做人——做一个革命的人，就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解放軍某部指導員廖初江也說他是为革命而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这就是說，他們都是首先帶着“怎样做一个革命的人？”这个問題去学习毛主席的

著作的。做一个革命的人，也就是要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工作革命化，生产革命化。为了解决这个“化”的问题而到毛主席的著作中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之“矢”来射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产之“的”，也就是把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产实践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从中去寻求其革命化的规律性。这样，在他们的学习实践中，就突出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因此，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由于做到有“的”放“矢”，做到实事求是，所以能够学到一点就应用一点，能够应用一点就得到一分成绩。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该首先解决这个学习的目的性问题呢？这个问题，在口头上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可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还不能认为已经没有问题了。

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觉得，自己从事的是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问题很复杂，不象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那么简单，似乎很难象劳动人民那样带着问题去学，或者感到带着问题去学并不能解决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中的复杂的理论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有些人虽然也读了不少毛主席的著作，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面所说的“无的放矢”，乱放一通”的空谈家，或者变成“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古董鉴赏家。空谈家也好，古董鉴赏家也好，其实都是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都是缺乏明确的学习的目的性的主观主义态度。

要解决一个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中的理论问题，当然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不管问题如何复杂——更确切地说，问题越是复杂，就越是要有“的”放“矢”，越是要实事求是。毛主席在具体分析学习上的主观主义态度的时候曾经指出：“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这句话虽然是在二十多年前说的，有许多做研究工作的同志，都已经克服了这种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但是，在一些研究工作者中只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而在另一些研究工作者中则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只满足于材料的堆集，烦琐的考证，这样两种殊途同归的“理论与实际分离”的研究工作，似乎还远未绝迹。这样，如何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问题，如何解决学习的目的性问题，如何解决“理论与实际统一”问题，还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

我们认为，广大劳动人民在学习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这种带着问题去学，正是解决学习的目的性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个方法把“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具体化，同样适合于一切真正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人。象高岗、廖初江提出的“做一个革命的人”、“为革命而学习”的问题，这是人人都存在着的問題，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更是一个迫切有待解决或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是常常说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吗？改造世界观有许多途径，其中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实际上就是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的問題；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中碰到的問題，不管怎样复杂，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使自己工作革命化的問題，要解决这个問題，除了深入实际，进行調查研究，就是一个学习和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問題。怎么能够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反而难以帶着問題去学呢？毛主席在闡明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这种态度之后，接着指出：“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中，应当牢牢地記住毛主席的这一正确指示。

二

我們从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实践中，还看到他們的学习，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活学活用。活学活用，是“理論与实际統一”的原則在学习方法上的具体化。这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学习实践中創造和总结出来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們学了就用，而且反复地用，大胆地用，从用得不好到用得較好，从淺到深，从低到高，从少到多，直到能把許多道理串連起来，用来解决比較复杂的問題。在反复运用的过程中，又进一步領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样，在他們的学习实践中，就突出地表明这种学习方法是达到学习目的的一种手段，是服从于学习为革命实践，即做革命的人的目的性要求，是使“理論与实际統一”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在学习方法上的保証。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采用这种学习方法呢？这也是一个必須正确解决的問題。

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承認广大劳动人民在学习实践中創造和总结出来的这种基本方法，对我們很有启发，一方面又担心这种活学活用会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系統学习和完整地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論。当然，应当承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和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他們必須和可能更系統地学习和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論。但是，从学习的原則來說，总是要采取“理論与实际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而活学活用的学习方法既然是这种原則在方法上的具体保証，也就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习。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否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重要标志，无非是：是否能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用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一切事物，处理一切問題，来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包括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原理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來說，要做到这一切，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学习、反复运用的过程，即在边学边用，活学活用，学用結合的过程

中，逐步领会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反过来又促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所謂系統地学习和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論，就会成为一句空話。因为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任何人來說，都必然是一个学用結合、逐步提高、螺旋形上升的辯証发展的过程。在这里，既没有什么“捷徑”，也没有什么“秘訣”，只有老老实实地在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的过程中，从少到多，从淺到深，从低到高，最后才能达到真正系統地学习和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論。这也就是馬克思那句名言所說的“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輝的頂点。”要达到系統地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光輝的頂点”，不經過活学活用这个途径，是絕不可能的。

要做到活学活用，就要不脫离实际。因为这里所說的用，不是別的而正是用于实际之中。在我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中，有些人对实际的接触比較多，有些人比較少，还有些人，是很少甚至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实际的，而一般說来，他們的书本知識是比較多的。对于接触实际比較少或完全没有接触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不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在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活学活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更是学一辈子也无法真正学到手的。毛主席在《整頓党的作风》中說：“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識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經驗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謙虛一些。”我們要有这种自知之明，才能从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实践中，从已經涌现的先进人物在学习上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对自己的学习有所教益的东西。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有其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需要，但任何人都要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这就是“理論与实际統一”的原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习中有其有利的条件的一面，这就是比較地說有更高的文化水平，有更多的书本知識，但是，也有其不利的条件的一面，这就是一般地說比較缺乏实际經驗，因而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容易陷入“理論与实际分离”的主观主义。因此，在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中，时刻警惕和克服自己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的弱点，坚决地遵循毛主席所指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善于从广大劳动人民的学习实践中汲取能够补己之短的东西，并在学习实践中彻底地改造自己的学习，这可以說是我們学习活动中的当务之急。

关于农产量抽样調查方法的商榷

祖延安 庆 华

《学术研究》1964年第二期刊载了陈应中同志《农产量抽样調查方法的几个問題》一文，讀后受到很大的教益，但对該文所論述的某些問題，却感到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談談我們粗淺的看法。論述不当之处，希望陈应中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評指正。

在我国农产量抽样調查中，目前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估产分組、划类选典（以下簡称划类选典）和采用单产排队、按累計面积等距抽样（以下簡称按面积等距抽样）。对这两种方法，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頗有不同的看法，其中重要的一点，涉及到在抽样調查中是否要遵循随机原則的問題。在这方面，陈应中同志认为“‘随机’在理論上实践上都有許多值得考虑的地方”，“在抽样調查中強調‘随机’是費力大而收效小的，按‘随机原則’抽出来的样本，其代表性是沒有把握的”，同时还具体提出了三点理由。^①对这一問題，我們感到是值得商榷的。

所謂抽样調查，就是遵循随机原則从总体中抽出一定数目的单位进行調查，并根据其調查結果来推算总体的一种非全面調查。这种調查方法，要求調查单位的抽取以及以部分推算总体，都必須建立在有充分科学根据的基础上。

采用这一方法同其他非全面調查的區別之一，就在于組織抽样調查时，需要遵循随机原則。所謂随机原則，就是指总体內的各个单位都有均等机会被抽中的可能性，以保証它不受人們主观意图的影响。只有这样，才可使抽样調查所据以成立的一些定理得以应用，才可使样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使以部分推算总体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并保証抽样誤差控制在我們所設想的範圍內。

我們知道，抽样調查是以大数定律的数学定理为依据的。大数定律表明，只有对客观现象进行足够大量的观察时，其规律性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通过大量观察，才可使作用在个别现象的偶然的、次要的因素相互抵消，从而表现出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当然，必須明确，大数定律只是事物规律性的表现形式，并不能取代事物本身的规律性。

在构成大数定律的若干数学定理中，契比舍夫和李亚普諾夫定理給予抽样調查以充分的数学依据，这些定理表明：在充分大量的抽样情况下，抽样平均数与总体平均数間

^① 见《学术研究》，1964年第二期，第55頁。

的离差可以任意小，这一可能性的机率可尽量接近于一。这样就为抽样调查的精确计算和抽样调查的实际运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依据大数定律的内容和特点，抽样调查应注意两点：（1）遵循随机原则；（2）现象的大量性。所以要遵循随机原则，是为了依据大数定律的数学定理正确处理抽样误差。这样才能适合这些定理的条件，使它们得以充分发生作用。遵循随机原则可使样本在总体中的分布均匀，从而加大样本的代表性，这样据以推算总体也就较准确。这也正是这种调查方法和其他非全面调查不同之点。其他的非全面调查如重点调查、典型调查等，都是根据研究目的与任务的要求，在对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调查单位的。因此，这些非全面调查一般都难以推算总体和控制误差。

可见，在抽样调查中，要遵循随机原则是完全具有理论根据的。

在抽样调查中遵循随机原则，也并非不合于牛顿二项定理。在抽样调查中应用二项定理，是在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为二项式分布律的情况下，根据这一代数公式展开求得分布上的各种机率。如果二项式分布的现象项数很多时，就会接近正态分布。这些都是在随机的变动中求得的一般的规律性。就是从二项定理本身来说，也是在对随机变数进行无数次的反复试验，从自发的偶然过程中推演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运用这些定理来认识客观事物时，一方面要遵循它们据以成立的原理原则，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在运用它来认识事物并不等于重复定理定律本身，就是说，无须乎再进行试验后方肯定其作用。在抽样调查中所以要遵循随机原则，正是从它是建立在这些数学定理定律基础上而引申出来的。

至于在抽样调查中，是否由于贯彻随机原则就会导致过多地增加样本数量，从而增加抽样调查的工作量呢？我们感到，在抽样调查中要注意样本的数量，这是大数定律所要求的。只有抽出足够数量的样本，才能抵消个别单位上的偏大偏小，排除偶然因素的影响，从而显示出事物本身的规律。但样本数量多少的确定，是在我们对客观现象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对调查结果准确程度的要求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在保证所要求的准确程度内，应尽可能抽取最少的样本数量。这应该是我们确定样本数量的原则。所以，样本数目的确定是和遵循随机原则与控制抽样误差密切相关的。我们认为，一般地说，随机并不一定会导致过多的增多样本数目。众所周知，遵循随机原则的抽样调查，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或称“机械抽样”）、“类型抽样”和“整群抽样”等四种组织方式，在这四种方式中，只有在不适当地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必须抽取过多的样本，以保证所抽取样本的代表性，从而加大调查工作量的问题。因为在采用这种调查时，对总体各单位不加任何的分组、排队等工作，完全随意地抽取单位。当总体各单位间的差异较大时，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就势必要增加样本的数目。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抽样调查时，是很少采用这一方式的。但对其他三种抽样组织方式来说，遵循随机原则只会使样本分布更均匀，样本代表性更大，并不会出现由于“随机”而不恰当地增加样本数量的问题。

我国当前农产量抽样调查主要采用的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它是各种抽样调查组织方式的结合。因为它在方法上既有划类的性质，又具有等距抽样的性质；同时，在具体作法上又分为几个阶段（一般是省抽县、县抽大队、大队抽地块）进行。但不论这种方法在抽样组织方式上有何特点，在抽取调查单位时，仍是遵循了随机原则的。在进行等距或类型抽样时，都是先进行排队、分类，而后按随机原则抽取调查单位的。排队与分类的作用在于调整总体单位间的构成，缩小总体单位间的差异程度，从而保证抽取样本的均匀分布，增强代表性。

最后，关于实际误差与理论误差的偏倚问题，我们认为这也很难说是由于“随机”所造成。因为根据数学定理，抽样误差的计算公式，是根据理论上的常态曲线制订的，而我们所观察的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所实际体现出的曲线，则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很难恒常与理论常态曲线完全相等而丝毫不偏倚。所以理论误差和实际误差间总会稍有偏高偏低的现象，这也应该被认为是可以允许的。这种差异不能归罪于随机。

综上所述，在抽样调查中遵循随机原则，是保证这一方法的科学地运用，并使它据以成立的数学定理定律得以充分发生作用的要点之一。实际上，在各种抽样调查组织方式中，也都贯彻了这一点。当然，也应该指出，我们所以要在抽样调查中遵循随机原则，只是从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出发，并非如资产阶级统计学者对其盲目的推崇，过分的夸大，从对事物的不可知论出发，将一切都归之于机率，滥用抽样调查，从而导致于取消科学的经济统计研究，使之变成资产阶级御用的工具。

在这里，还有必要谈一下关于抽样误差问题。我们知道，在各种非全面调查的代表性误差中，只有抽样调查的抽样误差才可以根据科学的原理严格地加以计算。在组织抽样调查时，抽样误差必然产生，人们的任务不是企图消除这种误差，而是使之缩小，使它能控制在我們所容许的范围内。这就需要借助于抽样误差公式的计算。抽样误差的大小受着下述因素的影响：（1）总体各单位被研究标志的差异程度；（2）抽取单位数目的多少；（3）不同的抽样组织方式；（4）推算总体的不同方法。

在抽样调查中为了保证调查资料的质量，尽可能减少调查误差、严格控制抽样误差，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重大作用的。在抽样调查中贯彻随机原则、计算抽样误差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抽样误差，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程度。顺便指出，陈应中同志在文中提到：“据统计学原理，已经证明整群抽样在抽取同等样本的条件下，比其他抽样误差小”^①，我们的认识却恰好相反，它的误差不是小，而是比其他几种抽样组织方式的误差大。因为，用这种方法抽出的单位在调查总体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所以抽样总体的代表性差，因之误差就大。实际上，在几种抽样调查组织方式中，以类型抽样的误差为最小。

① 见《学术研究》，1964年第二期，第54页。

在划类选典和按面积等距抽样两种調查方法中，都可采用預計估产作为排队的标志以抽取調查单位。但如何評價預計估产在农产量抽样調查中的作用，以及对具体排队标志的选择，我們也与陈应中同志有某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应该肯定，在农产量抽样調查中，采用与調查对象有关的标志是优越于采用与之无关的标志排队来抽取調查单位的。这是因为农产量这一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在采用抽样調查研究其数量方面时，如采用有关标志排队，則能够縮小总体各单位之間的差异程度，有助于更确切地了解調查对象的經濟內容，从而增强抽取調查单位的代表性，减少抽样誤差。但在具体采用什么有关标志排队来抽选調查单位的問題上，却并非只能是采用預計估产，而是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意见的。归納起来有：一、按过去的实际单产排队；二、按当年的預計单产排队。并且在采用过去实际单产作为排队标志时，有的主张采用前一年的实际单产，又有的主张采用前三年的平均实际单产。我們认为，究竟应采用什么产量作为排队抽取調查单位的标志，主要应視其能否反映当年农业生产水平的准确程度而定。选择的标志愈接近反映当年的生产水平，則抽选的調查单位的代表性就大，这样也就愈应为我们所采用。例如，在省抽县一級調查单位时，在无特殊情况下，采用預計估产就不一定比采用前三年的平均实际单产在各方面更为确切。

在确定排队标志以后，如何評價排队标志在抽样調查中的作用，更具体地說是如何評價預計估产在农产量抽样調查中的作用，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問題。

应该看到，預計估产在划类选典和在按面积等距抽样两种調查方法中，对抽取調查单位的代表性都是有作用的，但作用的程度对二者却有所不同。对于划类选典來說，預計估产准确与否对“选典”确有举足輕重的作用。估产愈准确，抽出的各組平均值的代表性愈强，反之，結果就相反。但这是否就能认为預計估产“可以帮助我們比較准确地掌握着样本总体平均与調查总体平均之間的差距”^①呢？換言之，是否可以认为已知預計估产与实产間的准确程度，就等于知道了抽样总体平均与調查总体平均之間的差异程度呢？我們认为是不可能的。在估产与实产之間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的。首先，由于从預計估产到实际收割，在時間上还存在着一段距离，在这期間一些偶然因素的出现是人們难以完全預料到的。其次，某些影响产量的新情况的发生，也是人們在估产时难以准确判断的。这些都会影响預計估产的准确性。同时，由于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間的关系，既有利益根本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的一方面，如果农民对农产量調查認識有不正确之处，就会影响估产的准确程度。实际經驗証明，估产一般达到85%到95%的准确程度，是有利于依据它排队进行抽样調查的，但絕不能认为由此就决定了抽样总体平均与調查总体平均之間的差距也一定限定在該範圍內。因为，它們虽然有关，但并非完全

① 见《学术研究》，1964年第二期，第57頁。

相等。何況，我們進行抽樣調查所要控制的誤差範圍並非要求在5%到15%之間，而是更高的要求在正負3%之間。實踐證明，通過抽樣調查所獲得結果的準確程度可達到97%以上。所以，即使做到控制抽樣總體平均與調查總體平均之間的差距在5%到15%之間，也不能說就能保證調查具有足夠的質量。至於說“預計估產的特點還在於它把抽樣調查比較複雜的統計技術與繁雜的計算（按地塊抽樣的計算仍然複雜）大大簡化了”^①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並不是完全由估產所產生的，而主要的是決定於估產以後採用何種調查方式進行調查。

就預計估產在按面積等距抽樣方法中的作用來看，我們認為，它雖然對抽取調查單位的代表性有影響，如果估產接近實際，估得平衡，則所抽取的調查單位的代表性就強，但它並非唯一的決定樣本代表性的因素。因為在這種調查中，抽取樣本固與估產排隊有關，但另一方面，亦還決定於總體各單位面積的多少。所以，我們認為，預計估產在兩種調查中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地區的某些實際經驗也證明，在按面積等距抽樣中，由於不同原因致使估產不准，個別的與實產相差甚大，因而使原來以估產為依據而排列的調查單位次序，與實割後按實際產量為依據而排列的調查單位次序變化甚大，例如，原來估產低的實產高了，原來估產高的實產反而低了，有的兩者相差在140%以上，但最終調查結果，其誤差依然達到我們所規定的範圍內，這不就證明了預計估產在這一方法中並未起決定性的作用么？總之，我們認為預計估產的準確與否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樣本總體的代表性，但它並不完全左右樣本的代表性和誤差。

三

在農產量抽樣調查中，採用劃類選典方法就陳應中同志文中所述，是指在預計估產的基礎上按單產高低排隊，以40—50斤為組距進行分組（即劃類），採取抽取組平均值的辦法“選典”，然後再以“選典”調查的結果來推算總體的数量。因此，有必要弄清楚：採用劃類選典所抽取的樣本是否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據以推算的總體是否具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像這樣抽取樣本和推論是否完全符合抽樣調查的科學理論？

我們認為，所謂樣本的代表性應該包括兩方面的涵義：一是按某種抽樣調查方式抽出的樣本，平均地來說最接近總體，而不是要求每個具體樣本都必須最接近總體。也就是說，我們所考慮的是抽樣總體對調查總體的代表性問題，而不是單純從每個樣本出發去考慮的。二是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的大小，即指我們所研究現象的某個標志在樣本中的分布情況與它在總體中分布情況相接近的程度，兩者愈接近則樣本的代表性就愈高，反之就愈差。根據這兩方面的涵義，我們在評價樣本的代表性大小時，應從整個抽樣總體的內容和調查總體的內容相比較着眼。

依據上述對樣本代表性的論述，我們感到，按照劃類選典而從各組中抽取平均值為

^① 見《學術研究》，1964年第二期，第57頁。

样本（姑且不論其組距划分問題），是很难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的。首先，划类选典是从各組中抽取組平均值，因之每个样本对每組來說，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并不等于說抽样总体对調查总体就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因为各組在調查总体的分布并非完全一致（对这一点将在下面論述面积时作进一步探討）。其次，所抽取的样本从各組角度來說，它們都仅是具有平均水平的单位，而这样构成的抽样总体就集中了平均水平的大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其平均值可能与总体平均值相接近，但实际上，它們在各組中的分布情况，并不与总体的各种不同单位的分布情况相适合。同时，还应该看到，抽取平均值为样本很难避免不受人們主观意图的影响。因为由于我們所調查的指标在未調查完以前还是个未知数，即使在預計估产基础上对产量事先已有一个較為可靠的認識，但它毕竟还是与实际情况有一定距离的。因而，認為在“选典”时抽取組平均值就能具有充分代表性或加大代表性，是缺乏客观根据的。特别是当接近平均值的单位不是一个而是两三个时，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難避免人們有意选择某一个单位为調查对象，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科学性与代表性。

由此可见，采用如陈应中同志所說的划类选典方法所抽取的样本，在抽样方法上并未遵循随机原則，不能保証样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認為以其为基础来推算总体，可以达到我們設想的准确程度，将抽样誤差控制在我們所规定的范围内，这种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这样說，并非完全否認采用划类选典所抽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一般作为“选典”中的平均值还是可以反映中等水平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上，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預計估产会达到85%以上的准确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有助于整个調查的进行。同时，依靠人們对所研究对象的深入了解，和充分利用对有关該事物的丰富知識和經驗，有时在“选典”过程中确实可以有意識地选出有可能代表总体平均水平的单位，并依其推算总体也可具有相当的准确程度。但这种情况并不能作为通例看待，而且如果严格地从理論上进行探討，这种作法也并不完全符合抽样調查的原理。当然，一般地說，任何一种非全面調查所得到的結果与总体指标間都是有一定差异的。但只有抽样調查，才具有由部分推算总体的充分科学論据和能够严格地預計控制抽样誤差的特点。陈应中同志所指的划类选典，在作法上虽也采用了某些抽样調查的論据与方法，如計算抽样誤差、据調查結果推算总体等，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帶有典型調查的性質，特别是在划类“选典”阶段。因此，虽然一般地我們也称它为农产量抽样調查方法之一，但严格說来，就很难說它是一种完全合乎科学推理的抽样調查。

四

划类选典是建立在預計估产的基础上，以单产等距分組而后“选典”的。因之，这种方法在抽取样本时不考虑各不同单位的面积的多少。而按面积等距抽样調查則是充分

考虑到各单产所在单位的面积问题。可见，在抽取样本时，是否考虑到调查面积问题，是这两种调查方法的重要区别之一。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由于后者考虑到面积，它就不比不考虑面积的划类选典方法要确切些。

在抽样调查中，抽取调查单位应力求做到样本的均匀分布，以有助于提高样本的代表性。而在农产量抽样调查中，所谓样本的均匀分布，应该是指样本在各个单产间和在总体面积间的均匀分布问题。

但是，采用划类选典方法所抽取的样本是否可以达到充分地均匀分布呢？我们认为是有困难的。这一方面固然同以平均值为样本在各组间并不能达到完全均匀的分布有关，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在于采用这种方法所抽取的样本根本未考虑样本在面积中的分布。然而事实上各个单位的面积总是有所差异的，例如，在一个县内有的大队面积较大，达几千亩甚至万亩，有的大队面积较小，仅一、两千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以预计估产排队划类，抽取样本，就难以将各种不同的单位完全置于同等地位看待，而只有处于平均值或接近平均值的单位才有被抽中的可能。这样一则违反了各单位均有同等的可能被抽中的随机原则，再则也必然否认了面积愈大中选机会愈多、代表性愈大的可能和事实，不能做到样本在总体面积间的均匀分布。因为各组平均单产的构成与各组面积的构成只有在个别的情况下才偶然地吻合，一般都难趋于一致。所以抽取每组产量平均并不就等于抽取每组面积的中点。

和划类选典相反，按面积等距抽样则不仅可使样本在单产中均匀分布，而且也可使样本在总体面积中达到均匀分布。具体来说，由于我们抽取样本是在以单产排队的前提下，按面积等距抽取的，因而，一方面样本在单产间是由小到大均匀分布的；另一方面面积愈大的单位被抽中的可能性就愈大。这样就充分地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从而根据这样抽取的样本推算总体的准确程度就愈大。所以说，按划类选典和用按面积等距抽样所抽取的样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单产和面积是构成影响总产量的两个因素。如果我们在农产量抽样调查中，仅着重单产而不考虑面积，则在面积存在不实的情况下，它非但不能确切地反映单产的真实情况，而且还必然由此影响到推算总产量的准确程度。

应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计量单位的不一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原因，致使在各地确实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面积不实不确的现象。核实和丈量面积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企图通过农产量抽样调查把面积搞得很准确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力求把面积调查清楚。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动群众，加强领导，采用各种方式方法相互配合的办法，也是完全可以将面积基本搞清楚的。这样，才可使按等距面积间隔所抽取的调查单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而不致由于面积的不实，使本应具有可能被抽中的单位不被抽取，或者不应被抽中的单位反而中选了。

可见，在农产量抽样调查中是否要考虑调查面积，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

是对抽取样本的代表性和推算总产量的准确程度有重要影响的问题。为此，在调查过程中应该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才是。

涉及到面积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按面积等距抽样调查推算总产量时，被调查各单位的原报收获面积、播种面积是否需加以重新调整。如上所述，面积是决定总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它又普遍存在不实不确的现象。因此，在以样本推算总体时就必须考虑面积的调整问题。即在推算总体时，将调查单位和调查总体的面积按照核实面积与原报面积的比例，或丈量面积与核实面积的比例分别对原报面积或核实面积加以调整。这种调整也是遵循等距抽样的原则，所以调整后的面积同样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至于因其中个别突出情况致使影响调整比例的波动过大，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适当地加以解决，但绝不能因这些偶然情况的发生就忽视调整面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然，核实和丈量面积会加大某些调查工作量，但如果这样作正确、必要，看来还是值得的。

× × ×

综合上述，我们就某些主要方面论述了有关划类选典和按面积等距抽样两种不同的农产量调查方法的区别，从中不难看到，按面积等距抽样较划类选典是更为完善和具有充分科学论据的。

与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相比较，划类选典在方法上确是较为简便，在调查时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也会相对地少一些，同时，这种调查主要由各地干部进行，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具有一定的调查经验和丰富的生产知识，这些都会为划类选典的进行提供有利的条件，其调查的结果也可具有相当的准确程度。我们认为，这也正是过去所以较为普遍采用这一方法的原因，今后在某些情况下，也还可以采用。

关于粮食产量抽样調查方法問題的探討

許 隆

粮食是国民經济基础的基础，及时而准确地反映粮食生产成果，是党和国家加强国民經济計划管理和全面安排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本文想就粮食产量抽样調查方法中的几个問題，作初步的探討。不当之处，望大家批評指正。

一、两种抽样調查方法的比較

抽样調查是非全面調查方法之一，采取这种方法調查粮食产量，对提高調查資料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滿足全面調查所不能滿足的急需，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总体大、单位多的調查对象。例如对調查全国或全省的粮食产量來說，由于它們总体大、单位多，如果进行全面調查，所需的人力多、時間长，不易滿足急需；如果采用抽样調查，則其作用就很显著。但就一个县或公社、大队來說，由于它們总体小、单位不多，进行全面調查，所需的人力較少，時間不长，較易滿足急需，要是进行抽样調查，其作用就不那么明显。这是我們評價抽样調查方法的出发点。有的同志認為采用抽样調查方法調查粮食产量，是“多此一举”或“可有可无”。这主要是只从一个小地区去看，而不是从求得全国或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去看的緣故。

在我国粮食抽样調查工作中，应用較多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估产排队、以单产等距分組，按組平均单产抽样（以下簡称为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一种是：估产排队，按面积累計等距抽样（以下簡称为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效果最好，看法不一。

我認為，由于后一种方法既吸取了前一种方法估产排队的优点，又根据随机抽样的原則采取了按面积等距抽样。因此，总的來說，还是后一种方法比前一种方法完善、严密，对控制抽样誤差有較大的把握。

第一，从抽样来看。按面积等距抽样，虽然抽样的标志与按平均单产抽样不同，但都能抽到接近組平均数的单位，而且按面积等距抽样抽选出来的单位，代表性更有把握。因为这种方法，对第一个单位是从半个組距开始的，以后每加一个組距抽选一单位，在各单位的面积不是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中选的单位一般居于組中間；加上各单位的单产經過高低排队后，比較均匀分布，处在組中間的单位，其单产一般接近所在組的平均数。同时，按面积等距抽样，具有这样的规律：即被抽中的，一般都是面积較大的

单位。因为单位面积愈大，在組內所占的范围愈大，被中选的机会就愈多。而按組平均单产抽选，就不一定有这样情况，因为按組平均单产抽选的办法，只要单产接近組平均数就有中选的机会，而面积的分布未被考虑进来。因此，兼顧了面积，就能更全面地贯彻随机的原則，从而抽选出来的单位，代表性就更有把握。只考虑平均单产，不考虑面积，实质上，也就是只考虑接近組的平均数，而没有考虑組內各单位权数的大小，这样，也就不能更全面地贯彻随机的原則，从而中选单位的代表性也就受到一定的影响。例如：有两个单位都是代表同一組的单产，一个是几千亩，一个是几十亩，在两个单位都是要求抽选相同的样本数时，由于一个是在几千亩的单位去抽选，一个是在几十亩的单位去抽选，比較起来，当然是在几千亩的单位抽选，其代表性把握較大，而几十亩的就要差些。

第二，从分組方面看。按面积分組，能依一定的公式（其公式是： $R = \frac{\sum F}{n}$ ）进行。求組距只用要分的組数（即样本数）去除总面积即得，做起来比較簡便，任何人只要按这公式做去，就能分到相同的組和选到相同的单位，不会因人而异，便于贯彻随机原則，也利于发挥大数法則的作用。按单产分組則不同，不能依一定的公式进行。每隔多少斤为一組才合适，只有由調查人員視各单位估計单产的差异程度而定。組距略为改变，組数可以相同，但所包括的具体单位就会不同，結果选出来的調查单位也就不同。这样也就会因人而异。有的同志认为采用这样方法，在抽选調查单位时，接近組平均数的不止一个，在調查人員自行取舍时，容易受主观意志影响。我认为只要这几个单位的单产都同样接近組平均数，照理都具有相同的代表性。取舍的条件不是取决于主观，而是平均数。如果要說这种方法容易受主观意志影响的話，我倒认为問題是出在分組上。

由于一个是按面积分組，一个是按单产分組，分組的标志不同，采取这两种方法，对同一方案，按相同的組数分别进行分組，分出来的組所包括的具体单位，通常是各不相同的，因而选出来的具体单位也随之不同。

由于分組不同，效果也有一定影响。根据計算^①在同等的条件下，抽样誤差各不相同。一般來說，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比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的抽样誤差小，从而其效果較好。因为抽样誤差是由組平均数与組內各单位平均数之差引起的。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在依单产高低次序排队时，每隔一定数量面积分为一組，較能保持等距，組內各单位差异程度的分布就会比較均匀，抽样誤差也因而較小。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虽然也是每隔一定数量单产分为一組，但确定的单产組距，不可能刚好与各单位差异程度完全吻合，有的单位按相等的組距，应划为另一組的，遇到单位数目少不能单独划为一組时，則要併到相邻的組去，这样就会扩大併进去的那个組內各单位的差异程度，抽样誤差也就会因而較大。

总的來說，虽然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比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严密，对控制抽样誤差

① 抽样誤差是按 $\mu = \sqrt{\frac{\sigma^2}{n} (1 - \frac{n}{N})}$ 的公式計算的。

的把握程度較大，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还是具有优于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的一定优点的。

首先，采取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調查，到中选大队一級可以只抽一个接近大队平均单产的生产队，工作量較少，在南方水稻地区的地块較小的情况下，只要一、二个专业人員掌握就可以有条件以地块为实割实测单位，不需到地块再选更小的样本。这样做法简单些，能发动群众一块动手，又能取得較有把握的实测数据。而采用面积等距抽样方法，到中选大队一級，起碼还要再选三、四个以上的生产队才行（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局限其不能只选一个），工作量較大，在只有一、二个专业人員直接掌握的情况下，一般到地块还要再选更小的实测样本才行，否則，工作量过大，力不能胜。这样实割实测的单位过小，必須要求細致精确，在調查人員的业务水平較高的情况下，可以同样取得准确的地块推算数字；如果在調查人員的业务水平不太高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数字，往往比不上前种方法准确。有的同志认为，一个大队只选一个生产队，其代表性把握不大。我认为，仅以一个生产队来推算全大队或全县，其代表性确是差些，但就一个县來說，由于它所抽选的单位不只是一个队，而是有好几个队，因此，其代表問題也就不大。必須指出，尽管这种方法在这方面具有比較显著的优点，却不能由此就断定这种方法是多、快、好、省的，而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是少、慢、差、費的。

按組平均单产抽样的方法，一般來說，要求不那么严密，在調查总体不大，抽样层次不多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会比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选出的样本少些，效果也不会差，这是必須加以肯定的。但由于这种方法在分組等具体作法上的不够严密，在总体較大，抽样层次較多的情况下，能否收到前面所說的效果，就沒有把握。而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由于它一整套的作法比較严密、精确，它比較有把握在較大的总体进行抽样調查，并取得較好的成效。

其次，在推算方法上，采用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一律采取加权的方法，口径一致，易于掌握。而采取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按算术平均法計算，不需加权，从理論上看来容易，实际做起来比較复杂，不易掌握。例如当遇到属于实测的作物不能参加实测，但总产又要把这部分产量包括进去的特殊情况，到了推算时，对这部分还是要加权的，这样往往变成两个口径，容易混淆，出现差錯。这种情况，在县和大队都容易出现。

具体分析这两种方法，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具体問題，具体分析，取长补短，既不能因为按面积等距抽样的方法优点多，就完全否定了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也不能因按組平均单产抽样方法还有一定的优点，就完全否定按面积等距抽样方法。而且就目前來講，这两种方法，还有同时并存結合使用的意义。

二、按估产或以往实产排队的作用

根据等距抽样方法的要求，对总体各单位必須依統一的标志，依一定的次序进行排

队。排队的标志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关标志；另一种是无关标志。在粮食产量抽样调查中所采用的按当年估计单产或以往实际单产排队，是属于前一种标志，采用这种标志排队，可以大大缩小总体单位之间的差异程度，因而，在同等条件下，其抽样误差一般要比无关标志排队小得多。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曾把按估产排队和用无关标志排队作过比较，分别计算的结果表明：在同等条件下，前者要比后者的抽样误差小将近三倍。这种情况说明，采用有关标志排队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不承认用有关标志排队比用无关标志排队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有关标志的数值准确程度对抽样误差的影响怎么样，则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对估产的看法上。有人认为估产准确与否同抽样误差无关；也有人认为估产准确程度多大，也就能控制抽样误差在多大的范围内摆动。

采用这种有关标志排队之所以能缩小抽样误差，是和这种标志的数值反映总体各单位之间差异程度的准确性有关。这种标志的数值较准确，就能有效地缩小抽样误差，否则，这种标志变成了无关的假设，实质上也就等于无关标志排队，因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可见，前面第一种说法是不对的。然而，即使这种标志的数值的准确程度，达到了和真实数一样，也不能完全消灭抽样误差，因为决定抽样误差的，是总体各单位的差异程度，而不是排队标志数值准确程度的大小。举例说：有四个单位按估产排队为100斤、300斤、500斤、700斤，假设面积都相同，总体平均单产则为400斤，中选的是第三个单位，单产是500斤，和总体平均单产对比，误差是25%。假如估产的准确程度达八成，真实的总体平均单产为320斤，各单位的真实单产分别为80斤、240斤、400斤、560斤，中选的单位的真实单产为400斤，和总体平均单产对比，误差仍是25%。现在再假设估产准确程度达百分之百。真实的总体平均单产为500斤，各单位的真实单产分别为100斤、300斤、500斤、700斤，中选单位的真实产量为500斤，和总体平均单产对比，误差还是25%，也就是说，虽然估产准确程度由八成提高到百分之百了，但误差并不一定随着估产准确程度的提高而缩小。可见，后一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

我认为对这种标志数值的要求，只要能反映总体各单位之间的差异程度就可以了，即只要知道它们之间谁大谁小，能分别高低次序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事先知道它们的真实数值（如果知道了，就用不着调查了），因为这种标志的数值遇到如下两种情况，对抽样误差不会发生影响或影响不大：一种情况是倾向性的偏高偏低不会影响，另一种情况是忽高忽低，而又不是很悬殊的，影响也不大。

根据这个要求，不仅是估产，就是以往的实产，也能起到大体相当的作用，并且还会更简便些。

估产数一般都是根据上一年或以往正常年景，结合当年的作物生长情况估计的。这样可以避免当年特殊变化的因素。为了取得这种数字资料，必须进行全面的预报，这样无形中等于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需要花较大的人力和时间，在一个县的范围这样做还可以，如果是在一个省或全国范围内，搜集这种数字排队是不容易办到的。即使搜集得

到，也会因面广、工作量大、参加的人多，估产标准不一致，容易出现較大的估产誤差，数字质量不一定有保証。因此，在調查总体較大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数字排队是有局限性的。

采用以往的实产数，一般可以采用上年的数字，如遇有特殊情况，也可以采用以往几年的平均数或年景大体接近的一年数字。这完全可以利用现成的实际統計数字，是一种最簡便的办法。

在我国粮食产量抽样調查工作中，一般都采用按当年估产排队，采用按以往实产排队的則比較少。根据以上分析，采用以往实产排队的效果不一定比采用当年估产排队差。以往的实产数，一般說来，不可避免和当年的实际情况有出入。当年的产量变化大，出入就大，变化小出入就小；总体的范围小，出入可能大，总体范围大，出入可能小。因为范围小容易受到特殊因素的影响，范围大，各种特殊因素可以相互抵消。如果从粮食的发展速度看，在一个县的范围內，一年递增百分之十到十几，算是較快的了，这样上年的实产和当年产量不过是差个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几。即使是采用当年估产，其估产誤差达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几也是常有的。因此，在县以上按当年估产排队和按往年实产排队，其效果不会有多大的差別；在县以下特別是在大队范围內，按往年实产排队則可能出入較大，其效果不一定有保証。总之，范围越小，采用往年实产数字排队，越是受到局限。

总之，我以为在抽样調查中，按往年实产排队和按当年估产排队，可以結合起来使用。在一个省的范围內組織粮食抽样調查，在省抽选县时，可以采用以往的实产排队，到中选县抽选大队、大队选小队、小队选田块，都可以采用当年估产排队。这样在省一級就可以大大减少在全省范围內层层估产、逐級上报所花費的人力和時間。

三、影响抽样調查准确程度的基本因素和怎样評價其准确程度

影响抽样調查准确程度的具体因素很多，但总括起来，不外是两种：一种是調查誤差，一种是抽样誤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如何全面地控制这些因素，則往往被忽視。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只注意控制抽样誤差，而忽視了控制調查誤差；或者只注意控制調查誤差，而忽視了控制抽样誤差。因此，詳細分析产生这两种誤差的原因，找出矛盾，以便全面控制，对提高抽样調查的准确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調查誤差，是由于調查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和被調查人对接受調查的态度不够正确等原因引起的。不論采用哪一种調查方法，这种誤差总是会有的。調查方法容易掌握与否，以及調查工作的好坏，当然对調查誤差的大小有影响，但总不能够完全避免。因为人們在調查过程中，尽管工作做得多么充分，总不会是完美无缺的。

抽样誤差，通常也叫代表性誤差，这是通过部分反映总体所产生的誤差。这种誤差，只有全面調查，即对总体的所有单位都調查了才沒有，在所有非全面調查中都同样存在，不过只有抽样調查才能加以計算，其他非全面調查是不可能計算的。由于这个緣

故，人們通常把这种誤差干脆称为抽样誤差。

抽样調查的准确程度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两种誤差之和的大小。但組織抽样調查的时候，假如，抽样誤差縮小了，但調查誤差扩大了；或者反过来，調查誤差縮小了，但抽样誤差扩大了，甚至縮小了誤差还抵不回扩大了誤差，这样，对調查結果的准确程度，不但得不到提高，反而会降低。因此，在研究如何控制誤差的时候，都必須全面考虑，不能顧此失彼。

調查单位数目和抽样誤差是成反比例的。調查单位数目和調查誤差一般則成正比例。假如抽取調查单位数目过多，則会同时出现两种情况，即：一方面縮小了抽样誤差；在另一方面会扩大了調查誤差。假如抽取調查单位过少，則会同时出现反过来的另外两种情况，即：一方面縮小了調查誤差；另一方面則扩大了抽样誤差。因此，在确定調查单位数目的时候，必須从縮小这两种誤差之和的观点着眼。如果有所偏废，势必造成顧此失彼，得不偿失。

为了正确处理在控制这两种誤差上的矛盾，确定調查单位数目必須适当。其基本原则应该是：以保証控制抽样誤差在一定允許范围内起碼需要的单位数目为前提，尽量做到宁可少些，但对調查誤差的控制更有保証些。因为这种調查是以很少的单位推算較大的总体的，如調查得不精确，将会带来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之弊。

在粮食产量抽样調查中，如果調查对象是較大的总体，往往要采取层层抽样的办法，并且一般都相应地层层推算。这样，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层层以至最大的总体都接近准确；另一种是較大的总体以下各层，有的偏高有的偏低，甚至有的偏高偏低程度較大，但到了較大的总体仍接近准确。一般來說，在实践中出现前种情况比較少，后一种情况較多。只有当每层的調查单位数目相当多又能控制調查誤差的足够条件下，才会出现前一种情况。对前一种情况，当然不会有什么問題；但对后一种情况，就会产生怎样評價其准确程度的問題。

要是从每层的各个个别的小总体看，誤差可能較大，但从以这些小总体构成的大总体看，誤差可能很小。到底怎样来評價它的准确程度呢？

我們知道抽样調查方法是根据机率論的原理建立起来的，它的作用是通过圍繞真实数值上下波动，相互抵銷的形式反映大量现象的。如果从个别单位看，必然出现偏高偏低的情况，但从总体的大量现象看，就比較接近实际，这种情况反映了大数法則的作用。因此，評價抽样調查准确的程度，只有从最大的总体着眼，才能断定調查出来的数字，是否反映最普遍、最大量的现象，是否真正反映客观实际。而各个个别的小总体对最大的总体来講，仅是总体的某一部分，它所反映的现象往往是属于局部现象。要是从各个个别的小总体着眼去評價以大总体为范围的抽样調查結果，势必得出不正确的結論。



在农业生产中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孙凌云

为了在我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发展农业是首要任务，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有赖于农业生产的首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贯彻自力更生的精神。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这样一个重要生产部门，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在农业生产中贯彻自力更生精神，当然是在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的前提下，强调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首先要依靠充分调动农业内部的一切力量来克服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只有充分发扬这种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能正确处理农业部门内部人与物的关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迅速的发展。

从国民经济的整体来说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但从农业这一生产部门来说，它与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又表现为一种外部关系；在农业的外部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还体现为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建国十几年来，全民所有制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巩固的工业基础，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巩固的物质基础。全民所有制的工业要大力支援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

的，但我国是一个有着五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的援助，暂时还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因此，强调在农业生产中发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五亿多集体农民中，蕴藏着发展农业的无限潜力，所谓在农业生产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调动农业内部的一切积极因素，主要地就是指要充分发挥五亿多集体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依靠他们的智慧，敢于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改造自然条件，以便能向自然索取更多的东西，实现农业生产的不断高速度发展。

当然，落后的农业，要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业，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工业的支援，依靠工业来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只有工业能够提供足够的技术设备，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是工业的发展却有赖于农业的首先发展。只有农业首先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其它工业原料，才能保证工业的发展。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地提供粮食和其它原料呢？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消极地等待国家工业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等到农业落后的面貌改变了，才给国家工业提供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原料；另一种态度则是，既依靠国家工业的支援，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五亿农民的双手，依靠人民公社，依靠自力更生的精

神，尽可能地去和自然界进行斗争。能自己做的决不依靠别人，能今天做的决不推到明天；没有洋机器就用土机器代替，暂时没有机械就用肩挑手锄，用苦干、实干来改变生产条件，多打粮食。很明显，前一种态度其结果必然是推迟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持后一种态度，则可以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只有在农业生产中贯彻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自己力量，通过治山、治水，改变恶劣的生产条件，改良品种，改革耕作技术，来实现高产，尽可能多打粮食，多生产工业原料，满足高速发展工业的要求，工业生产才能迅速发展，到头来工业才能有力地支援农业。因此，我们说，在农业生产上贯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有其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农业生产上贯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只是在目前需要，或者只是在困难时期才需要的一种权宜之计。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作风，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根本要求的。它不仅在目前是重要的，即使在农业生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有了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我们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新的高峰。有了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能保证迅速地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我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一天要革命要建设，我们就一天也不能离开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以自力更生精神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归根到底主要地是要落实到每个农村

人民公社中，落实到每个农村人民公社中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及生产队，就其一定的范围来说，都有其相应的外部 and 内部关系。国家的援助，无论是对一个公社来说、对一个生产大队来说，或是对一个生产队来说，都是其外部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公社与公社间的协作、大队与大队间的协作以及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协作，也是就公社、大队以及生产队这些相应范围的外部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单位，都应本着集体主义的精神，有互相支援共同协作的义务；而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则是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因为这种精神要求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得到的事，就坚决自己尽力去做。因此，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不仅不排斥相互协作，而且可以更好地协作。在农业生产中贯彻自力更生精神，必须同时正确地体现自力更生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的联系。因为在农业生产中，为了和比较险恶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如治山治水改土等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往往需要几个生产大队或一个公社甚至几个公社的共同协作才能进行，在这方面，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及其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起了很大的作用，保证了大规模的协作能够顺利进行。这种几个公社之间、几个大队之间或几个生产队之间的协作，形成了伟大的协作力，借以实现以这几个公社、几个大队、几个生产队为范围的自力更生。在如何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以改变农业生产面貌这个问题上，就能很好地处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做到

“能走过去的路，就不让国家扶，能克服的困难，就不伸手向国家要钱”，而且还能向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副食品和工业原料，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处处以国为怀的爱国主义精神。

国家总是尽力支援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可是，国家的援助，目前不仅有限，而且还要有计划地重点使用，不能平均分配；即使在国家有了更多的力量来支援农业实现根本的技术改革时，也还是要重点使用的。每一个公社、每一个生产大队和每一个生产队，都不应该主要地指望国家援助来克服困难，改变生产面貌，即使自己正好就是国家支援的重点所在，也不应该存在依靠国家解决一切困难的思想，仍然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来对待国家对自己的重点支援，要把国家的援助放在刀刃上，尽可能少花国家的钱。也只有把本身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才能有效地利用国家的支援，变外部的力量为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自己，发展自己。因为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只是采取单纯依赖外部的条件，而不首先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自己内部的一切潜力，那末，再好的客观条件，也不能变成促进自己前进的力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许多地区、许多公社，他们的条件一样，国家给予了同样的支援，可是有的地区、有的公社，改变生产条件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他们办到了别人办不到的事，取得了比別人更大的成绩。有的却原地不动，踏步不前。原因固然很多，也很复杂，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

点，是前者首先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依靠自己的力量，挖掘自己内部的一切潜力；同时，他们把优越的客观条件，外部的支援，变成使他们更加奋发图强，苦干实干，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一步一步地改造自然，一步一步地改变生产面貌。像全国闻名的山西大寨大队，广东的茶山公社等等，他们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展开斗争，把农业生产推向一个新的水平。这就说明了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派，他们不做自然的奴隶。毛主席说：“中国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吗？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介绍一个合作社》）这个“主人”的意义，既包括由于政治上的解放，做了社会的主人；又包括在经济上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了自然的主人。正因为如此，在他们那里，充分地解放了人的力量，发挥了人的积极作用，他们才敢于迎着困难走向前去，在困难面前不是后退，而是首先发动攻势。当然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条件也是人去创造的。一个公社，或一个地区，在改变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需要外界的支持，但是像大寨大队和茶山公社那些先进单位，他们决不是坐等和依赖外援，而是把外界的支持变为激励自己艰苦奋斗的动力，努力创造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条件，他们生产的迅速发展，终究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实现的。因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他们那里大放光彩，国家在那里一点一滴的支持，都能产生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的效果。

（本文摘自来稿《试论在农业生产中贯彻自力更生革命精神的意义及方法》）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 阶级矛盾的产物

杨 荣 国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考察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在阶级关系上，便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便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但是，从一个社会来讲，它总是经历着一个发展、变化和衰亡的过程。在这个长时期的过程中，虽然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然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方面，总会随着它的发展、变化而产生不同阶段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方面来考察，不管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如何，又总是阶级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我们必须严格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语），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研究当时各个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在阶级斗争中各自代表的利益，相互对立的思想，各自反映的要求和愿望。按照这样的方法做下去，不论问题多么复杂，头绪多么纷繁，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对问题的不断认识的过程来逐步加深对真理的认识的。

秦末陈涉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起义，我们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应该首先考察这次起义的特点，以及这次起义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次起义是以“甕牖绳枢之子，阝隶之人，迁徙之徒”^①的陈涉吴广为首的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的大起义，其目的是企图推翻嬴秦的种族统治。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至战国以至于秦初，封建的经济关系已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秦政权毕竟还是落后的种族统治的政权，它严重地阻碍着正在发展着的封建经济。

商鞅变法，曾实行过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措施，这些措施，遭到了秦宗室贵族的反对。史称秦之“宗室贵戚”对商鞅“多怨望者”，以致就在商鞅握有大权的时候，其外出时，仍不得不“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脅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闑戟者旁车而趋。”^②秦惠王即位后，车裂商鞅，自是之后，旧贵族势力又抬头，如“孝文王初立，褒

① 《史记·陈涉世家》。

② 《史记·商君列传》。

厚亲戚”^①，“庄襄王立，施德，厚骨肉”^②，这都标志着新兴地主势力在政治上的失势，和嬴姓氏族贵族势力的再起。秦统一六国之后，虽然在中央和地方政权中都吸收了嬴姓以外的人参加，但是这个政权的领导核心依然是嬴姓的宗室力量，保持着氏族贵族的种族统治。所以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下，除了求得种族统治的统一，在政治上有过若干改革之外，在经济上并没有采取过什么有利于地主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反，蓄奴之风很盛，“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③，可以任意买卖和杀戮；同时秦还“收泰半（颜师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之赋”^④，与从前晋国的“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⑤一样，即三分取二。这些，都严重障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上秦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结果造成“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⑥和“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⑦的严重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秦末大起义。

陈涉吴广起义，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这个口号不是起义领袖个人升官发财的问题，而是表明起义者企图推翻旧的氏族贵族统治，直接夺取政权的问题。因为，王侯将相，世代代为氏族贵族所独占。这种独占，在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看来则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荀子在《议兵篇》就说过：“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谿，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谿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这就是说，只有对秦氏族贵族的残暴统治进行斗争，才能改变“天下之民”无以为生的状况，才能适应新兴势力的发展。同时“王公士大夫之子孙”，可以“归之于庶人”，而“庶人之子孙”，也可以“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篇》）荀子的这些话，自是反映了当时新兴阶层的意志的。现在，陈涉吴广进一步提出了王侯将相，并不是只有那些氏族贵族才能戴上的桂冠，而是经过“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战争，就是被压迫者也可以取而代之。这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尝试。

至于起义“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乃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而不是借助于“封建的纲纪”来反对秦的统治。因为在当时来说，除了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是反秦的主力军之外，还包括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乃至一部分六国的旧的贵族势力。虽然旧贵族的反秦主要的是在于恢复旧的割据性的种族统治，但在反秦这一点上则基本是一致的，从而也是可以利用的。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正表明了这一点。“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就是利用他们与秦二世之间的矛盾，来扩大反秦的力量。如《史记·项羽本纪》说，陈涉吴广起义后，东阳少年杀其县令，欲立陈涉为王，陈涉的母亲就认为他不是贵族世家，“今暴得大名，不祥。”结果，“涉乃不敢为王”，

①、② 《史记·秦本纪》。

③ 《汉书·王莽传》。

④、⑦ 《汉书·食货志》。

⑤ 《左传·昭公三年》。

⑥ 《汉书·贾山传》。

而率众归附項梁，說“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這可見當時舊貴族在某些人心目中所占有的地位。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被剝削被奴役的人民起義可以利用這一部分力量，但沒有可能改造這一部分力量，這是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

這次起義，最終推翻了秦朝的氏族貴族的種族統治，以劉邦為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利用人民起義的伟大力量，建立了地主階級的西漢帝國。劉邦入關時便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①所謂“殺人者死”，反映了奴隸不再像秦朝那樣可以任意殺戮；“傷人及盜抵罪”，反映了人的生存權利和私有財產受到了法律的保護。劉邦約法三章的內容，早在戰國時期的荀子就大体上提出來了，荀子在《政論篇》說：“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荀子是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他的思想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邇後，西漢帝國還採取了較多的進步措施來發展封建經濟，如打擊豪強的政策，重農抑商的政策，解放奴婢的政策。西漢打擊的豪強，首先就是六國舊的氏族貴族，如劉邦接受蒯徹的建議，“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②不過，漢朝對於豪強的打擊不是徹底的，也不可能徹底。這表現在一方面打擊，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對他們有所利用。因此，他們不僅在地方上保持着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有的還進入漢政權機構，如武帝時丞相田千秋就是齊諸田之後。特別是東漢時的功臣、外戚，更多是世家著姓，像鄧禹是春秋鄧國之後，馬援是趙將馬服君趙奢的子孫，陰識其先出自管仲，梁冀其先梁益耳為晉大夫，等等。他們除了在政治上取得特權地位以外，還大量地進行土地兼併，和大量地經營工商業，所以這些累代富豪和累代“富商大賈”的經濟勢力，有了進一步的擴展。役使奴隸來從事工商業，這是先秦氏族貴族一貫的主要的剝削方式之一，據《漢書》說：秦地，“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熹為商賈，不好仕宦”。（以上均見《漢書·地理志第八下》）那些大都淵源于先秦氏族貴族和其他豪族的兩漢豪強大姓，就成為代表當時社會的落後勢力。

二

社會發展至西漢末——東漢時代，由於政權日益為世家豪族所控制，致世家豪族勢力有所擴張，耕種他們的“滿野”的“膏田”的人，既有“徒附萬計”的農民，又有“奴婢千群”的奴隸，^③自耕農和小所有者的破產，增多了對他們的依附，受他們殘酷的剝削；而另一方面奴隸制殘余也有所增長；這一來，影響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謂“大姓侵小民”^④，所謂“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為之服役……歷代為虜，

① 《史記·漢高祖本紀》。

② 《漢書·蒯徹傳》。

③ 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④ 《後漢書·馬援傳》。

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少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①，就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于是爆发了有名的赤眉、綠林起义和黄巾大起义。赤眉、綠林起义是西汉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必然发展，而以王莽政权为代表的世家豪族进一步造成“百姓愈病”，无以自存，则加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所以这次起义乃是反对以王莽为代表的西汉政权的起义。赤眉起义后，由于屡战屡胜，使起义地区的地主統治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于是起义軍便产生了在起义地区的“乡里”从事农业生产的思想。它反映出这次起义在反封建的阶级搏斗中，对封建的生产关系給予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和农民一种要求有一块土地自己耕种的愿望。因此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的仍为世家豪族所控制的东汉政权，不得不被迫把一部分无主荒地分給农民，并多次下令释放奴婢。

黄巾起义时，张鈞上灵帝书中說：“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于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可告訴，故謀議不軌，聚为盜賊”。^②因此，从当时統治阶层反映出来的就是要“斬十常侍”，“以謝百姓”，^③企图以此来挽救东汉政权的灭亡。事实上，黄巾大起义正是反对以世家豪族和宦官（常侍）恶势力相勾結的东汉政权的总爆发。

《太平經》說：“极上者当反下，极外者当反内，故阳极当反阴，极于下者当反上；故阴极反阳，极于末者当反本。”^④这是与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統治哲学相对立的思想。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剝削，才造成了“粟粟相从从聚，迺到滿太仓数万亿斛”的大量財富，而农民終岁勤劳，却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这种极不合理的貧富悬殊，自然也就如《太平經》所說的不可以“治安得平”了！所以在《太平經》中比較明确地指出：“或积財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飢寒而死，罪不除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財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絕之，使不得遍也，与天地和气为仇。”^⑤这里的所謂“中和”，虽然有些神秘化的色彩，但这并不能淹沒它的反封建的光輝。如果我們把《太平經》的上述思想与黄巾大起义提出的“蒼天已死，黃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黄巾大起义一方面企图推翻以世家豪族为代表的东汉政权，另一方面也有着要求改变这种貧富不均的社会现象的愿望。《太平經》說的：“此財物迺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錢財，本非独以給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⑥就是一种要求均平土地財富的思想。所以黄巾大起义，张角称天公將軍，张宝称地公將軍，张梁称人公將軍，都冠一“公”字，决非偶然。

① 崔寔：《政論》。

②、③ 《后汉书·张鈞传》。

④ 《太平經·四行本末訣》第五十八。

⑤、⑥ 《太平經·六罪十治訣》。

另外，我們還從所謂老君授與于吉《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的同時，所授的一百八十戒中可以看出，如“不得獨與宗族為親”，“不得罵人作奴婢”，“不得黥奴婢面”，“不得誘枉良人為奴婢”，“不得為人保任券契買賣田宅奴婢之事”，“不得販賣奴婢及自習妓樂”，^①等等，均說明黃巾大起義在反封建的革命戰爭中自亦反對了以豪強大姓為代表的奴隸制殘余。

兩漢政權的傾覆和世家豪族經過上述二次大起義的狠狠打擊，又經過曹操推廣屯田，迫使世家豪族在剝削方式上不得不有著進一步改變，這就是進一步實施佃客制；使佃客制在一個時期內有所發展。可是，屯田制的施行，對於世家豪族來說，總感到是個障礙，不便利他們的盤剝與奴役，因此，當魏文帝為了取得世家豪族的支持，登上皇帝寶座，而實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後，特別是當曹魏政權為世家豪族司馬氏所控制的時代，他們便於公元264年（咸熙元年），以曹魏政府的名義，宣布罷免屯田官，廢止民屯。這一來，世家豪族一方面雖仍繼續推行佃客制，但依附性愈大，所謂“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②，其待遇與役使奴隸少有區別，而另一方面，又廣泛地“以奴代客”，使用奴隸從事生產；因此，生產關係的落後面，在這一時期中，又有所擴大，影響了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加上東晉統治者對內遷的氐、羌各族的壓迫與剝削，於是反對以司馬晉為代表的世家豪族的鬥爭，便接二連三地爆發了。其中規模較大，時間較久，打擊世家豪族較深的，自是東晉末年孫恩盧循的起義。

這次起義，除東晉王朝受到沉重打擊，從而招致傾覆以外，以王、謝為首的世家豪族勢力亦同樣地遭到嚴重的打擊，他們雖仍享有很高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地位，但在政府中的實際力量卻有所削弱，使庶族層力量稍稍獲得若干上升的機會。如南朝的封建統治者，宋、齊、梁、陳，都不是出身於世家豪族，而是庶族。齊高帝就曾經說過，他自己是“布衣素族”，想不到會做皇帝。^③

雖然如此，但魏晉和南朝的世家豪族已經取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絕對優勢，政權實際上仍為他們所控制，所以他們一面仍擁有大量的農民，依於他們為“屬民”為“附隸”，另一方面仍蓄有大量的奴婢，所謂“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役使奴婢從事農業的生產；當時流行的兩句口頭語，“耕當問奴，織當問婢”^④，說明世家豪族中，雖受到東晉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但他們的政治、經濟勢力還沒有從基本上予以摧毀。

同時，自西晉以來，占有大量土地世家豪族，都享有免賦免役的特權，而無地或僅有很少土地的農民，除了受到殘酷的地租剝削之外，還要負擔起日益嚴重的賦稅和力役，為了逃避這種不堪剝削的重負，於是最普遍的方式便是“改注籍狀，詐入士流”^⑤。

① 《云笈七籤·說戒》卷三十九。

② 《晉書·山濤傳·附山遐傳》。

③ 《南齊書·高帝紀下》。

④ 《宋書·謝弘微傳》。

⑤ 《南齊書·虞玩之傳》。

南齐政权便大规模的进行户籍大清查，凡认为属于“改注籍状”而检出的户籍，称为“却籍”，却籍的民户，不仅要服役远戍，而且还遭受到地方官吏的敲榨勒索，弄得“百姓嗟怨”，民不聊生，于是酿成了以唐寓之为首的白籍农民大暴动。所谓“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赤眉”^①，又大大地打击了世家豪族。

南朝经历了若干次的农民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经历了反映若干庶族层利益的力量，反对代表世家豪族利益的政权的斗争，既打垮了腐败的统治，又摧毁了北来的及本土的世家豪族的势力，由是南朝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若干的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景象。

至于北朝，北魏为鲜卑族中的拓跋族，自入主中原以来，便是种族的统治，他们把从战胜中获得的俘虏，作为奴婢，以赏赐王公。其中除服杂役的以外，便是“奴任耕，婢任绩”^②，从事农业生产，故亦流行有“耕则问田奴，织则问织婢”^③的口头语，由于这，故贵族之家还设有“典师”，以“总统群隶”^④。另一面，为巩固其统治，曾下令豪门强族为“州閭所推重者”及“先贤世胄”，“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⑤，对中原地区的世家豪族进行拉拢。

但是，中原地区的社会，是封建制的社会，拓跋族要维持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就不能不在经济方面受到当时中原地区封建经济的巨大影响，不能不对原有的生产方式有所改变，尤其是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紧张，也迫使北魏不得不迅速采取这种步骤，于是在公元485年（太和九年），实行均田制。这正如马克思说的：“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⑥。北魏的均田制，实质上就是“佃官田”，“出租税”^⑦，即由政府颁布法令强制农民附着于土地上，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而向其征收一定数量的田租户调，此外还有沉重的力役。这样一来，通过均田制把农民束缚于政府土地之上，便利了政府对农民的剥削与控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世家豪族，使“细民获资生之利”^⑧。

不过在均田制的实施中，不仅没有触动世家豪族的土地，且由于奴婢有授田的规定，使中原的及鲜卑的世家豪族所保留的奴隶制残余仍严重地存在，有的且多至“奴隶千数”，“经营”“遍于远近”的“田业盐铁”^⑨，同时又“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

① <宋书·张畅传>。

② <魏书·食货志>。

③ <北史·邢贲传>。

④ <魏书·官氏志>。

⑤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21—122页。

⑦ <困学纪闻>卷十六。

⑧ <魏书·李安世传>。

⑨ <魏书·王禧传>。

爵，請九流之貫”^①；这种分別士庶，执行严格的門閥制度，除便利了世家豪族之扩张外，又有利于北魏政权对于各族人民的压迫。故发展至北魏末，酿成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反对鮮卑貴族与中原世家豪族的残酷压迫与奴役，起义持續至六年之久，除北魏政权被打击得搖搖欲墜，从而招致分裂以外，“貴室豪家，弃宅竞窜”^②，致“京邑士子不一存”^③，大大地削弱了世家豪族的势力；所謂“庸人賤品”，則“动至大官”^④，使庶族力量获得了若干的发展。

世家豪族势力經过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虽未能从基本上予以摧毁，但到北周和隋代已呈现衰微的景象。因此，由北周以至于隋初，社会生产力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比較繁荣的景象。隋初农业人口的激增和垦田面积的扩大，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世家豪族的势力虽在政治上与經濟上受到了若干的打击，但隋文帝亦系世家豪族，即有名的弘农楊氏，所以隋統治者对某些世家豪族作了些打击，对另一些世家豪族，如关隴集团又进行拉攏和利用，故当时人民所受的压迫与奴役仍严重存在。随着隋統治者本身愈益残暴，加之对外又进行侵略的战争，加重了对人民的奴役，終于爆发了从山东开始的隋末农民大起义。

起义首先在山东爆发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山东是“一宗将近万宗”的世家豪族势力膨胀的地区，起义从那里爆发，除了隋統治者的各次力役之征和各种軍事上的摊派都比較多地落在这个地区之外，那里的土地兼并也是极其严重的。这从参加起义的主力看，有广大出“租賦丁役”^⑤的农民，又有众多的奴隶^⑥，他們都是受隋的残酷統治与世家豪族的严重压榨的。起义一发动，起义軍便“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⑦，“见人称引书史，輒杀之”^⑧；起义的結果，打垮了隋的残暴統治，又从根本上摧毁了世家豪族的势力。故自是之后，“关东魏齐旧姓”，均“皆淪替”^⑨，而“燕赵右姓”，亦“多失衣冠之緒”^⑩。他們“名虽著于州閭”，而“身未免于貧賤”^⑪，他們的經濟势力和政治势力确实基本上被摧毁了。上述的历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内容。如果我们抽掉了阶级内容，也就不可能对农民战争作具体的历史考察，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

① 《魏书·崔僧渊传》。

② 《洛阳伽蓝記》卷一。

③、④ 《魏书·尔朱荣传》。

⑤ 《資治通鑑·隋紀七》。

⑥ 《旧唐书·丘和传》、《隋书·煬帝紀下》、《資治通鑑·隋紀八》。

⑦ 《資治通鑑·隋紀七》、《旧唐书·竇建德传》。

⑧ 《資治通鑑·隋紀六》。

⑨ 《旧唐书·李义府传》。

⑩、⑪ 《唐会要》卷八十三。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代，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自汉以来，这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春秋战国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世家豪族势力，经过历代的农民运动，发展至隋末农民大起义，是从根本上予以摧毁了；所以他们到了唐代，虽然“犹相矜尚”^①，但因他们“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②，实际力量已去，不能如过去一样的作威作福；并且有的“衣冠子弟”，因家“破亡”而沦为“贱隶”^③。世家豪族势力被打垮，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略有改变，奴隶制残余的基本消灭，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若干的发展。加上当时所疏浚所开发的通济、永济渠以及江南运河所起的便利灌溉便利交通的实际作用，以致社会经济呈现出较之以前各个时代益为活跃繁荣的景象。

与此相适应的是，从北魏以来主要是为了把农民束缚在政府土地上，但对打击世家豪族的经济势力也曾起过若干积极作用的均田制，随着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个体经济的发展，于是均田制就从这“田亩移换非旧额”中，从“贫富升降，非旧第”中^④，自亦随之而解体。所以到了唐中叶，杨炎便建议以两税法来代替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的税制。

随着均田制的解体，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直接掌握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财政权、经济权的直接掌握，和招致军权的削弱，加上唐政权的愈趋腐败，由是而导致其后一个时期的藩镇割据。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势说，这是旧的世家豪族势力被打垮后，当时社会发展中一种必然进展的趋势，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这种藩镇割据又必然导致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历史发展的要求，是通过斗争与酝酿，从而走向以后没有旧的世家豪族势力的新的基础上的统一。唐末的黄巢大起义正是起了这种历史作用。

唐末黄巢大起义之后，经历五代十国，到宋初，社会经济比起唐代来又有比较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进步，土地的开辟，小农的增多，使农业生产日益上升。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除官营商业和手工业之外，北宋还不断解除五代许多禁令，准许私家生产。如果说，唐中叶开始有了农业与私家手工业分离的萌芽，那末，宋代已经出现了农业和私家手工业的分离，呈现出“千室夜鸣机”^⑤的景象。这种分离进一步向前发展，到明中叶以后，便终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① <旧唐书·李义府传>。

② <唐会要>卷三十六。

③ <旧唐书·李天亮传>。

④ <旧唐书·杨炎传>。

⑤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十。

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就是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形成了比过去更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如果说封建社会前期，是以公开的神学之说来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那末，后期便主要是以变相的神学——唯心主义的理学来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这是问题的一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旧的世族贵族的被打垮，新的庶族地主阶级成为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势力，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略有改变，这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有所减轻。相反，在庶族地主中形成起来的大官僚、大地主，又成为新的豪族。他们凭借政治经济势力竞相争夺大量的土地，是最残暴、最贪婪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特别是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剥削欲望也进一步扩大了，地租率的提高和赋税的增多，使农民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也日趋严重。他们的巧取豪夺，使个体经济不仅不能有所发展，而且每时每刻地都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唐代的两税法，本来是把各种租税徭役都包括在内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又不断地增加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即以两税法而论，由于“物轻钱重”，就已造成“倍输”

“三输”之苦。至于土地的兼并，更是从唐中叶以来便“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①。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连僖宗时的翰林学士卢携也不得不认为，“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实无生計”^②。宋初，小农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但到北宋中期就形成了由贵族官僚地主所占有的“赋役所不加者”的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③土地大多为官僚地主所占有，而赋税却绝大部分落在农民的身上。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④。这种“几倍于汉唐之制”^⑤的赋税和封建地租的剥削，使农民“谷未离场，布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未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⑥。至于明代也莫不是如此。自明中叶以来，不仅是皇庄和诸王、贵戚、宦官的庄田遍布大河南北以及山东湖广地区，就是一般地主也占有大量土地，以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⑦。这种土地高度集中的继续发展，就如《日知录》所说的，“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从洪武到弘治的一百多年间，全国税田额减少四百多万顷，但是封建国家的赋税额基本不变。万历四十六年到四十八年，辽餉前后增加了三次；天启时，又有关税、盐课及杂项的加派，崇禎初年的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这种残酷的剥削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使处在水深火热中

① 《陆宣公集》卷二十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③ 《文献通考》卷四。

④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二十五。

⑤ 《文献通考·征榷考》。

⑥ 《宋史·食货志》。

⑦ 《明史·食货志》。

的农民阶级只有起来斗争，反对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唐末农民大起义，黄巢称“冲天大将军”，或曰称“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这样的称号，反映了农民对社会财富不均的抗议，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唐代，农民要求保有小块土地从事生产的征候。大官僚地主郑畋指责黄巢起义“广侵田宅，滥竄貨財”^①，正透露了这次起义在行动上确曾剥夺过地主阶级的田产。

黄巢起义进一步打垮了旧的家豪族的残余势力，经过五代十国暂时纷争的局面，终于在宋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促进了宋初社会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从宋代开始的农民起义，无论是阶级对抗的形势和起义军提出的纲领口号来看都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从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成分来说，除农民依然是主力军之外，宋代的农民起义还加入了贫民、茶贩、盐贩、手工业者、小工商业者等不同阶层的人。到了明代，还出现过矿工的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更卷进了不少的手工业者、矿工、工匠以及小商贩、裁缝、帽商、布贩等不同阶层的人。这意味着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层面的扩大，社会阶级矛盾也更加复杂，并显示着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矛盾的深化。

其次，从宋至明的农民起义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要求政治上平等和经济上平均的纲领或口号，这些纲领或口号反映了农民阶级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和认识的提高，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特点。早在北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吾与汝均之”的口号；南宋初钟相杨么起义更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并且起义农民“以国典为邪法”，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天理当然”，这，不仅否定了封建的财产关系，而且还否定了封建的纲纪和国法。它与朱熹提倡的“三纲”、“五常”为天理当然，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也与统治者所谓“民之有贫富，由其材性智愚不同”形成了根本的对立。至于明代的农民起义，则把宋以来的农民起义的平等和平均的要求向更深的方面发展。自明正統年間，福建佃农邓茂七提出“免冬牲”和“令田主自运租”之后，便接二连三地在许多地区爆发了减租和不输租的斗争，并且蔚为“不辨荒熟，概不输租”^②。这种抗租斗争，实质上就是对封建的产品分配关系的否定，也就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正德初，四川郾本恕等的起义，其领袖都称为“锤平王”、“扫地王”、“括地王”，这些名称都反映了农民群众强烈要求土地的愿望。特别是明末李自成的起义，更完整地提出了“均田免赋”、“三年不征”、“平买平卖”等一系列的纲领口号，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李自成的“均田”口号，是农民的平均思想反对封建土地关系的革命，它不仅反映了广大无地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而且从当时社会发展的特点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的趋势的。不论李自成的“均田”的具体办法如何，但

① <旧唐书·郑畋传>

② 叶紹袁：<启祯纪闻录>卷二。

从丁耀亢的《出劫紀略》和其他有关記載中，可以断定在农民起义过程中曾經剝夺过地主階級的土地則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等貴賤，均貧富”和“均田”的口号，是农民階級反对封建地主階級的等級特权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理論，是农民階級在长期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的实践中必然会爆发出来的革命要求。这种要求是从农民階級的“本能出发的”^①，亦即是从农民所处的政治上被压迫和经济上被剝削的社会地位出发的。列宁說：“剝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剝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識分子’代表中間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② 这一方面，說明了起义农民的革命要求是与封建制度根本对立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只有敢于冲击封建的綱領、理論和制度，才能迸发出起义农民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只有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当然，农民階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从根本上推翻剝削制度和求得自己的彻底解放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农民階級在还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伟大的革命斗争，却是十分可貴的。它是“经过千辛万苦和多年压迫鍛炼出来的要求。”^③ 这种要求，反映了农民階級对于剝削制度的仇視，和对于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剝削的社会生活的向往。虽然他們的斗争都归于失败，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階級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④

×

×

×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階級与地主階級是二个根本对立的階級，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矛盾，便有斗争，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便是階級斗争的最高形式。不断的階級斗争和生产斗争，推动着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使它比較明显地显示出阶段性的特点，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又明显地反映出了階級斗争的不同特点。这就說明了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和階級分析方法不是脱离具体社会历史的空洞原則，而是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綫索。在馬克思主义里，既不存在超階級观点的历史主义，也不存在非历史主义的階級观点。因此，在当前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如何运用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統一的方法去深入地研究，并充分地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討論，从而更深入地全面地把握住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階級斗争的特点，这对我們來說无疑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課題。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13卷，第272頁。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393—394頁。

③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72頁。

④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619頁。

略論农民起义的政权問題

关 履 权

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在战争过程中組織过简单的或复杂的政权，推戴起义領袖称王称帝，提出一些反映农民要求的口号，或者是实行过一些符合农民利益的措施。这些政权无疑是农民政权。但是，有些同志把起义农民建立的政权說成是封建性政权，这是很难令人同意的。

政权“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組織的暴力”^①。因此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最根本的标准应分析这个政权归那个阶级掌握，由那个阶级来领导，它的政策和措施代表了那个阶级的利益，维护那些阶级，打击和镇压那些阶级。但是有的同志在分析政权归那个阶级掌握和领导的时候，仅从政权的成员的阶级阶层成分来论证，如在分析明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性质时，认为大顺政权的成员，不论在中央或地方机构中，几乎全部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并且都是原来明朝的官僚；即使有出身于劳动阶层的成员，但其比例也是很少的，因此便断定大顺政权是封建性的政权。

这种意见值得商榷。根据史实，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所建立的大顺政权，只不过录用了小部分的大多是四品以下的明朝旧官僚，其余的高级官僚多被逮捕、拷打、追赃，不少官僚地主的家产被没收，不少贵族官僚地主被打死杀死，贪暴劣迹的“杂流”（非品官）吏员、武弁也同样镇压。据尚非完全的统计，约有千人左右，其中有姓名或官职可考的有147人。^②即使是录用了比較多的旧官员，或者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人数比例較大，那只是说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在农民政权中的反映，不能以此判断大顺政权的阶级属性。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政权，当年在公社委员会的86名委员中，只有28人是工人，其余是民主派知识分子、职员、医生、教师和新闻记者等，在委员会中，工人并没有占大多数，只有三分之一强，难道我们能因此便否定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吗？显然是不可以的。我们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政权，主要是因为公社的政策和措施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由于公社委员会实际的领导力量是工人，虽然他们在比例上是少数。而且巴黎公社的政权实际是掌握在国民自卫军手中，也就是在武装的无产阶级手中。

考察一个政权的性质，应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但阶级分析不等于只研究这个政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91頁。

② 据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41—142頁及附录表九，参见《明季北略》卷二十。

府中人物的階級出身；更重要的是應該考察這個政權的領導人物的所作所為，代表了那個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的利益，以及這個政府的實際大權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領導集團人物的出身，固然可以反映一定的階級內容，但不能決定政權的性質。因為人們的思想意識行為是隨著他們的生活條件、社會關係和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的。當他們參加了革命以後，即使是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也有可能改變他原来的階級地位。而且政權歸什麼階級掌握和領導，也要作具體分析。大順政權“右武輕文”，正如巴黎公社政權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自衛軍的手中一樣，所有文官都要受權將軍劉宗敏節制，因此這個政權真正的領導者並不是那些天佑殿大學士和六政府尚書，而是出身於勞動階級的以李自成、劉宗敏、李過和田見秀等為首的農民起義軍的重要領袖所形成的核心集團。

至於以大順政權的地方機構成員的成分來證明這個政權的性質，這也是不妥當的。因為這些情況到底不能作為論證一個政權性質的主要根據。1922年11月13日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報告中，談到蘇維埃共和國剛奪取政權的情況時說：“雖然在上面，在我們執掌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還能發揮一點作用，可是在下面，他們要怎麼干就怎麼干，而且常常反對我們的措施。在上面我們有多少自己的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總共不過幾千人，最多也不過幾萬人。但是在下面，卻有幾十萬沙皇政府和資產階級社會留下來的舊官吏，他們反對我們，一部分是自覺的，一部分是不自覺的。在這方面，短時期內無疑是毫無辦法的。在這方面我們要作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善機關，改變它的面貌和吸收新的力量。這個工作我們作得相當快，也許太快了一些。我們辦了蘇維埃學校和工农速成中學，有幾十萬青年在學習，也許學得太快了些，但是，工作總算是開始了，我想，這個工作就會收到成效。只要我們作得不要太匆忙，幾年之後就可以培養出大批青年來根本改變我們機關的面貌”。^①當然蘇維埃政權可以迅速培養自己的幹部來改變蘇維埃地方政權的上述狀況，同時還可以教育改造那些從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官吏，以及對那些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舊官吏分子進行清洗或鎮壓，從而純潔蘇維埃政權的隊伍和不斷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因為蘇維埃政權初建立時下面地方機構中，有幾十萬沙皇政府和資產階級社會留下來的舊官吏，便說這個政權是封建的或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

同樣，李自成的大順政權雖然錄用和保留了一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和明王朝的舊官吏，並且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不可能像無產階級一樣來教育改造他們，但無論如何不能以大順地方政權存在的這種情況，便認為大順政權是封建性政權。因為：（1）大順地方政權的成員系舊官吏或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的並非普遍情況；（2）尚無史實證明大順地方政權執行了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政策措施；（3）即使個別地方政權保護了部分地主階級的利益，也要作具體分析，更不能以偏概全；（4）不僅要看地方政權的所作所為，更要看到大順中央政權的所作所為。

^①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卷，第385—386頁。

但有的同志对此也表示怀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起义领袖当时的实际思想动向，也就是说，这些农民起义领袖是用自己阶级的思想观点，影响和支配着周围的封建地主士大夫阶级呢，还是那些封建地主士大夫阶级的思想观点，在实际上影响和支配着他们？这种论点实际是对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作了过高的要求。应当承认农民阶级是无法摆脱封建纲纪和封建理论的影响的，并且这种影响又是随着政权的发展愈来愈大，最后政权终归失败或变质为封建政权，这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为什么农民革命往往最后便被地主阶级所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至于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否一开始就全部接受了这种影响，使政权成为了封建性质的政权呢？这就要看当时这个政权的具体措施和政策了。“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議、措施等等辯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誰有利’？的问题”。^①还是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为例吧，如所周知，李自成起义軍提出或实行过：“三年錢粮免征”^②，“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貴賤均田之制”。^③“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垦田”。^④更其重要的是农民起义軍政权对地主官僚实行清算或镇压。起义軍进入北京后始終坚持三年免征的政策，百万大軍的粮餉完全取給于对貪官恶霸的清算追赃。当时起义軍政权設有“比餉鎮撫司”，專門办理向明朝的貴族勛戚官僚和富商追赃助餉。这种清算政策不仅在北京执行，而且貫徹到地方州县去。例如所謂：“闖賊搜掘河南富室，窖藏俱尽，以十一賑貧民”。^⑤对“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尝軍”。^⑥农民政权所派出的地方官吏“下車即追比助餉，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初犹謂賈令之虐則然，既而聞各州县皆然”。^⑦地主富室因此紛紛逃跑，原来給他們霸占的田地归还了农民耕种，一向被地主罵为“貪儿”“賤隶”的夺取了“紳衿”地主的“甲第田园”、“陡或富室”^⑧。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人心大悅”^⑨，“趋之如鶩”^⑩，“店市嘻嘻自若”^⑪。能够說这些主张和措施是封建政权的改良措施嗎？显然是不可以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政权的“好皇帝”所实行过緩和阶级矛盾的改良措施，从来没有触犯过地主阶级一絲一毫的利益，与上述农民起义政权的措施截然不同。至于說起义領袖曾經称皇称帝，模仿过封建王朝的样子，設官分职，袭用了封建的政治軍事称号，这些只是表明农民在反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卷，第33頁。

②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九十一。

③ 查繼佐：《罪惟錄》卷十七，《烈皇帝紀》。

④ 張岱：《石匱書后集》卷六十三。

⑤ 戴笠、吳爨：《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

⑥ 《石匱書后集》卷六十三。

⑦ 鄭廉：《豫變紀略》卷六。

⑧ 乾隆《長治縣志》卷二十七。

⑨ 《石匱書后集》卷六十三。

⑩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

⑪ 《明季北略》卷二十。

封建斗争过程中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有的政权形式，不能够创造出新的政权形式，而不能因为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便否定农民政权与封建地主政权在本质上的区别。

看来，要想正确判断农民政权的性质；万不能像马克思所批评的某些庸俗经济学者那样：“乃是在表面性前面匍匐献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东西”。^①而必须首先从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关系着眼，抓住典型的、主要的根据去分析，既不超越历史范围，更不能脱离阶级观点。

农民起义有夺取政权的要求，而且也有建立自己政权的可能，但由于这种政权是产生于封建时代，基础是封建经济，建立政权的农民阶级又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此，农民政权便具备着下面一些特点：

第一、两重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政权具体的措施和政策是革命的，但却沿袭了封建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这种革命内容与封建形式的矛盾正是两重性的具体反映。但我们在判断农民政权的阶级属性时，不能因为它的封建形式而忽视了它的主要的一面——革命的内容。

第二、短暂性。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不仅是随着农民革命的失败而失败，而且农民政权的被消灭或转化变质，一般是先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最后失败。

这从经济基础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民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是不稳定的和不是独立的经济结构，在封建社会中处于依附地位，这就使农民革命既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农民政权也不可能稳定和长久存在。

第三、军事色彩浓厚。农民政权建立于革命斗争时期，所以在组织武装斗争方面发挥的作用，往往超过于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成就。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前期的农民政权表现得更明显。例如秦末陈涉、吴广建立陈州政权以后，以陈州根据地为中心，决定了军事进攻的路线，派出各路大军向南、北、西各方推进，对秦朝统治者进行全面的攻击，陈州政府实际上是反秦的总司令部。而在陈州政权仅仅维持了六个月的时间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新莽末年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更始政权，也是由于“诸将议以兵多而无所统一，欲立刘氏以从人望”^②。然后推定刘玄为皇帝，成立更始政权。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兵多而无所统一”的问题。唐末黄巢起义在长安建立的大齐政权，主要也是为了统一指挥军事继续与唐王朝作斗争。大齐政权除曾采取向地方调发财物的简单征税办法，在长安向富豪进行过一次号称“淘物”的“索财”斗争，将取自富豪的财币分散给穷人之外，便不再见有更多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满足农民愿望的措施。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所建立的政权有过比较多的政治经济措施的有：明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清代的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守土乡官制”、保护工商业和提高妇女地位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鼓舞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同时繁荣了太平天国的经济。但如果我们将太平天国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②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更始元年。

的成果和它在軍事上組織北伐、西征以及粉碎清軍江南、江北大營的進攻所發揮的作用來比較，顯然是後者超過於前者。此外太平天國的地方政權所採取的守土鄉官制，是由於處於戰爭環境，為了實現“寓兵於農”，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其次，太平天國的中央政權組織形式，是由王、國宗、侯、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等組成。形式上，國宗、侯、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等對北王、翼王負責，北王、翼王對東王負責，東王再對天王負責。實際上建都天京後，天王深居宮中，變成名義上的領袖，權力掌握在東王一人手上。而東王、北王、翼王等都是軍事領袖，所以太平天國的中央政權，實際是軍事首領領導下的政權組織。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政權軍事色彩很濃厚，突出的在軍事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組織領導作用，從這方面說，農民革命政權又可稱為農民軍政權。

上面所述，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的農民政權的兩重性、短暫性和軍事色彩濃厚等三個特點是互相聯系的。由於政權本身包含着革命性和封建性的兩個方面，而又必然逐步的向着封建政權轉化，所以表現了它的短暫性。由於政權的短暫，又建立於武裝鬥爭時期，自然也就不能不在組織軍事武裝鬥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政權組織適合於軍事上的需要，顯示出軍事色彩的濃厚。

廣東省經濟學界探討農產量抽樣調查的理論問題

最近，廣東經濟學界部分同志就本省農產量調查試點工作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並写出了若干篇論文，其中有省統計局陳應中同志的〈農產量抽樣調查方法的幾個問題〉（見〈學術研究〉1964年第2期）、許隆同志的〈關於糧食產量抽樣調查方法問題的探討〉、暨南大學經濟系祖延安、慶華同志的〈關於農產量抽樣調查方法的商榷〉、華南農學院農業經濟教研組魏鳳同志的〈關於農產量抽樣調查方法的幾個問題〉等。廣東經濟學會以上述論文為基礎，舉行討論會，就農產量抽樣調查方法問題交換意見。參加討論會的除了上述論文的作者以外，還有省委黨校、華南農學院、廣東省、廣州市統計局、廣東省農產量調查隊、廣東省農業廳和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等單位二十多人。

會上，除了對關於如何估計估產預報、隨機原則在抽樣調查中的作用問題以及關於影響抽樣誤差準確程度的因素等問題交換意見以外，還着重探討了我國現行的兩種農產量抽樣調查方法中，那種方法所抽取出來的樣本最有代表性的問題。

有的同志認為，估產排隊、以單產等距分組、按組平均單產抽樣方法所抽取的樣本最有代表性，理由是：1.按產量進行劃類、分組，能減少調查總體各單位間的差異性，增加其共同性，這是符合統計學上關於共同性愈大，抽樣結果的準確程度愈高的原理的；2.平均值本身就是許多高低不等的畝產經過互相抵消後的最集中表現的數字。圍繞着平均數的單位是多數，因此，樣本總體的平均畝產和調查總體的平均畝產最為接近；3.這一方法能保證樣本在總體平均數的上下均勻分布，形成正態分布（圓滑）、對稱曲線。相反，按面積等距抽樣方法對此很難保證，容易產生左傾斜和右傾斜的偏向；4.運用這一方法抽取樣本時各單位都有被抽中的機會，因為平均值並不是人們任意決定的。

另一些同志認為，估產排隊、按面積等距抽樣方法所抽出來的樣本最有代表性，因為：1.按面積等距抽樣法在抽取樣本時是從整個調查總體出發，按等距隨機原則進行，不受人們主觀意圖的影響，從而保證抽樣總體對調查總體的代表性；2.抽取出來的樣本能均勻分布在總體之中，使樣本中各種不同單位的分布情況與調查總體的分布情況相接近；3.能將抽樣誤差控制在所規定的誤差範圍之內。

還有一些同志認為，這兩種方法各有長處，也各有其缺點，雖然按面積等距抽樣方法優點較多，但在目前條件下，這兩種方法還有同時并存、結合運用的意義。（鳴）

美帝国主义对广东教育事业侵略簡史

黄 廷 柱

一

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侵略之外，更加注重被美帝国主义称为“不外交的外交”的文化侵略活动。仅以教育事业而論，自从美国退还庚子賠款规定用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以后，大約經過四十年的時間，“在中国的二十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間，受美国津貼的即占十七所之多；三百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間，受美国津貼的約近二百所，几占三分之二；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貼的約一千五百所左右，約占全部教会小学的四分之一。”^①这种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大规模的侵略活动，却被美帝国主义宣称为对中国人民的“友誼”。

1950年11月28日，奧斯汀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說：“中国全部大学毕业生中有八分之一曾在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会建立的十三所大学中的一个大学或者一个以上的大学中受过教育……至少有一万五千名中国学生曾在美国在华所支持的各种院校中領受了大学学位，另有一万人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此外据估計有二十五万以上的中国学生曾在美国在华所資助的小学和中学毕业。”这个帝国主义者竟把文化侵略說成是“联系着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金綫”，說成是“美国对中国的传统友誼”。事实果真是这样么？还是从美国伊里諾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給罗斯福的备忘录中的不打自招，来看一看这种所謂“友誼”吧！他說：“那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繼續扩大，那么我們現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因此，他認為“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錢，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說，也能够比用別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隨軍旗更为可靠的”^②。这就十分明白了：在他們看来，“知識青年是国家真正的掌权者”^③，因此通过“教育”来传播亲美崇美的奴化思想，培植一批为美国侵略政策作侵略工具的“未来的国家領袖”，就可以进一步巩固美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統治，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最終目的。

二

美帝国主义对广东的教育侵略活动，也是抱着上述最終目的而逐步扩大和逐步深化

①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87頁。

② 史密斯：《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第213—218頁。轉引自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第35—36頁。

③ J. R. Mott: 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 Conquest P.160.

的；同时又是与我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紧密结合着的。

由于帝国主义长期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作为侵略者鹰犬的传教士早为中国人民所痛恨，因而教会的“布道”工作，阻力很大，到处引起反教风潮，差会成了在中国的孤岛，于是他们便先从海外华侨和国内青年入手，大量开办小学，供给学生膳食和零用钱来吸引贫苦人家子弟入学，以此来欺骗中国人民，改善他们的处境，继续扩大他们的侵略活动。《中华基督教教育事业》报告书中就这样说：“最初之教会学校实为辅助传道而设，传道者既不能得成人之信仰，乃开设学校，俾得集孩童于基督教教义影响之下，迨教徒团体日渐发达，教堂渐已设立，于是乃不得不推广学校，以为养成牧师之基础。”^①至1920年止，全国各地几乎那里有礼拜堂那里就有教会小学，如广州就有四十余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有力地影响了清政府的政治动向的洋务派，绝大部分是出身于这些教会学校的。中国第一个老牌留美学生彻头彻尾亲美派的容闳，就是广东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和加深，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断发展，于是帝国主义便集中力量来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因为中等学校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学毕业后，既可以到工商界、洋行或教会里工作，把教会势力伸入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又可以进一步派遣出洋留学，培养成为“高等华人”，更有力地来笼络我国大小资产阶级和制造在政治上适合他们需要的“人才”，所以到解放前，广东受外国津贴的中学就有十九所，如培正、培英、真光、培道、协和女师、岭大附中、路德、兴华、美华、圣希利达、圣三一、华英男女校等，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竟达十五所，几占教会学校的80%。美国还特别重视在中等学校里吸引中国学生留学的工作，单从1921—1925年广东中等学校留学欧美学生人数统计就可以证明：

年 份 \ 国 别	美	法	英	德	菲	澳洲	合 计
1921年	8						8
1922年	21			5			26
1923年	11		1				12
1924年	4	3					7
1925年	22	6			1	1	33
合 计	66	12	1	5	1	1	86

帝国主义在大力发展中等教育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大学教育的扩展。广州的岭南大学就是美国在华南文化侵略的重要堡垒，被看成是中美两国间的一个强有力的同心纽带。岭南大学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六十年，成了洋奴买办的制造所，正如肖楚女在1926年向广东青年说的：“岭南大学成了广东第一个不革命的大本营，成了未来的资本家、买办的候补所，制造厂。”^②

① 转引自笔影：《揭露美帝教会在中国的侵略》，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4日。

② 《黄埔日刊》，1926年12月25日。

美帝国主义除了通过学校教育作为侵华的重要手段之外，还通过“青年会”、“普世教会”、“普世团契”等组织，把它的魔爪伸展到社会教育方面，使更多的人受到它的欺骗和毒害，起着学校所不能起的反动作用。

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广东的教育事业的侵略活动，由小学而中学、大学，并且逐步渗透到社会教育方面，一步步地加深和扩大，其居心是十分阴险毒辣的，其罪恶是罄竹难书的，突出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美国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侵略方针，是适应它的对华政策而拟定的，同时对广东教育事业的侵略，还具有针对广东一向是革命策源地这一特点。这也就是说，它以神学教育为中心，而以农学教育和医学教育为两翼，形成一个瓦解人民革命力量，阻止人民革命的发展，达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稳定美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统治的目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

美国在高等教会学校里浸透了神学教育的同时抓紧农医两环，其用心是特别毒辣的。先从农学教育说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运动本身“已不仅是为本身经济要求的斗争，从他们斗争所得的经验已能使他们由本身阶级斗争而走入于民族运动道上，在广东政治上几件很大的事变当中，皆有农民英勇的起来参加，这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表现出他很大的力量”^①。美帝国主义面对这股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便阴谋通过农学教育，吸收大批有为的青年投身于“农村工作”中去，以此来阻梗这个运动的发展。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们又极力帮助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迅速恢复在农村的反动统治。

同时美帝国主义还力图在农学教育这个招牌的掩护下，一方面使中国永远安于农业国家的落后状态，另方面有利于对我国各地土壤、气候、农作物等进行调查研究和有关农业经济情报的搜集，从而扩大它的经济侵略，所以美国在燕京、金陵、岭南三所大学都设立农学院，使它在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建立起间谍情报站，为其经济侵略提供重要的情报资料。美国史家韦格在1952年出版的《传教士·中国人及外交家》一书中认为，把中国广大农村列为基督教的势力范围的计划是“美国差会在1920年至1937年间的对外主要决策”，看来是不无道理的。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岭南大学便大力加强“农学教育”的工作，曾于1930年起附设中等课程的农职学校来培养他们的“农村工作”干部，岭大校长钟荣光与协和神学院院长龔約翰（美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借着和伪广州农林局局长凌道阳的关系，在“农学教育”中推行所谓“农村改革”方案。岭南大学也与伪广东省政府搞过“农村改革试验场”，1937—1938年间，还组织一个“战时农村服务团”，深入农村做“经济调查”工作。这一切都说明了这样一个目的，即如凌道阳所招认的：“江西农村在‘国军’克服共区以后，所以能够迅速复原，是得力于当地教会的‘农村工作’。”

① 綺园：《一年来之广东农民运动》，载《黄埔潮》第24—25期合刊，1927年1月7日。

再从医学教育来说，美国一向认为开设医科学校、设立医院是“最聪明与便宜”的侵略方式，因为这种工作“对中国人将有感化作用，不仅在医学方面，而是在西方影响的人生观方面是很有价值的”。所以美帝国主义有时也情不自禁地供认，它本身不是什么“慈善”与“教育”，而是“精神与道德”上的一种“投资”，也就是在思想上麻痹和毒害中国人民，企图使中国人民甘心忍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美帝国主义分子爱略华经常对“同工”人员这样说，“不要轻视医学校和护士学校的力量，广州市医生护士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基督教徒和教会医学院出身的。”他们妄图通过他们训练出来的医生，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羡慕美国的所谓物质文明，并散布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同时还利用巡回施药赠医的方式，进行各地区的病案调查，为美国侵略军提供各种防御疾病的情报资料。再从1902年开办的华南医学院，直接领导的是美国领事Mcwade^①这一事实来看，医学教育如何为美帝国主义政治侵略政策服务，不是最清楚了么？

很明显，美帝国主义的农学教育和医学教育，是一个面向农村，一个面向城市的全面性的侵略方针，“农”、“医”之间互相配合，而以神学教育作为纽带紧密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使医生、农学家本身既是医师、教师，同时也是传教的牧师，甚至是侵略政策的宣传人和执行人。

第二、教会学校成了散播大美国同化主义的重要场所。在教会学校里，他们极力宣传和企图使中国青年接受什么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文明，使人忘记自己的祖国，只爱美国，为其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准备代理人。比如培英中学，过去每逢所谓“校友日”，校长必极力夸耀美国，夸耀在美国帮助下的培英如何教育出“挽救”中国人民的灵魂的“人才”，它和佛山华英中学都开设了“公民”课程，课本是采用美国作家所写的《我的祖国》一书，可见当时美国所办的教会中学，教导中国学生热爱的祖国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被美帝统治四十年的真光中学，除了国文一科外，其余所有课程都用英文原本，连中国历史也毫无例外。在课程里，特设一科“美国礼仪”，专教学生如何接待朋友，如何布置舞会，如何应付异性朋友，如何吃西餐；在家政科里，所教所学，全部美国化，煮西餐做西饼，制西服，布置西式房间；在图书馆里，则充满了美国的书报杂志；在娱乐方面，则常放美国电影，所以不少学生不知不觉间，模仿着美国电影明星的装束和姿态，羡慕美国的“物质文明”，养成了高度的崇美思想，一切的一切，都以为是“美国比中国好得多”，甚至自己是中国人也认为可鄙可耻。岭南大学是美国用来宣扬大美国主义，培养买办思想的主要阵地，他们平时通过授课、講演等方式，一面吹嘘美国怎样“文明”、“民主”、“世界第一”；一面恶毒地污蔑侮辱我国人民，把我国劳动人民说成“肮脏可鄙”、“不诚实”、“可怜的人”。挂着“生物系教授”招牌的特务分子贺辅民(W.F.Hoffman)在讲授昆虫学时，竟公然向该校学生污蔑我国人民说：“中国人蠢，只能教他用手捉虫，如果用药剂，连他们自己也会被毒死。”为了使中国学生忘记祖国，

① 汪维藩：《中国基督教医药事业》。

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岭大的“学堂规则”，明文规定，小考大考一律以英文好坏来定成绩高低，对中学以上学生除列出的七种特殊情况外，平时都要用英语讲话，更荒谬的是，1948年10月，控制该校的“美国基金委员会”负责人富伦(H. C. Frank)，竟然授意学校当局将我国国文和历史两科取消，增加其他英文课程。因此不少学生经过几年的毒化教育后，脑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反动观点，这从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中可以看出。如一篇题为《中美外交关系》的论文中荒唐地认为：“美国初期对华的外交，纯采取和平政策”，对美帝积极侵略我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说成“以后中国在商业外交上可省却不少麻烦，实皆拜美之赐；而中国领土得以完整保存，能苟延残喘，以至于今者，亦有赖美国之援助。”另一篇题为《美国对华商业之研究》的论文中，竟把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投资，说它是“无异一种输血”。由于这种教育的毒害，使不少学生把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竟看成为和中国人民讲平等，讲互利的朋友，甚至在一些学生中间还有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们不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不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而是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从1901—1949年的48年间，岭南大学毕业生共2,419人，而学校办过的各种赴美介绍证件就有二千件以上。从就业方面说，留在国内工作的只1,020人，占总数41.4%，到国外工作的达1,399名，占毕业生的总数58.6%。^①

第三、加强对进步势力的政治迫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1926年1月，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浪潮正在广东高涨时，岭大师生员工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教育权”的口号，全校教职员五百多人正筹组工会，但当时岭大的监督——美帝国主义分子香雅各，却禁止开会，并将入会的工人和进步教授开除。培英中学还组织兰鹰剧社、收买落后分子，组织学生警察。还组织“牛仔精神会”，穿牛仔褲，在校内横行无忌。又如美国牧师在培道中学讲课时，不断向学生进行反动宣传说：“中国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企图离间知识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达到它的反共反人民的目的。

第四、利用学校和各种教学机会进行特务活动：教会学校，一向是被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务活动场所，因此，他们一方面在“发展校务”的幌子下，开设大批分校，成为特务活动的情报网。如培英中学先后在广州西关区，台山县城，江門北街及香港、澳門等地设立分校；岭南大学除在上海联合广东三大公司（大新、先施、永安）设立上海分校外，还在香港、澳門等地开设分校；真光、培正、培道、美华、协和等校，也毫无例外在香港、澳門设立分校。另一方面是那些挂上“教授”、“专家”招牌，或披上“神父”、“牧师”、“慈善家”外衣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以“教学”为名，实际上是在干着特务活动，在中国境内测绘地图，窥探我国边防秘密，深入我省腹地，搜集各种情报。比如岭大前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兼自然博物采集所主任的美海軍情报員賀輔民，由1931年12月10日至1932年2月6日，亲手描繪了江門到越南老街沿途詳細地图30幅，并在鎮

^① 《从岭南大学“控訴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协进》，1952年11月号）。

南关炮台和龙州铁桥，拍摄了不少照片；1950年底，在他家里还搜出我国军用地图六幅，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摄制的我国地形空中照片二十幅，都印有“机密”的字样。另一个披上“生物系教授”外衣的曾当过美国农林部官员的莫古礼 (F.A. Maclure) 曾亲自到海南岛的心脏地带“探险”，攀登五指山高峰，搜集情报。他又曾广泛收集华南气象，珠江潮汐涨落情况，并把中国出产的各种竹子和昆虫标本寄去美国，研究如何利用它们来制造飞机，并为制造细菌战提供必要的材料。一个叫聶雅德 (F.A. Maclure) 的美国特务，自1910年来到岭大后，长期担任物理系主任，他利用岭大天文台，从1918年开始至1950年止，一直供给美国商务部以中国沿海气象情报。他在香雅各的领导下，在中国四十年，不间断地搜集大量有关于我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情报，直至解放初期还没有停止他的活动。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天主教徒韓德輝、潘德民竟在岭大修建“神父屋”，在宗教外衣掩蔽下，进行特务活动。

第五、利用“青年会”和“普世教会”、“普世团契”等团体，向社会青年和各界人民散播所谓“社会改革”，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毒素，并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各种宣传。为了阻止正在蓬勃发展着的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青年会就大搞“道德重整运动”，以“人格救国”作号召，认为中国今日所最需要的不在于海陆军，也不在于兴办实业，而在于人民的道德。他们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由于国民道德的退化，不从改革人心，提倡道德入手，国是救不了的。显然他是要人们安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不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又认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各自的“道德重整”来加以解决，而不应该进行斗争。这种反对阶级斗争，提倡阶级调和，传播“超阶级论”，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精髓。1942年夏，广州淪陷后，中国共产党的广东地方组织和一些进步报刊大力宣传和组织广东人民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时候，当时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就和广州青年会总干事美帝国主义分子駱爱华在韶关挂起“道德重整委员会”的招牌与当时宣传法西斯教育理论的“教育家”崔载阳所标榜的“中国民族教育哲学”的谬论互相呼应，形成了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崔载阳强调应该根据“民族本位”、“民族特征”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新教育体系”。他指出我国的民族特征是一种协进主义、折衷主义，是一种“协和竞进”的民族，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素来是不过问什么政治的。这种“民族教育哲学”，显然是一种十足反动的奴才理论。又例如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针对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情况，“青年会”又打起“到农村去”的口号，大搞所谓“乡村工作”，企图限制和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的纵深发展。为此，1928年基督教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决定在农村大量吸收教徒，并在人和成立“乡村教育实验区”。美帝国主义分子长老会牧师万里博，还设巡回图书馆，在出借和代购所谓进步书刊的幌子下，对乡村青年进行反动宣传。一向在阳江活动的美国特务分子区戴义，也配合这种工作，用教会贷款不收利息作为钓饵，争取当地农民的信任，扩大宗教的影响，他又提倡建立巡回护士的制度，深入农村，借医人为掩护，在农村扎根，以便潜伏，伺机活动。

与此同时，“普世教会”、“普世团契”等团体，又大肆宣传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思想，提倡在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同信仰的集团”。认为凡是信奉基督教的，不分国家、种族或阶级，都是一体，应该团结起来。说什么“宗教促进团结，政治使人分裂”，指出信奉上帝的人，一切都得先要忠诚于上帝，国家民族利益都要从属于它。当日本帝国主义对我进行侵略，激起全国人民一致反抗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利用这种教会的组织形式，一面大倡中日间的所谓“和解”活动，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则是要中国人民背叛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利益，采取不抵抗主义，好让美帝国主义牵住鼻子走。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从而达到一个目的，即维护美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殖民统治。

三

上述一系列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把学校看成是冒险家的乐园和文化侵略的桥头堡。显然，他们所谓“办学”，无非是要训练大批忠实地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的奴才，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的殖民地。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友谊”。可是，在旧中国反动统治时期，也的确有不少人相信了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所谓“友谊”，也确曾有过不少人受了它的反动的影响，并培养出一批亲美崇美以至恐美的知识分子，和一些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奴才。但事物的发展却走到了它的反面，精神的侵略引起了精神的反侵略。这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8月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使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侵略都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和失败。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美帝国主义不再做捣乱的工作了。因为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今天，美帝国主义“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它在大力加强扩军备战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文化侵略活动，做出种种和平姿态，派出什么“和平队”、“友谊工作组”、“海外服务团”等等到“不发达国家”去“帮助工作”。1961年3月肯尼迪就曾经花言巧语地向拉丁美洲人民进行欺骗，说什么“与拉丁美洲大学之间的合作，将意味着与未来的掌权者的合作”。还十分无耻地宣称要把培养各国新兴的“未来的国家领袖的任务”引为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9页。

己的責任。显然这是企图通过教育的渗透来緩和和不可抗拒的拉丁美洲人民的反美斗争，阻止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維持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統治。不管艾森豪威尔也好，肯尼迪也好，现在的約翰逊也好，他們在世界“不发达国家”所玩弄的各种把戏，都是在中国人民面前早已破产的那些旧貨色的翻版，决不能挽救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也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邏輯，他們决不会违背这个邏輯的。”

討論祖国医学阴阳学說的哲学問題的一些論点

在广东省自然辯証法研究組首届年会上，对祖国医学阴阳学說的辯証法問題进行了探討。討論中，着重就有关祖国阴阳学說评价的两个問題交换了意見。

一、祖国医学阴阳学說和中国古典哲学阴阳学說、辯証唯物主义的关系

大家认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說和中国古典哲学阴阳学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祖国医学吸收了后者的积极方面，丰富了它的具体內容，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辯証法思想，試圖从事物的对立統一关系說明生命，人体生理、病理、診斷等方面，并发展成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說。五行学說不是“循环論”，如果把它当作唯心論、封建迷信，或把祖国医学阴阳学說和中国古典哲学阴阳学說等同起来，都是不对的。

其次，大家认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說和今天我們的辯証唯物主义，虽有联系，但却有本質上的区别。前者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发的辯証法指导发展起来的医学阴阳学說，后者是科学的哲学体系。如把果上述二者混淆起来，把“古人现代化”，也是不对的。

二、祖国医学阴阳学說的性質

有人认为，它既是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又是医学理論。这一学說的根本观点，是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辯証法。当它被运用来总结生理、病理等知識和医疗經驗以后，形成了祖国医学的理論体系。它反映了客观辯証法，是貫串整个祖国医学体系中的一条主綫，因而成为祖国医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同时，它又是祖国医学有关生命规律和人体病理診斷、医疗、預防根本规律的学說，反映生命发展和医学的特殊规律，是祖国医学基础理論。

有人认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說是带有朴素辯証观点的医学理論，不是哲学。这一医学理論是以事物对立統一等辯証观点（阴阳辯証关系）为指导，以阴阳概念反映、代表某些当时无法以自然科学闡明的具体細节事物（包括机体），并用它叙述这些事物自身內在的联系，以及事物之間的联系，形成关于生理、病理、治疗、机能等等的一套理論。这一学說的各种阴阳概念反映許多具体事物、具体內容。

科学家和社会主义战士

——学习馬克思治学的革命精神

丘 谷 間

如果对我们来说，一个作家，首先应当是一个革命者，那么，同样地，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首先应当是一个革命家。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馬克思的时候，就曾經这样说：馬克思不論在科学研究或社会活动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他把二者結合得十分紧密，除非我們同时把他当作科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我們永远不能了解他。这确是了解馬克思的一把钥匙。

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馬克思的名字，同任何学究气习一絲儿也不沾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战士，馬克思的学問，又是无与伦比地渊博。这是因为馬克思从来都是把他的科学研究同革命斗争紧密結合在一起，而且始終一貫地坚持着为斗争而学习、为斗争而写作的治学精神。

馬克思治学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敢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树立批判的革命的旗帜。他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合理的部分，摒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杂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从而創立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以这种革命的科学的宇宙观武装了无产阶级。他在研究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說，也采取了同样

的批判的态度，从而創立了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說。可以設想：如若沒有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就决不可能出現嶄新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果——完整的、丰富的、光輝的馬克思主义学說体系。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即一八四三年九月致阿·卢格的信中就說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条式地預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为什么馬克思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能够在学术领域中树立这种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們不能不回到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个根本的立场問題上来。这就是馬克思說的：科学絕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識为人类服务。因此，当他刚刚开始成为辯証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很快就发觉費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如何脱离当时的社会斗争实际，脱离当时的政治，而且不满于这种状况，指出：“理論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論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馬克思早年（1836—1841年）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曾加入过“黑格尔左派”，但当他一投身于社会斗争

的时候，很快地就以自我批判的精神，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中解脱出来，转向为辩证唯物主义者。这一点，同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同他有着明确的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不能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虽然并不抱任何成见，但他从事著作却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传播他研究的结果，同时具有坚定的决心，要给一直还徘徊在空想的迷雾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他公开参加活动，只是为了要促成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这一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当它一取得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导权，就要去建立共产主义。”因此，他在参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活动的同时，总是以战士的身分，出现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上。这样一来，他就能自觉地适应新的时代新的要求，适应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战斗的需要，站在前人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峰去俯视前人所造成的历史科学文化遗产，并在尊重遗产的基础上，批判它，发展它。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

马克思认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他不愿意自己堕落，就决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像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马克思战斗的一生以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的丰富的科学巨著，就是科学研究为革命斗争服务、同革命斗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固不必多说了，就是《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这一不朽的历史著作，也到处闪耀着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光芒。李卜克内西在回忆中说：《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语言，就是箭和枪。他说：“如果憎恨、轻蔑、对自由的热爱，曾经在什么地方用燃烧、破坏和激昂的语言表达过，那就是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这本书里，这本书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怒火综合在一起了。”这种战斗的风格，就像是“一把正正刺中心窝的匕首”。在马克思战斗的一生中，不论是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的造谣说谎，或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骚扰破坏，他都没有轻易放过，而总是面对着种种危害工人阶级事业的论敌进行战斗，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锻造了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因此，弗·梅林怀着非常激越的感情，歌颂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及其崇高的革命坚定性：“从来没有谁像卡尔·马克思似的作过这样多的铲除‘人间苦患’根源的工作。他的船总是在敌人不断的炮火下直冲过风狂浪涌的生活之海。他的旗帜总是竖在桅梢之上，但是那船上的生活对于船长或水手都是不舒服的。”

当马克思诞生一百四十六周年降临的今天，当我们追怀这位伟大的战士和卓越的科学家所走过的光辉的道路的时候，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这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治学的革命精神，高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斗旗帜，面向现实，踏踏实实地去探索许多正待我们去探索的科学真理，坚定不移地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为当代的革命的斗争服务。

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

一定要在基本功上过得硬

鍾 夏

对在中世紀黑暗統治下的思想枯竭和文化雕零发生过“起死回生”作用的文艺复兴，作为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曾給予高度的评价，說“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識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沒落，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和尖銳，农民起义在欧洲的許多国家中此起彼伏，汹涌澎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产生了像达·芬奇、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艺术家，像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魯諾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像哲学領域里的众多的各色各样的唯物主义傾向的哲学家……真可以說是群星灿烂，盛极一时。

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是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的。比起我們当前所处的帝国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伟大大时代，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艺复兴，不过是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的一个“前浪”而已。在我們的空前伟大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应当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更为众多的人民的巨人的时代。特別重要的，是我們这个时代的巨人，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巨人所难以比拟

的；这是因为我們时代的号角，早已不是“十六世紀的馬賽曲”，而是震天撼地的《国际歌》，这就决定了我們时代的巨人，不再是以資产阶级的文人主义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成为資本主义制度的辯護士，而是以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胜利时代的冲锋陷陣的无产阶级战士。

我們所有的学术研究工作，都可以为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而自豪，都沒有权利辜負时代所賦予我們的伟大而艰巨的光荣任务。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輕而易举的。馬克思在致摩里斯·拉·霞特的信上写过这样一句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輝的頂点。”馬克思在这里說的这个“頂点”，自然是就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高度而言的，問題在于要达这个“光輝的頂点”，学术研究工作一定要在基本功上过得硬。

当前，在我国的各个战綫，各个部門，各个崗位上，都像雨后春笋似的出現着許許多多过得硬的人。所謂过硬，就是“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經過勤學苦練，学成了一套能够出色地完成自己所担当的任务的硬功夫和好本領。在我

們时代的革命事业的各个战綫，各个部門，各个崗位上的革命工作者，都有各自的基本功，練就了这套基本功，才算得上过了硬，才有可能达到本行本业的“頂点”。

哲学社会科学战綫上的研究工作者，也有一个过硬的問題。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虽然同其他战綫的工作有所不同，但也要有一套基本功，也要練就能够出色地完成自己所担当的任务的硬功夫和好本領。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上的基本功，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千条万条，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是头一条。因为只有真正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論，去概括和总结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丰富的实践，去檢驗前人的—切学术研究成果，批判地吸取前人的—切成就，探索前人所不敢和不曾探索的重大問題，解决前人所不敢也不曾解决过的重大問題，使我們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几千百倍地和几千万倍地超过前人，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而正是这一条，是历史上的任何伟大的科学家，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巨人所无法达到的，也是我們能够在学术領域里后来居上的最重要、最有利的条件。

这里，过硬的标志，在于“学到手”

三个字；真正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标志，又在于一个“用”字。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說得十分明确：“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两个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贊，就算有了几分成績。被你說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当我們能够正确地深刻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原理应用到我們的实际，包括学术研究工作实际之中，对实际問題，求出正确的結論，就可以說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就可以說在基本功上过了硬。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既然我們有幸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既然我們的时代为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辟了通向人民的巨人的道路，我們就应当做一个像馬克思所說的“不畏劳苦”的人，刻苦地認真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爭取在这方面的基本功过硬，充分地發揮党給我們提供的有利的条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地在科学的“崎岖小路”上努力攀登。完全可以肯定，即使是群星灿烂的文艺复兴，又哪里比得上我們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伟大时代呢！

短论与随笔

評周谷城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論

毛 軍

艺术的源泉是情感而不是社会生活，这是周谷城先生近年来发表的美学論文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史学与美学》中，周先生說：“人的生活，可能不一定都有情感，但美或艺术或艺术品，都是以情感为其源泉的。”在《礼乐新解》中，周先生說：“主观的感情則是乐所涉的范围，扩大一点說，也是一切艺术所涉的范围”。在《艺术創作的历史地位》中，周先生进一步提出：“一个理想提出来，只訴諸情感，不付諸实行；体现情感的东西之自身，即无异于实行的成果。……这样的实现，即艺术的实践。”总之，周先生反复要說明的，就是他認為艺术的源泉不在客观世界，而在艺术家的主观世界。艺术所涉及的范围也只是艺术家的主观感情。

艺术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艺术的源泉？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早已解决了的問題。周先生提出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我們感到有必要就這個問題和周先生进行討論，不仅因为这是文艺理論的一个基本問題，而且因为这是关系到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論原理，对于文学艺术的源泉問題作了科学闡明，他說：“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們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社会生活是艺术創作的唯一源泉，这是由艺术的社会本质所决定的。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看作是經濟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統一体，把各种社会意識形态，包括政治、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都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各种意識形态都在一定的經濟基础上产生，并反作用于基础，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不同作用。文学艺术和其他的社会意識形态，如哲学、政治等社会科学，尽管在反映生活的具体对象、形式和方法上各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但就其本质來說，都是属于社会意識形态的范畴，都是客观现实世界通过艺术家、科学家的主观头脑的反映。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孤立地看艺术的，而是从艺术和整个客观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联系中，首先是从它同社会

的經濟基础、社会結構、階級斗争的联系来闡明艺术的。我們把艺术看作是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識形态，是人对于现实审美的最高形式。既然人的意識只能是被意識到的存在，社会意識只能是社会生活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艺术作为一种意識形态，就不能离开艺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艺术总是人們精神活动的結果，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認識。它是社会生活表现的观点形式之一。艺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依赖于艺术的反映而存在，但艺术却不能离开它所反映的对象，即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从具体的艺术品来看，各个都有它所反映的具体对象，这就是艺术家从生活的海洋中，选取作为自己加工提炼对象的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包括具体事件、人物、环境等等。艺术家从这些客观现实中获得生活材料，摄取題材，通过自己的主观認識进行艺术概括，創造形象，再现生活，这就是艺术創作。先有社会生活，然后才有艺术的創造，这充分說明客观生活先于审美認識，是产生审美認識的源泉；离开了社会生活就无所谓反映，无所谓創作，也就沒有艺术。艺术史証明，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切艺术創作都以社会生活为其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

我們認為，毛主席关于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的論断，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論断。对于文艺和现实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文艺理論家曾經作过无数次的探索，他們从不同的立场、观点，提出各种各样互有分歧、完全对立的见解。在这些錯綜复杂的见解中，凡是把文艺看作客观现实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或者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理論；凡是把文艺看作个人主观精神世界的抒发，或者是物質世界之外“絕對理念”的表现，都是唯心主义的理論。对于周谷城先生的理論，我們也只能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情感是什么？据周先生說，是由斗争的結果产生的，是“由生活的困境逼出，或由生活的順境引起”的。可见，即使按照周先生的說法，情感也不外是主体与客体之間关系的一种反映，是属于人們主观精神世界的东西，对于客观世界來說是第二性的东西。因此，不論周先生的文章中說了多少次“斗争”和“生活上的波瀾”，我們还是認為，把情感說成是艺术的源泉，不能不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論。

在周先生的观点受到应有的批評之后，他写了一系列的答辯文章，在答复王子野同志的文章中，他是这样为自己辯解的：

第一，他說：“資產階級固然認情感为艺术的源泉，无产階級亦未尝不以情感为艺术所决不可少。……感情在无产階級学者眼里，竟也成了形成艺术作品的决定因素。”意思是說：既然你們承認情感因素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你們就得承認情感是艺术的源泉。

第二，他說：“我們可以說艺术源泉是生活，但不能說生活是艺术源泉。这道理太簡單了，正如我們可以說人是动物，但不能說动物就是人。如果說生活就是艺术源泉，那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講的‘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云云，还有什么意思？”“我們只能說，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所产生的情感，被艺术家捉住，使之成体，附以形象，以便独立感人。”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你們說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就是把生活和艺术等同起来了，生活上

感人最深的一段产生的感情，才是艺术的源泉。

这不仅是一种明显的诡辩，而且是对毛主席的文艺理论的曲解。

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很重视艺术作品中的情感因素，这是因为，艺术和其他社会科学比较起来，虽然都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它们的具体对象是有所区别的，反映的内容也有其不同的特点。文学艺术把“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社会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它要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必须把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表现。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社会现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艺术也必然反映客观世界的多方面，这里必然包含着人们对现实关系的认识 and 态度，现实生活中人的思想情感、斗争和愿望。同时，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它特别重视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等等关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的性格及其相互关系，反映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复杂矛盾，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表现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评价和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作用于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情感是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同时，我们还认为，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决不是艺术家个人主观的任意抒发，而是受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它也是客观生活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东西。周先生把艺术作品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夸张为“决定因素”，已经是错了；再加引伸，以无产阶级也重视情感因素为自己的“艺术以情感为源泉”的论点辩护，那就更是大错而特错了。

周先生认为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就会导致生活和艺术等同起来的错误。在我们看来，正是周先生离开了反映论的观点，无视艺术对象和艺术内容的区别；才会把作为艺术源泉的客观生活和作为艺术内容反映在作品中的现实生活混为一谈，排除了艺术家在反映生活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艺术作品中的生活既然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就必然要通过艺术家主观头脑能动的创造，受艺术家世界观，包括思想情感的制约，再现于艺术作品中的现实生活是被艺术家意识到的客观存在。因此必须把艺术对象和艺术内容加以区别，即把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的客观生活和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生活区别开来。客观生活比反映在作品中的生活更丰富、更全面，而艺术作品只能反映它的特定的方面。周先生所引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段话，并不能为自己的论点辩护。紧接着为周先生所引用的这段话后面，毛主席说：“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剥削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从毛主席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艺术家通过艺术形象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创造过程，找到文艺作品反映的生活所以高于普通的实际生活的正确答案。如果按照周先生的说法，“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所产生的情感”才是艺术的源泉，就不可能解释以这个“情感”为源泉的作品为什么会高于产生这个“情感”的生活。而且，把生活分为有情感和没有情感的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难道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所谓

沒有情感的生活嗎？

可見，以生活為藝術的源泉，並不等於說生活就是藝術。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必須經過藝術家頭腦能動的反映，才能成為藝術品。從生活到藝術的創作過程，就是藝術家根據自己的體驗和認識對生活進行加工創造的過程。在這個加工創造過程中，需要集中，需要概括，需要發揮藝術家的想像力。但是這一切都必須以生活為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沒有這個前提條件，就沒有加工創造的對象，就不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作品，無一不是來源於社會生活，無一不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區別只是在於：有些作品直接地反映了社會生活，有些則是作了曲折的反映；有些作品正確地或者比較正確地反映了社會生活，有些則是作了歪曲的反映。

我們知道，曹雪芹如果沒有經歷了由“錦衣執袴，飫甘饜美”到“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的生活，就不可能有《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如果沒有清代科舉制度和吳敬梓對社會生活的體驗，就不可能有《儒林外史》這部傑作。就是像《西游記》那樣描寫神仙妖魔的小說，表面上似乎與社會生活相差甚遠，實際上也是在作品產生的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只有當代美國的“大畫家”猩猩的繪畫和公雞的歌唱，或者類似這種胡鬧的所謂藝術，才是不以社會生活為源泉的。難道周先生也承認這種垂死的資產階級的胡鬧，是什麼藝術創造嗎？有些資產階級作家主張藝術表現情感，然而他們自己的創作實踐卻否定了他們的主張。托爾斯泰曾經說過：“藝術起源於一個人為了要把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傳達給別人”（這和周先生的主張倒是相似的），可是列寧卻根據反映論的原理，說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並且指出：“托爾斯泰極其熟悉鄉村的俄國，熟悉地主和農民的生活。他在自己的藝術作品里對這種生活描繪得這樣出色，使這些作品列入世界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里”。（《列·尼·托爾斯泰和現代工人運動》）

如果說，從前有些資產階級的藝術家和理論家由於世界觀和時代的局限，不能正確認識藝術和社會生活的關係，那末，現代資產階級理論家提出的五花八門的藝術表現主觀精神世界的主張，便是蓄意的欺騙。沒落的資產階級最害怕面對現實，因此把文藝引導向脫離現實的方向，使文藝成為引導人們逃避現實鬥爭，麻痹鬥志的工具，這種藝術表現主觀精神的主張，是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理論。其實，現代資產階級的什麼現代派、未來派、印象派等等的作品，也何嘗不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只不過是極端歪曲的反映而已。魯迅說過：“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凭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証，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的，也不過是三只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魯迅全集》第6卷，第175頁）。資產階級理論家無論怎樣嘔尽心血，也不能推倒一切文學藝術作品都來源於社會生活這一真理。因為社會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

綜上所述，主張藝術“以情感為其源泉”，還是以生活為唯一源泉，反映了兩種藝術觀的根本分歧，實質上是文藝戰綫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在藝術理論上的反映。它牽涉到

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是否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全心全意地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同工农兵结合，走革命化的道路这一根本方向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的高涨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深刻认识毛主席这一指示，具有重大的意义。

解放以来，我国的革命文艺经历着从新民主主义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深刻改造过程，是社会主义文艺建立、发展并将不断繁荣的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以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为内容，大力提倡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所以，反映十四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是当前文艺工作最迫切的中心任务。但是，目前文艺创作的现状和社会主义文艺所担负的重大任务却很不相适应。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创作，在文艺领域的各个战线居于主导地位，其关键就在于文艺使深刻反工作者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必须重新同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走革命化的道路，遵照毛主席指示：“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从而深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而周先生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论，抽掉了艺术的社会生活内容，割断了艺术实践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联系，否定了生活实践是艺术实践的基础的客观真理，从而歪曲了艺术的社会本质。以之指导艺术创作，必然引导社会主义文艺走入歧途。

周先生这种理论模糊了创作与生活的正确关系，不是引导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兵结合，而是引导艺术家脱离现实，脱离斗争，其后果将导致革命文艺背离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周先生认为艺术家只要“捉住情感，藏于记忆”，“使情成体，附以形象”，便可以“造成艺术品”；那么，艺术家只要向自己的主观世界乞求，就可以找到创作的源泉；只要“捉住情感”，“使情成体，附以形象”，便有了艺术品。这正好是同当前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针锋相对。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更有力地反映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更充沛地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迫切要求革命的艺术家长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投身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行列。艺术家也只有投身于实际斗争，熟悉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加强阶级斗争观点，改造思想感情，然后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壮美图景，鲜明地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塑造出光辉的英雄形象，鼓舞人民的革命意志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推动历史前进。反之，如果艺术家热衷于寻找“生活的困境”，捕捉“情感的波澜”，解决“身心不统一”的矛盾，表现“自我的内心世界”，对于革命的艺术家长说，就意味着创作源泉的枯竭，艺术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离开社会主义文艺方向。

可见，周先生的理论是远离科学真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也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

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

王季思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阶级形势、社会风尚的不同，文学上也必然反映出不同的风貌。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所流行的文学作品，如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它们先后之间虽有其承传关系，但归根到底是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之下各自形成一代的文学风貌。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的生活道路、文艺爱好的各异，他们的作品又往往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风格相近的作家又自然形成彼此可以互相区别的流派，如盛唐诗人的边塞诗派、山水诗派，两宋词家的豪放词派、婉约词派。元人杂剧是我国文学史上有作品流传的最早的戏剧形式，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又达到当时文艺的最高水平，部分作品七百年来上演不衰，影响也很深远。本文试图就元人杂剧的时代风貌和不同流派进行初步的探索。由于文学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个人历史知识、理论水平的限制，文中提出的论点只能是尝试性质的。如果这些论点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通过反复研讨，从而引出比较正确的结论，那么，即使原来那些不成熟的论点全被推翻，它究竟也在元人杂剧的研究工作中起了垫脚石的作用了。

元人杂剧同其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如唐诗、宋词、明清传奇，有其明显的不同表现，那就是它的悲歌慷慨、本色当行的时代风貌。当时杂剧创作上的主要流派，即以关汉卿、石君宝、康进之、高文秀等为其代表的本色派，集中表现了这种时代风貌。同时，随着杂剧创作的发展，以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为其代表的文采派也在逐渐形成。

关于我国戏曲流派，明人已有论述。王骥德《曲律·论家数》说：“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绘，便蔽本来。然文人学士，积习未忘，不胜其靡，此体遂不能废。”臧懋循《元曲选序》说：“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乐府，文采烂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优为之。行家者，随所装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是惟优孟衣冠，然后可与于此。故称曲上乘，首曰当行。”这些论述把我国戏曲分为本色当行的行家和文采烂然的名家二派。并认为“曲之始止本色一家”，由于“文人学士，积习未忘”，才产生了“文词家一体”，这

是符合我国戏曲历史发展的实际的。他们认为行家的成就在名家之上，这评价也是我们所以可以接受的。

当行指适应于某一行业的要求，就戏曲说，是指符合于演戏的行业的要求。本色一般就是就语言的自然本色，很少装饰或假借说的。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语言的本色归根到底决定于思想内容的要求。一个接近人民群众、熟悉当时社会各种人物的作家，可以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戏，他的戏曲语言必然是本色的。如果他还对前代流传的诗词歌赋有修养，掌握了传统诗文的有效手法，他还可以在本色的基础上设色加工。反之，如果是一个生活内容空虚的作家，专靠搬弄书本材料来写戏，即使文采烂然，也只能成为一些封建文人案头欣赏之作，不可能通过舞台演出对群众产生积极的影响的。因此就戏曲的本色说，我比较倾向于臧懋循在《元曲选序》里的解释，即“入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所以要“入习其方言”，要“境无旁溢，语无外假”，到底还是为了“事肖其本色”，就是依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描写。它的基本精神是符合于我们今天对于现实主义的解释的。

戏曲脚本最初总是为舞台演出写的，最早的脚本往往只是舞台演出的纪录。如果不是本色，群众听不懂，看得也莫名其妙，它就不能适应舞台演出的要求。因此最初从民间产生的戏曲总是本色当行的。戏曲史上最早出现的戏曲作家直接向民间戏曲学习，也大都具有本色的风格。我们就初期元人杂剧来检查，关汉卿、高文秀等向来被认为本色的作家不必说了；就是王实甫、白朴等开后来文采一派的作家，也是在本色的基础上设色加工的。马致远开始表现较为明显的文采派的倾向，到了元剧后期，郑光祖、乔吉等作家，脱离人民群众的斗争愈远，追求文采的倾向也愈来愈显著了。

关汉卿，向来被认为元人杂剧里的最早作家之一，同时是我国戏曲史上本色当行一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所表现的进步思想，如认为官吏的贪脏枉法是人民痛苦的根源，违背子女愿望的婚姻只有给青年们带来痛苦，主张对压迫者进行报复、反抗，使有可能写出《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表现一定程度的战斗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天从人愿，人定胜天，以及藐视敌人，坚信胜利的思想，又使他的部分作品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从关汉卿的这种思想出发，他作品中所选择的正面人物，即剧中主角，往往是受压迫最深的下层妇女，如窦娥、赵盼儿、杜蕊娘、燕燕等，同时赋予这些妇女以坚强的反抗性格，在她们身上寄托了胜利的希望。即使不是下层妇女，如《单刀会》里的关羽，《西蜀梦》里的张飞，同样表现了斗争胜利的信心和至死不忘复仇的意志。

基于关剧这种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的要求，关剧在关目处理上有它们的特点，这就是把正面人物放在对抗性的矛盾的尖端来刻画，使他们放射出惊人的反抗火花，最后终于击败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胜利。在封建社会里，像窦娥、杜蕊娘、燕燕等下层妇女所遭遇到的种种侮辱、迫害，那是最常见的。因此作者就有可能更好地从现实生活选择

素材，进行艺术概括，体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然而由于当时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及其它上层建筑，受迫害、受侮辱的下层妇女在对她们进行反抗斗争时，并不都是胜利的，特别当她们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更加困难。这样，在故事发展到后半，也即斗争最艰苦的阶段，作者就往往不是按照客观现实的本来面目选择素材，进行艺术概括，而是在斗争中出现幻想的奇迹，如宝娥的对天誓愿，六月下雪，包公的梦见蝴蝶为蜘蛛所网，受到感动等；或者由于意外的巧合，构成胜利的条件，如《救风尘》里的坏蛋周舍要去追赶赵盼儿、宋引章，恰好驢子漏蹄了，馬又产駒了；等到赶上了时，遇到的恰好是封建社会难得的清官，他不但没有胜诉，反而挨了一頓大板子。其他如宝娥死后恰好碰到她父亲去查案；王尚书招亲，恰好招着他以前逼女儿离了他的蔣世隆，也同样是巧合的。关剧关目上这个特点可以用明人在文艺批评方面的一句话来概括：“始正而未奇”^①。“始正”奠定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未奇”表现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我国一部分长期在民间流行的故事，如千里寻夫的孟姜女，以哭倒长城结束；生死相恋的梁山伯、祝英台，以裂坟化蝶终场，都具有类似的性质。可以推想关剧关目的这种安排，同样是接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的。而这一点也正好表现本色派作家与文采派作家的不同，他们主要是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而没有过分重视书本上的材料。

戏剧语言的朴素、本色，决定于作家对现实认识的清楚，是非观念的分明和生活知识的丰富。这样，他就有可能从现实生活里汲取语言材料，通过现实的本来面目来打动观众和读者，而不必从书本上去搬弄模拟。一切当行本色的戏曲家在语言上有其共同的特征，关汉卿在这方面的成就更其突出。他在《宝娥冤》里的曲白写得那么朴素、本色，因为他对当时官府的黑暗以及它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了如指掌的。他在《救风尘》里的曲白写得那么朴素、本色，因为他对当时受压迫受侮辱最深的下层妓女的生活和斗争既十分熟悉，对像周舍那样的浮浪子弟也一眼看透了他内心的种种活动的。

关汉卿的戏曲语言在本色、朴素之中又兼有泼辣的特色，这决定于作家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爱憎，他在《救风尘》中写赵盼儿和周舍的斗嘴，《诈妮子》中写燕燕对小千户的诅咒，《单刀会》中写关羽胜利归来时的豪情胜概，使读者眉飞色舞。然使关汉卿对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没有深切的同情，对周舍、小千户等坏蛋没有强烈的憎恨，他的曲词、宾白就不可能写得那样泼辣。

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杜甫、白居易，他们主要是从儒家的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出发，对人民有所同情，从而写出人民的痛苦，揭露官吏的贪暴，希望朝廷对此有所了解，进而改良政治，缓和阶级矛盾，来挽救封建统治阶级濒临崩溃的危机。受了新的时代气氛的激荡，人民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斗争风起云涌，关汉卿在杂剧里不但写出了当时人民的痛苦，还写出了他们的挣扎和斗争，这是他超过了前代现实主

^① 这句话见《文心雕龙》的《隐秀》篇，是明人伪作的。

义作家的地方。然而关汉卿归根到底只能从“人命关天关地”的儒家入道主义出发来反映人民的痛苦和斗争。他憎恨那不分好歹、不辨贤愚的天地，通过窦娥的口对它百般诅咒，是为了希望出现一个能为人民主持正义的天地：六月下雪，使楚州亢旱三年，对贪官污吏提出警告。他通过窦娥的口指责“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是为了希望出现一个“为天子分忧，为万民除害”的清官，平反了人民的冤狱，恢复了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他在《救风尘》、《望江亭》、《金线池》等戏的结尾都让一个地方官出来判决是非，在《诈妮子》的结尾让受欺骗受侮辱的婢女燕燕在夫人的主持之下嫁给小千户作侍妾，同样表现了这种思想局限。

元人杂剧里写下层妇女的反封建压迫的戏，在关汉卿之外，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石君宝。石君宝遗留下《曲江池》、《紫云庭》、《秋胡戏妻》三个戏。《曲江池》写妓女李亚仙跟郑元和恋爱的故事，当郑元和被他父亲打死时，李亚仙把他救活了，鸨母赶来，叫她搬了他回去，李亚仙说：“常言道：娘慈悲，女孝顺；你不仁，我生忿（即忤逆）。”这跟封建社会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认为“父欲子死，子不得不死”的道德教条是鲜明对立的。正是在这种进步的思想指引之下，作者才有可能把李亚仙写得那样泼辣、可爱。试看她下面这一段跟老鸨顶嘴时的曲白：

“……到家里决撒（决裂意），你看我寻个自尽，觅个自刎。官司知，决然问；问一番，拷一頓。官人行怎亲近，令史们无投奔，我看你哭啼啼带着锁被着枷，低时分……〔云〕走到衙门首古堆邦（死气沉沉的样子）坐地，有人问妈妈：‘你为什么来送了这孤寒的老身？’妈妈道：‘这都是那生忿的小贱人送了我这的！’”

这就说明如果鸨母不答应她和郑元和结合，她便要以性命相拚，就是死了也要叫她吃官司，休想从她身上捞到半点便宜，并把她自杀以后老鸨怎样在衙门里披枷带锁、吃拷受问的景象生动地比划给她看。这些语言是从当时妓女本身的生活里概括出来的，它是多么本色；同时它把妓女跟老鸨的斗争表现得那样尖锐、激烈，因此它又是十分泼辣的。正是在这样坚强的反抗者面前，那老鸨的终于让她把那穷光蛋遇的郑元和留在家才是可以理解的。

《紫云庭》写一个卖唱的妓女韩楚兰跟一个官家公子灵春马爱上了，遭到老鸨和那官老爷的反对，她就和灵春马双双私奔，一路以卖唱为生。后来那官老爷访到了他们的行踪，叫他们到官府里来说唱，并终于让他们团圆。这剧本虽然是个节略本，没有宾白，但从主角韩楚兰的唱辞来看，它是完全依照一个冲州撞府、卖嘴说唱的妓女的特定性格来写的。她受压迫更深，生活经历更丰富，因此斗争也更有办法。韩楚兰在开场时，表白她自己的生活说：

“我勾栏里把戏得四五回铁骑，到家来却有六七场刀兵。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饒《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續添《八阳经》。”①

① 《十大曲》是金元时期民间流行的十首词，见《阳春白雪》卷一；《八阳经》是西晋竺法护译的《八阳神咒经》，是当时“说经家”演唱的篇目。

铁骑、刀兵都是战争故事，《三国志》、《五代史》也都是说唱的篇目。这些话真正做到了“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然而它又多么动人地概括了韩楚兰的生活，表现了她和老鸨之间尖锐的矛盾啊。

现在我们试来看看韩楚兰决心要跟老鸨决裂时的表白：

“今后去了这驼汉子的小鬼头，看怎结末那吃勤儿的老业魔（勤儿是指那些向妓女献殷勤的公子哥儿，老业魔即骂老鸨，结末意即结果。这二句意即我要走了，看你有什么办法）？再怎施展那个打鸳鸯抖搜的精神儿大？只明日管（定会意）舞旋旋空把个裙儿系，劳攘攘干（徒然意）将条拄杖儿拖，早则没着末（意即没归宿），致仕了弟子（即妓女），罢任吧虔婆（即老鸨）。”

被贖作虔婆的老鸨是靠那被称作弟子的妓女过活的。妓女不干了，老鸨也只好跟着“罢任”了。这不仅仅是妓女和老鸨之间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同时也说明了一切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只有那些深受剥削的人们认识得最清楚。在封建社会的作家也只有跟这些被剥削者生活在一处，才有可能认识这种关系，从而把封建社会里这些下层人物的性格写得那么泼辣、鲜明。

《秋胡戏妻》同样是元人杂剧里的杰作，作品里突出的思想是认为妻子为了“整顿妻纲”可以教训教训丈夫。正是在这种进步思想指导之下，作者才有可能把女主角罗梅英的反抗性格写得那么鲜明、泼辣。当她母亲要她改嫁那有钱的李大户时，她可以拿自己那经受过长期艰苦生活考验的硬性子来把她顶回去说：“只我那脊梁上寒噤是捱过这三冬冷，肚皮里凄凉是我旧忍过的飢，休想道半点儿差迟。”当她丈夫在她面前流露出一副无耻的嘴脸时，她会主动向他讨休书，表示宁可沿街讨饭也不能跟他共同生活。

从《曲江池》、《紫云庭》看，石君宝对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熟悉；从《秋胡戏妻》看，他把乡村劳动人民的生活环境又写得那么真切动人。他写罗梅英远望那桑园的景象是：“俺只见野树一天云，错认做江村三月雨。”写她到了桑园时的景象是：“只见那浓阴冉冉，翠锦哎模糊，冲开它这叶底烟，荡散了些枝头露。”这些曲子不仅把剧中人物的生活环境诗化了，同时流露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环境的喜爱心情。关剧就这方面看，未免显得逊色，虽然他描写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有超过石君宝的地方。

为石君宝杂剧创作的这种思想倾向和人物性格所决定，在关目安排上也总是把人物放在带有对抗性质的矛盾的尖端来刻划的。

然而生活在七百年前的石君宝还不可能为李亚仙、韩兰英、罗梅英等受侮辱、受迫害的妇女找出一条跟封建家长彻底决裂的道路，因此作者写她们受侮辱、受迫害时的反抗斗争虽十分动人；而在经过斗争，矛盾缓和下来之后，依然只能以一家父子夫妇的大团圆结束。这同关汉卿的《诈妮子》，杨显之的《潇湘雨》，在结局上有其类似之处。前人说元人杂剧到第四折往往成为“强弩之末”，主要因为作家在最后解决问题时往往流露了调和阶级矛盾的倾向，损害了前面那些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坚强的人物的性格。

杨显之是关汉卿的“莫逆之交”，他的《潇湘雨》也跟关汉卿的《窦娥冤》一样，

七百年来一直上演不衰。剧本写崔通先贫后富，就入赘高门，把千里迢迢来找他的原妻张翠鸾当作逃奴，刺配沙门岛，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然而作者事先既把张翠鸾安排作谏议大夫张商英的女儿，为后来的勉强团圆打了埋伏，又写她的受难是因她父亲触犯淮河神引起的，这就用封建迷信的思想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实质。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另一个戏《酷寒亭》却更值得注意。这个戏里写的大妻小妇争风吃醋、通奸谋害等情事也是当时杂剧中常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剧中以主角登场的草莽英雄宋彬和店小二张保的形象。下面就是张保登场时的一段自白。

“小人江西人氏，姓张名保。为天兵勘乱^①，遭驱被掳，来到回回马合麻沙宜差衙里。往常时在侍长行为奴作婢，他家里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酥、秃秃茶食，我那里吃的。……他屋里一个头领，骂我冤子前冤子后。我也有一爷二娘三兄四弟五子六孙，偏你是爷生娘长，我是石头缝里迸出来的。谢俺那侍长见我生受多年，与了我一张从良文书。本待回乡，又无盘缠。如今在这郑州城外开着一个小酒店儿，招接往来客人。昨日有个官人买了我酒吃，不还酒钱。我赶上扯住道：‘还我酒钱来。’他道：‘你是什么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②我说与你听者：我是个从良自在人。’”

这段自白生动地反映出元初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于当时元朝分中国人为四等：蒙古人最贵，色目人次之，汉儿人又次之，南人最贱，这个已经从良的奴隶被人家白吃了酒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南人。宋彬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人物。后来判罪刺配沙门岛，又扭开枷锁，打死解差，继续在山中聚义反抗。剧中的郑孔目在郑州府衙里作司吏，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却依靠一度结识这个草莽英雄，才能保护自己。这就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起义的声势已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宋彬在下场词里说：“今天下事势方多，四方里竞起干戈。其大者攻城略地，小可的各有巢窠”。这是当时中国人民到处以武装斗争反抗元朝统治的真实反映。杨显之还写过《黑旋风乔断案》的水浒故事戏，可惜没有流传。

杨显之虽没有像关汉卿、石君宝那样擅长写城市下层人民的反抗，却已在部分作品里描写了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他又是一个和民间艺人合作，擅长改编民间戏曲的作家^③。决定于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和创作道路，他杂剧的曲白、关目也向来是以当行本色著称的。

元代前期已出现了专写水浒故事戏的作家，高文秀写了八种，康进之写了两种，红字李二写了五种。这是元代广大农民的武装斗争在杂剧创作上的鲜明反映。从现在留传下来的高文秀《双献头》、康进之《李逵负荆》、李文蔚《燕青博鱼》、无名氏《黄花峪》等几个水浒戏看，它们的共同表现是：

一、剧中受迫害的人物不再向官府控诉，而请求梁山英雄为他们报仇除害。这跟那

① 此句《元曲选》本作“因为兵马嚷乱”，现据《古名家杂剧》本改正。

② 回回人是色目人的一种，达达人即蒙古人，汉儿人指当时中国北方的汉族和女真、契丹等族的人民。

③ 他和当时著名杂剧演员顺时秀熟悉，顺时秀尊敬他作伯父，又因擅长于替民间流传的杂剧补写词曲，因此被称为“杨补丁”。

些以清官判案結束的公案戏有本質的區別。

二、把梁山水滸的環境和梁山英雄美化了。如《李逵負荊》寫梁山泊環境是“霧鎖着青山秀，煙罩定綠楊州”，一片和平美好的景象。寫梁山英雄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拿頭顱相賭。《雙獻頭》、《黃花峪》都寫梁山英雄只身深入虎穴，鏟除了那些為非作歹的惡霸。《黃花峪》寫梁山泊“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東連大海，西接咸陽，南通鉅野金鄉，北靠青濟兗鄆。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數百只戰艦艨艟；三十六座宴台，聚百萬軍糧馬草。聲傳宇宙，五千鐵騎敢爭先；名播華夷，三十六員英雄將。”就儼然是一個氣象興旺的獨立國家。

三、寫梁山義軍內部既紀律嚴明，又上下團結。義軍領袖之間各以兄弟相待，不像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上下等級森嚴，又彼此爭權奪利。

四、全劇關目緊湊，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曲詞本色當行。《李逵負荊》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尤為顯著。從《李逵負荊》中人物矛盾的產生、發展、解決看，是合情合理的。李逵和宋江的矛盾是因李逵誤聽人言、不明事實真相引起的。後來他們調查了事實，分清了是非，問題就跟着解決了。在一些小關目上又處處體現了喜劇的風格特征。如第一折老王林一邊替李逵打酒，一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向他訴述自己女兒滿堂嬌的被搶；第二折李逵上山摹倣老王林的做作聲口，向宋江、吳用轉述老王林的不幸遭遇；第三折李逵和宋江、魯智深下山對質時又摹倣滿堂嬌的聲口，賺老王林打開門來就抱住他當自己的女兒痛哭。這些地方見出作家在安排關目時已注意到全劇風格的一致性。曲詞既本色，又潑辣；既整練，又流走，完全可以和關漢卿、石君寶并駕齊驅。又往往在曲詞中插入說白，曲白結合得更好。

元人雜劇里有不少公案戏，包括關漢卿的《寶娥冤》在內，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相當深刻，但歸根到底是希望朝廷派個清官來替代那些貪官污吏，把政治改良一下。水滸戏就不同，它是反映當時廣大農民要求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的，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當時人民的革命性。

以關漢卿、石君寶為代表的描寫下層婦女反抗封建壓迫的戏^①和以康進之、高文秀為代表的描寫農民起義英雄的戏，以及紀君祥的《趙氏孤儿》，李直夫的《虎頭牌》，無名氏的《昊天塔》、《謝金吾》、《賺蒯通》、《陳州糶米》等，它們共同構成了以悲歌慷慨、本色當行為其風格特征的元人雜劇的主流。它們的成就有大小，但可以肯定都是帶有一定理想色彩的現實主義作品。這在《寶娥冤》、《單刀會》、《秋胡戲妻》、《紫雲庭》、《李逵負荊》、《昊天塔》、《陳州糶米》等雜劇里表現尤為明顯。它們是當時廣大人民在深重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中進行堅決反抗的藝術反映；同時是作家們深入下層人民生活並和民間藝人密切合作的結果。

^① 這裡就他們的主要成就而言。

在向来认为本色派的元剧作家里还有另一种类型，它可以郑廷玉、武汉臣为代表。在郑廷玉现传六个杂剧中，《看钱奴》是最能表现他的独特风格的。剧本写秀才周荣祖带着老婆儿子上京应考，回到家来因墙下藏金被掘，穷得活不下去，只得把亲生儿子卖给当地财主贾仁作养子。过了二十年，贾仁已死，他的养子贾长寿到泰安东岳神庙去烧香，正好周荣祖夫妇叫化到泰安，也在神庙里过宿，就在偶然的机缘里父子相认，一家又得团圆。剧本写周荣祖贫穷落魄，忍痛卖子，以及贾仁的刻薄、吝啬，那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描绘，并表现了作家高度艺术概括的才能的。他写贾仁看上了周荣祖的儿子，但又舍不得出钱，于是特意叫他在字据上写明：“不许反悔，如有反悔，罚宝钞一千贯。”周荣祖问他：“那反悔的人罚宝钞一千贯，我这正钱可是多少？”他说：“我是个财主，指甲里弹出来的你也吃不了。”可是当他把孩子领过来之后，周荣祖问他要恩养钱，他不但分文不给，反过来要周荣祖给他钱。他的理由是周荣祖养不起孩子，如今这孩子在他家里吃饭，就得付饭钱。这场戏把贾仁对穷人的残酷剥削，作了无情的揭露，他连穷人卖儿子的钱都要赖掉，那还有什么不赖的呢？这种刻薄性格是剥削阶级最本质的东西，然而作为一个看守金钱的奴才，贾仁性格里还有另一方面，吝啬。试看他临终时跟儿子的对白：

贾仁：我儿，我这病离天远，入地远，多分是死的人了。我儿，你可怎么发付我？

长寿：若父亲有些好歹啊，你孩儿买一副好杉木棺材与父亲。

贾仁：我的儿，不要买，杉木价高。我左右是死的人，晓的什么杉木柳木，我后门头不有那一个喂马槽，尽好发送了。

长寿：那喂马槽短，你偌大一个身子装不下。

贾仁：哦，槽可短，要我这个身子短也容易，拿斧子来把我这身子拦腰剁做两段折叠着，可不装下了。我儿也，我嘱咐你：那时节不要咱家的斧子，借别人家的斧子剁。

长寿：父亲，俺家里有斧子，可怎么向人家借？

贾仁：你那里知道，我的骨头硬，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口，又得几文钱酬。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要笑痛肚皮，然而就在这些地方，作品血淋淋地揭示了一个被金钱腐蚀了的丑恶灵魂，暴露了剥削阶级的本性：金钱就是生命，就是一切。而为了这一点，甚至在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时，还估摸着怎样占人家的便宜。

从《看钱奴》这些描绘看，不能不承认郑廷玉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家。然而剧中这些人物活动，依照作者的主观解释，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杂剧开场时，就由东岳增福神上场，把周家的福力借给那穷苦的贾仁二十年。这样，贾仁便在砌墙脚时挖到了周家的藏金，替周家看守二十年的财产，最后仍通过他养子贾长寿的手交还给周家。贾仁有了泼天也似家私，为什么还那样刻薄、吝啬呢？在作者看来，不是由于他的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恰恰由于他原来是个做泥水匠的“穷贾儿”，他只能依照神的意旨替那大财主周家看管二十年的钱财，而丝毫不能动用它。这又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

郑廷玉的另外一个影响比较深远的《后庭花》杂剧，通过两件比较复杂的通奸谋杀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与官府的黑暗，同时带有鬼神迷信的色彩。他的

《楚昭公》杂剧写吴兵侵楚的历史故事，曲折反映了侵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同时宣扬“贤达妇三从四德”、“仁孝子百顺千随”的封建道德，还有龙神救护孝子贤妻的描写。

和郑廷玉同时的作家武汉臣，他的《生金阁》杂剧题材跟关汉卿的《鲁斋郎》相似，都是写恶霸强占人家妻子的故事，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然而作品远没有《鲁斋郎》的动人。这首先由于作家的宿命论思想，把剧本主人公郭成的不幸遭遇看成是命定的“血光灾”，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其次是正面人物郭成没有写好，作者写他热中功名，主动向那恶霸出妻献宝，因而招致了不幸，这就降低了人们对他的悲剧的同情。

他的《老生儿》杂剧写的本是地主家族内部争夺家私的丑剧，作者从封建宗法观念出发，大力加以赞扬。

从上面介绍的郑廷玉、武汉臣的杂剧看，可以概括出它们的风格特征是：

一、作品一般缺乏进步的思想倾向，虽然部分场子反映了社会现实，有时还揭露得相当深刻；但往往同时宣扬了宿命论和封建道德。血淋漓的现实惨象和不可抗拒的命运安排、阴森恐怖的鬼神场景交互出现，构成了这些作品的特色。元人杂剧里一些无名氏的公案戏，如《盆儿鬼》、《朱砂担》、《神奴儿》等，同样表现了这种风格特征，它们在民间都有深远的影响。

二、剧中正面人物的不幸遭遇写得相当动人，但缺乏坚强的反抗性格；有时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比正面人物更能吸引人。

三、全剧关目往往从作者的主观想法来安排，而不是从剧中人物的不同环境、性格出发，展开戏剧冲突。由于作家的宿命论思想的支配，往往在作品开始时就出现“神奇”的情节，如由神直接上场宣布剧中主角的命运，或由一个算命先生透露神的意旨，然后按照人物预定的命运安排关目。这些情节是“神奇”的，然而它是歪曲了现实的。而在一些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在戏剧矛盾发展到高潮，剧中正面人物利用一些现实所可能的条件进行斗争而依然未能取得最后胜利时才出现奇迹，如《窦娥冤》的六月飞雪，《孟姜女》的哭倒长城，给人一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感觉，表现了“人定胜天”、“天从人愿”的精神。郑廷玉等作品的最后有时也出现巧合的关目。如贾长寿到东岳神庙烧香，正好碰到周荣祖夫妇在那里叫化。作家这样安排是为了证明神所预定的不可改变的命运，这就不可能给读者一种新奇的感觉。然而由于郑廷玉等作家对当时人民的痛苦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他们又都熟悉舞台生活；因此剧中的部分场子，如《看财奴》的《卖子》，《生金阁》的《献宝》，基本上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安排关目，展开矛盾，跟关汉卿一派作家有其一致之处。

四、语言朴素、本色，但不像关汉卿一派的泼辣。

从上面这些风格特征看，这类作家看到了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但不能正确的解释；看到了被压迫人民的痛苦，但看不到他们的反抗斗争。他们对受迫害的人民有同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不满意，因此可能在作品里局部地反映了现实。然而由于他们没有企图跟广大人民一起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把希望寄托在神灵、在宗教、在封建

統治者，这就使他們不可能像关汉卿一派的作家那样在现实中汲取战斗力量，赋予他們的作品以理想的色彩和乐观的精神。

元人杂剧中这一派本色作家跟关汉卿一派有明显的区别。如果我们肯定关汉卿一派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那他們就只能是爬行的或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正因为这样，前一派的作品往往兼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而后者往往蒙上了一层消极浪漫主义的阴影。

元人杂剧里这两种不同流派的产生，首先决定于不同阶级的观众对戏曲的不同要求。从蒙古灭金到在全中国建立元朝統治的初期，在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錯在一起，广大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前仆后继，他們必然要求在戏曲舞台上看到自己的斗争和胜利，看到敌人的丑恶和失败。这就是关汉卿一派本色作家作品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构成了元剧风格的主要特征。然而当时中国北方的封建社会结构并没有因金元的交替而有所改变。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虽然没有像中国南方那样由于理学家的宣传而深入人心，却依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元初的統治者为了巩固它的封建統治，更大力提倡佛道等宗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思想。从郑廷玉、武汉臣等作品里，我們明显看到了統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当然，比之关汉卿一派作家，他們的作品就比较受到統治阶级的欢迎。

其次决定于不同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今天我们对元代杂剧作家的生活经历知道得很少。然而从蒙古灭金后就废除科举，断絕了许多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士子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道路；当时杂剧作者大多数是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终于和倡优合作的书会才人。这就使他們比较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时在和倡优合作之中逐步掌握了杂剧的艺术形式。这是关汉卿一派作家和郑廷玉一派作家在戏曲创作方面的共同生活基础。这种共同的生活基础，使他們的杂剧都有较为浓厚的生活气息，语言朴素、本色，关目紧凑、当行，符合于当时舞台演出的要求。然而关汉卿通过《竇娥冤》、《救风尘》等杂剧表示要对敌人进行针鋒相对、至死不屈的斗争；而郑廷玉在《忍字記》里宣扬了“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小事成大”的人生哲学。石君宝在《曲江池》里认为对待不仁的父母，子女也可以不孝，在《秋胡戏妻》里认为妻子可以教训教训丈夫来“整顿妻綱”，而郑廷玉在《楚昭公》里宣扬了“賢达妇三从四德”，“仁孝子百順千随”。这种对生活的不同态度不能不在他們杂剧創作的风格上表现出来。

最后还有文艺本身的传统影响。我国向来认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由于燕赵地处边塞，人民生活艰苦，又常有战斗，因此在诗歌风格上也特为悲壮。汉魏乐府里的《入塞》、《出塞》、《关山月》等横吹曲，以及南北朝乐府中的北方民歌《木兰辞》、《敕勒歌》等，充分表现了这种慷慨悲歌的传统。到盛唐时期，高适、岑参等的边塞诗又继承这传统而有所发展。从金人的南下到元兵的灭宋，在这漫长的一个半世纪里，北方中国人民的斗争特别艰苦，同时从契丹、女真等民族流传进来的在馬上弹唱的音乐，

又发展了北方的乐曲风格，使它更适合于表现富有战斗性的曲詞的内容。徐渭《南詞叙录》說：“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馬上之歌。”又說：“听北曲使人神气鷹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这是善于形容北方乐曲的慷慨悲歌的风格的。以关汉卿为代表的集中在当时“玉京书会”里的“燕赵才人”^①，他們所写的以北曲演唱的杂剧可說是“燕赵悲歌慷慨”的文艺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然而应该看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慷慨悲歌的作品，也有愁苦悲叹的作品。在汉魏乐府里，《陌上桑》、《羽林郎》和《孤儿行》、《妇病行》同样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然而前者給人明快的感觉，后者就使人讀了心情沉重。严羽《滄浪詩話》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愁苦，讀之使人不欢。”可见唐詩里同样有这种不同风格的流派。下至宋人話本，如《碾玉观音》中的逮秀秀，《郑意娘传》中的郑意娘，多少給人一些悲壮的感觉。如《菩薩蛮》、《志誠张主管》中的人物就缺乏一种鼓舞人向黑暗现实斗争的力量。我国文学史这些不同作家作品的风格特征在元人杂剧里同样表现出来。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元人杂剧里的文采一派，即臧懋循所称为名家的。

向来有人認為王实甫《西廂記》是元人杂剧里文采一派的代表作，明代戏曲評論家何元朗說它“調脂弄粉”，又說它“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意即說它不本色。王驥德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說：“《西廂》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并嘗之，認為《西廂》全帶脂粉，《琵琶》专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其体固然”是說作品的内容要求这样。王实甫写张生、鶯鶯的故事，他們本来是有文学修养的青年，如果不用这些华丽的詞句，反而不能表现他們的本色。王驥德从作品的内容要求出发理解本色，而不仅仅根据詞句的是否华丽来判断，见解确在何元朗之上。我們从《西廂記》的思想傾向，人物描写，关目安排等方面来看，应肯定王实甫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就这方面看，他跟关汉卿、石君宝等本色作家有其基本一致之处。然而比之关汉卿一派，王实甫的戏曲确实給人一种文采烂然的感觉，因为他在本色的基础上作了較多的設色加工，而这正是表现戏曲史上文采一派的最高成就的。

比之关汉卿、石君宝等擅长写下层妇女的反抗斗争的作家，王实甫就較多地选择上层統治階級里帶有叛逆性格的人物来描繪。这不仅《西廂記》，就是他现传的另一个戏曲《丽春堂》也是写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的。王实甫也写过妓女苏小卿的戏，现在还残留下一折，然而比之关汉卿的《救风尘》、《金錢池》，石君宝的《曲江池》、《紫云庭》，就未免逊色。王实甫剧中的主角虽然在某一个問題上对封建統治階級不滿，如崔鶯鶯在婚姻問題上对老夫人不滿，完顏丞相在用人問題上对朝廷不滿，然而他們本身就是統治階級的成員，在更多問題上和統治階級利益一致。这就决定他們在矛盾冲突中所表现的

① 根据賈仲明在《录鬼簿》里的題記和吊詞看，当时在大都影响最大的玉京书会就集中了关汉卿、白朴、赵子祥等好些作家。

性格不如关汉卿、石君宝剧中人物性格的坚强、泼辣。我們如拿杜蕊娘、李亚仙对鴛母的态度和崔鶯鶯对老夫人的态度比較，可以明显区别出来。其次是在人物描繪上較多采取抒情詩人的手法，由景入情，情景交融，而不像关汉卿那样从人物的不同社会地位出发描写他們对事件的不同态度，由一个矛盾引出另一个矛盾，一步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最后是較多吸收传统詩詞中的詞汇、句法到戏曲中去，曲詞显得比較整練，华美，而不像关汉卿一派作家的善于提炼当时下层社会各种人物的口头語言，以本色、泼辣著称。

和王实甫同时的杂剧作家白朴，风格基本上和王实甫相近，但从他的《梧桐雨》杂剧看，就带有更多的感伤的情味。

元人杂剧里在王实甫、白朴之外，还有另一类以文采著称的作家，馬致远在这类作家中有其代表性。明代文人特別喜愛馬致远的作品，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譜》列他为“群英之首”，不是偶然的。

以馬致远为代表的这类作家作品，不但曲詞、宾白比較华丽，而且表现了更多的封建文人的思想意識。这不仅跟那些接近下层人民和民間艺人的本色派作家不同，就是比之王实甫、白朴等擅长写封建統治阶级内部叛逆者的形象的作家，也有明显的区别。就馬致远遗留下来的七个杂剧看，《汉宫秋》是成就最高的作品，作品中的主角汉元帝以为边塞久和，忠臣有用，可以高枕无忧，可是一旦敌兵压境，君臣上下，一筹莫展，这些描写对封建沒落王朝的批判相当深刻。另一方面作品还通过毛延寿勾引外族入侵和王昭君投江殉国，曲折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他的《荐福碑》杂剧通过书生张鎬的不幸遭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政治的黑暗、社会的混乱。他說：

“这壁拦住賢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塗越有了糊塗富。只这有钱的陶令不休官，无錢的子张学干祿。”

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統治阶级的是非顛倒，貪污成风。他的《青衫泪》杂剧通过裴兴奴的自白对妓女的非人生活，作了血淋淋的控訴：

“經板似粉头排日晚，落叶似官身吊名差。俺那老母呵，更怎当她銀堆里舍命，錢眼里安身，挂席般出落着孩儿卖。几时将繯头紅錦，换一对插簪金釵。”

从这些地方看，馬致远对现实有一定的認識，对封建統治阶级最腐朽的一面表现出一定的清醒态度，对受压迫最深的下层人民怀有一定的同情。馬致远思想里这些积极因素，使他的部分作品如《汉宫秋》，或作品里的部分描繪，如《荐福碑》、《青衫泪》、《陈搏高臥》等戏里的片段，在艺术上取得較高的成就，而有别于那些一味宣扬愚忠愚孝或因果报应的作品，如郑廷玉的《楚昭公》、刘唐卿的《降桑椹》等。

然而馬致远对现实的不滿，主要是从一个封建文人的个人利益受到損害出发的，这在《荐福碑》里表现最明显。《荐福碑》里的书生张鎬那样厌恶他在村塾里的教学生活，只因为这样教下去不知几时是他的发达时节；他在龙神庙里那样怨气冲天，只因为龙神的“杯珓儿”暗示他不能做官。这种封建文人的思想意識在他的《青衫泪》、《汉宫

秋》里同样流露出来。作者在《汉宫秋》里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实际是以封建社会的“名士风流”为蓝本的。他在《青衫泪》里同情妓女裴兴奴，归根到底为了她能够赏识一个“诗措大、酒游花、却元来也会治国平天下”的白侍郎。这样，他剧中主人公在功名得意时就对着皇帝、宰相、满朝大臣，洋洋得意，像张镐、裴兴奴在《荐福碑》、《青衫泪》终场时所表现的那样；在看到宦途险恶、世路艰难时，就逃向山林，逃向神仙，像陈搏、吕岩在《陈搏高卧》、《黄粱梦》二剧中所表现的那样。马致远剧作中这些思想倾向，包括他对现实不满的思想在内，跟他在散曲里所表现的基本一致。他继承了我我国历史上一些对现实有所不满的文人名士的传统，用杂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他成为元代以来在文人里影响最大的杂剧作家之一。

马致远剧作里的宿命论观点同样十分显著，这不仅表现在《荐福碑》、《陈搏高卧》等杂剧，就是《汉宫秋》里的王昭君也自说：“母亲生妾时梦月入怀，复堕于地”。暗示他的不幸遭遇是命定的。《青衫泪》里的裴兴奴在受尽鸨母的磨折时还只恨自己的“年月日时”不好，命该如此，不敢埋怨她的母亲。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马致远剧中的正面人物常常是软弱的，动摇的，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表示无可奈何的态度而带有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这不仅表现在汉元帝、张镐等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身上，就是封建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妓女裴兴奴也未能例外。裴兴奴为了要嫁白侍郎，曾拒绝了阔商人刘一郎的求爱，但当她听到了那伪造的白侍郎的死信时，立即改变态度，主动把刘一郎留下来。我们拿裴兴奴跟关汉卿、石君宝等剧中所描写的妓女比较，她就只能给我们一个可怜虫的印象。

马致远杂剧在人物描写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剧中人物直接倾吐他自己的心情，这跟本色派的作家要按照不同人物的本来面貌来描写有明显的区别。我们看他的《荐福碑》，就好像读他的〔黄钟·女冠子〕一类的散曲，倾吐他“都不迭半纸来大功名一旦休”的痛心；看他的《青衫泪》，就好像读他的〔大石调·青杏子〕散曲，歌颂他“天赋两风流”的姻缘；看他的《陈搏高卧》等神仙道化剧，更像读他的〔双调·夜行船〕、〔般涉调·哨遍〕等散曲，欣赏他“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的世外桃源。普希金在指出莎士比亚和拜伦之间的不同时说：“莎士比亚是个什么样的人，总共只能理解一种性格的悲剧家拜伦在他的面前是多么渺小，拜伦把自己性格的某些特点分配给他的主角。”^①这些区别在关汉卿和马致远之间是同样存在的。

马致远的写剧更多地像写诗，为了情景交融，他比较注意环境气氛对剧情的衬托，而不能掌握人物性格的矛盾，合情合理地展开情节。像汉元帝在灞桥对着满目秋光送他心爱的妃子去国，归来后在嘹唳雁声中引起一连串的回忆和怀思。又像吕洞宾在岳阳楼上面对着“龙争虎斗旧江山”，抒发他的古今兴亡之感；作为抒情诗来读，满不差，然而很难想像它在广场中演出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像《汉宫秋》第四折就是汉元帝的独脚戏，他一个人断断续续唱了十几支曲子，陪衬他的就只有一个哑巴似的小黄门，以及

① 据《俄国文学史》论述普希金部分转引。

在梦里偶然出现的王昭君。

关目安排上的公式化倾向已较为明显地在馬致远的戏曲里出现，特别是他的几个神仙道化剧。开始时总是某一个神仙或教主，发现某处某人有神仙之分，于是下凡去度他，他先是“执迷不悟”，经过酒、色、财、气的种种考验，终于看破红尘，决心出家，于是八仙突然相继出现，接引他同登仙国。

馬致远杂剧的最大成就在语言，尤其在曲词方面，他更多吸收前代诗人词人的成就到戏曲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同王实甫、白朴的杂剧有其一致之处，像《汉宫秋》里那些向来为人所传诵的曲子不必说了，就是他的神仙道化剧里有些曲子在抒情写景方面都有独到的地方。试看陈搏辞朝时唱的〔离亭宴带歇指煞〕：

“把投林高鸟西风里放，也强如衔花野鹿深宫里养。你待要加官赐赏，教俺头顶紫金冠，手执碧玉简，身着白鹤氅。昔年旧草庵，今日新方丈。贫道呵除（除字下疑落了‘睡’字）外别无伎俩，本不是贪名利世间人，只一个乐琴书林下客，绝宠辱山中相。推开名利关，摘脱英雄网，高打起南山吊窗，常只是烟雨外种莲花，云台上看仙掌。”

在作家抒写他对功名富贵的厌弃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时，他把山林隐逸的环境美化了。作品中所表现的这种思想感情并没有超出魏晋以来隐逸诗人、山水诗人的范畴，然而我们在读过文学史上许多田园诗、山水诗之后，最初接触到这些曲子时多少还有一些新鲜的感觉，因为它是通过这种新的文艺形式表现的。语言在工整之中兼有流走之势，他既掌握了向来文人惯用的词汇、声律和对偶，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民间艺人运用语言的手法。

然而馬致远的戏曲有不少地方是为了炫耀渊博或掩饰内容的空虚而滥用文词的。如《汉宫秋》里呼韩邪单于上场时一段广引历史故事的定场白就有点可厌，而且成为明人传奇里许多以骈体写宾白的作品的滥觞。他在《汉宫秋》里的〔梅花酒〕、〔收江南〕二曲，运用连环句式和增句格，浓烈地渲染了汉元帝送别王昭君时的凄凉情绪，成为向来传诵的名作：

“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色早近霜，大褪得毛苍，人捱起纓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辔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迴廊；绕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蛩；泣寒蛩，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藏阴阳，我这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同调的两支曲子曾在《荐福碑》第四折里出现，也用连环句式和增句格：

“呀，张仲泽你试下得，说小生当日，正波进流移，无处可也依栖。他倚恃着黄金浮世在，我险些儿白发故人稀。当日在，村庄里；村庄里，教学的；教学的，谢天地；谢天地，逢风雷；逢风雷，脱白衣；脱白衣，上丹墀；上丹墀，帝王知；帝王知，我身亏；我身亏，那一日；那一日，便心里；便心里，得便宜。”

呀！你今日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你待将福麻坑索换我凤凰池。你道你父亲年老更残疾，他也不是个好，常言道，‘老而不死是为贼’。”

这二曲的格调跟前二曲那样类似，然而读了索然寡味。我想很可能他是先写《汉宫秋》，取得了艺术的效果，于是在《荐福碑》里也如法炮制。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

了更好地表达内容，我們并不排斥文采；而一切不顾作品内容的生搬硬套则必须摈斥。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馬致远的戏曲是有他的特点的。这些特点較多地表现了文人名士的习气，使他成为元人杂剧里另一派文采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戏曲在明清以来文人中拥有广大的讀者，但在舞台方面的影响就远不及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

跟馬致远同时的作家风格相近的还有費唐臣。他的《貶黃州》杂剧写苏轼謫官黃州时唱的〔点絳脣〕曲：

“万頃瀟湘，九天星象，长江浪，吸入詩肠，都变做豪气三千丈。”

是善于抒发这位以风格豪放著称的詩人的胸怀的。然而在元代前期馬致远的同調究竟是少数。到后期情况就不同了，当时著名的杂剧作家郑光祖、乔吉，他們的作品都带有比較浓厚的文人氣息和感伤情調。这跟当时元朝統治的漸趋稳定和杂剧創作中心的南移杭州有关，同时决定于作家的生活道路和文艺爱好。郑光祖、乔吉原来都是北方人，到了杭州，羡慕江南的人才之多，景物之盛，定居下来。在长期同許多南方文人相处之后，生活上既脱离了广大人民的斗争，文艺上也沾染了南方詞家柔媚的习气，他們的創作就不可能继承关汉卿、高文秀等慷慨悲歌的传统发展。

比之馬致远，郑光祖、乔吉更多地把文人名士的风流故事搬上舞台，他們的成就也以这方面为較突出，对明清两代文人戏曲創作的影響也較大，如郑光祖的《王粲登楼》、《倩女离魂》，乔吉的《两世姻緣》、《扬州梦》等杂剧。

馬致远的曲子更多地接受了陶淵明、李白等詩人以及豪放派詞家的成就，这在他的神仙道化剧里表现得更明显。就是《汉宮秋》、《荐福碑》等杂剧，也隱隱在歌曲里传达出悲憤蒼凉的心声。郑光祖、乔吉却更多地接受了李长吉、李商隱等詩人以及婉約派詞家的影响，带有比較浓厚的感伤情調。在音律和修詞上，郑光祖、乔吉比之馬致远更注意了。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引郑光祖《王粲登楼》里的《迎仙客》曲作为写曲子的典范說：“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传（德輝是郑光祖的字）！”主要是就他的注意音律說的。他們都喜欢用典、对偶、組織华美的詞藻，而不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各种人物口头的語言，像关汉卿、石君宝、郑廷玉这些作家那样。他們用这种手法写他們所熟悉的題材时，往往能發揮他們的长技，把他們的曲子写成一首首动人的抒情詩，像他們杂剧里向来为人传誦的片段那样。問題在他們每每喜欢在这些地方卖弄才情，炫耀技巧。乔吉在遇到部分可以随意增加句子的曲詞如〔混江龙〕、〔后庭花〕等，就尽量鋪排。郑光祖喜欢在曲子里嵌从一到十，又从十到一的数字，如《倩女离魂》里的〔十二月〕、〔尧民歌〕二曲。他的《王粲登楼》里有首《搗練歌》，連写了几十句叠字句，如“星眼眼长长出泪，多多多滴搗衣中”等，就完全是文字游戏。

本色派曲家一些动人的曲子或宾白是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中自然流出的，对上文說，它是一連串戏情发展的結果；对下文說，它又是一連串新的戏情的起点。如关汉卿在《詐妮子》里写婢女燕燕在跟小千戶发生爱情之后，邻家女伴在寒食邀她去游戏，她不等終场就匆匆回来时唱的一段曲子：

“年例寒食，邻姬每斗来邀会，去年时没人将我拘管收拾，打秋千，闹斗草，直到个昏天黑地。今年个不敢来迟，有一个未拿着性儿女婿。”

这是燕燕当时的行动和心情的最好表白，同时见出燕燕被小千户骗上手之后仍始终对他怀疑，因而为下文他们之间一连串新的矛盾透露了消息。这样的戏曲语言就必然是生动的，前后血脉贯串的。郑光祖、乔吉等文采派作家的曲子往往是见一物，赋一詞。如《扬州梦》写杜牧到了扬州，看到了扬州的好景致，于是唱了两支歌咏扬州的曲子，他见了牛僧孺，牛僧孺请他喝酒，他又唱了一支赞美酒的曲子；后来牛僧孺拿出笔砚请他题诗，他又唱了一支赞美文房四宝的曲子。这些曲子既不是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就不大能够起活络前后戏情的作用，因而给我们一种死板、呆滞的感觉。

在关目安排上由于这些作家不能从现实生活直接进行艺术概括，就只能模拟前人或互相蹈袭。郑光祖《梅香》的模拟《西厢记》不必说了；他的《王粲登楼》也未能摆脱《冻苏秦》、《举案齐眉》等写书生先穷后贵的窠臼。乔吉的《金钱记》从故事内容看，无疑是《韩寿偷香》的翻板。他的《两世姻缘》的第四场更全仿马致远的《青衫泪》。

他们爱写的人物是文士名流，像王粲、韦皋、杜牧、白敏中等。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小姐、妓女或侍婢，也都爱好谈文应对，带有浓厚的文人氣息。暂时处在他们对立面的事物如蔡邕、牛僧孺、张延赏、韩夫人等也都不是坏人，因此他们之间虽然一度也翻过脸，经过彼此说明，或第三者从中解释，原来都是误会，于是后堂摆酒欢庆，全戏跟着收场。这些戏里没有一个反面人物，有些有钱有势的丈人丈母在他们的穷女婿上门时，开始也不许他成亲，甚至把他轰出门去；但同时总要暗中吩咐另一个人给他鞍马金银，送他上京应考。当女婿取得了功名，不肯认他的丈人丈母时，这个人就出来排解，说老人家当时这样做正是为了刺激他上进。于是那些夫人、员外又成了这些穷秀才的大恩人。这跟关汉卿一派本色作家把人物放在阶级社会的典型环境中去刻画，通过尖锐的矛盾斗争，突出人物的性格，完全是两种作法，效果也截然不同。后者往往通过戏剧冲突揭示了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前者却掩盖了它。

从上面语言运用，关目安排，人物描写一连串的手法看，体现了以郑光祖、乔吉为代表的文采派的共同风格。钟嗣成在《录鬼簿》里批评郑光祖说：“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贪于俳谐”，不仅指在曲词宾白上卖弄小聪明，更重要的是创造笑料，掩盖了血淋淋的现实。“多于斧凿”，主要是说戏剧情节和人物不符合事物本来的面貌，是人工刻划出来的。明末李贽说《西厢记》、《拜月记》是“化工”，是“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而《琵琶记》是“画工”，“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他对《琵琶记》的批评实际上也可以移用于郑光祖、乔吉等的作品。

郑光祖曾以儒补杭州路吏，乔吉是江湖清客之流，他们在当时统治阶级里一般没有什么地位，因此在作品里也流露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对世态炎凉的不满。从他们的部分爱情剧如《倩女离魂》、《金钱记》等看，他们对青年男女追求自愿结合的爱情有同情。然而他们又都是寄生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因此同时在作品里流露了追求功名的庸俗思想，

偶然也通过剧中主角宣扬封建道德的門面話，虽然还不像郑廷玉、秦簡夫那样的头巾气。

和郑、乔二家同时的宫大用，也表现較多的文人习气，他的《范张鸡黍》杂剧有点像馬致远的《荐福碑》，《七里滩》杂剧有点像馬致远的《陈搏高臥》，风格也与郑、乔二家有点不同，要显得豪迈一点。

根据上面的分析，元人杂剧前期作家絕大多数是本色的，但在本色之中，又可以区分为以关汉卿为代表的一派和以郑廷玉为代表的一派。后来由于文人染指戏曲的漸多，开始出现了一些在本色基础上設色加工的作家，王实甫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就。到了馬致远、郑光祖、乔吉等作家就表现了更多的文人习气，脱离现实的傾向和片面追求詞藻、音律的作风也愈来愈严重。

元人杂剧里不同流派的形成，归根到底决定于当时不同观众的爱好，同时和剧作家的生活道路和文艺修养有关。自称为“响咣咣一粒銅豌豆”的关汉卿把那些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写得那么泼辣、生动，如果不熟悉她們的生活，不同情她們的遭遇，同时掌握了表现她們的各种艺术手法，这有可能嗎？郑廷玉、武汉臣、秦簡夫等就比較熟悉地主阶级的生活。康进之、高文秀爱写草泽英雄，郑光祖、乔吉却爱写风流名士。从这些不同作家的杂剧里明显看出他們的阶级烙印；而作品风格的不同，更直接表现了他們的艺术修养。

从一些残余下来的文献看，当时不同风格的戏曲作家已經有了不同的集体組織。关汉卿称他自己的戏曲活动为“我家生活”，又說：“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就宋元时期的戏曲小說看，家就表示流派。当时在大都影响最大的玉京书会就集中了关汉卿、白朴、赵子祥等好些作家，而馬致远和李时中、花李郎等却参加了另一个元貞书会。从他們創作傾向的明显不同看，这两个同时在大都出现的书会之間不可能沒有矛盾斗争。

不同戏曲流派的斗争，首先表现在題材的选择上。关汉卿一派作家写了許多受压迫人民直接起来斗争的戏，馬致远写了四种神仙道士戏，乔吉写了三种文士风流戏，这些不同題材反映了不同阶级阶层对戏曲的要求。其次表现在同类題材的不同处理上。如同写恶霸搶占妇女的戏，关汉卿的《魯斋郎》和武汉臣的《生金閣》就各有不同写法：前者写恶霸魯斋郎见到了人家有长得好的妻子就搶，后者却写那书生自己向恶霸討好，惹火烧身。又如写有权有势的丈人看不起穷女婿，《拜月亭》里的王尚书不管他女婿病得要死，拉起女儿就走，充分勾画出他的凶恶嘴脸。《王粲登楼》里的蔡丞相一面把女婿裹出去，一面又暗叫人看顧他，就比較符合那些員外老爷的口味。不同流派在戏曲創作上的斗争主要表现在这两方面。至于語言的本色或华丽，泼辣或和平，也投合不同观众的胃口，但比之題材的选择和处理，还是次要的。

文学史上的不同流派在互相斗争时往往即互相吸收，詩文如此，戏曲也未能例外。关汉卿的曲子是本色的，然如《单刀会》里写关羽的归舟：“纔解开岸边龙，船分开波中浪，棹搅碎江心月。”又如《詐妮子》里写小千戶的书房：“翠筠月朗籠蛇乱，碧軒夜冷灯香信，綠窗雨細琴书潤。”未尝不华美。王实甫、馬致远偏于文采，然如《西廂

記》惠明送書時唱的大段曲詞和《任風子》里“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等曲，未嘗不本色。關漢卿的雜劇思想傾向比較好，但也出現了像《玉鏡台》那樣贊揚老夫小妻的庸俗作品。他的另一個寫妓女的雜劇《謝天香》，從人物、關目到語言，都帶有更多的文人氣息。元代文采派作家的總成就雖不及以關漢卿為代表的本色派，仍有個別傑出的作品，如王實甫的《西廂記》、白朴的《牆頭馬上》、馬致遠的《漢宮秋》、鄭光祖的《倩女離魂》。因此我們在研究元人雜劇時雖更重視關漢卿、石君寶、高文秀、康進之等作家的成就；仍不能因此抹殺其他流派的長處。

從上面對於元人雜劇里本色派和文采派的論述，我想提出下面幾點意見，作為本文的小結。

一、分析戲曲史上不同流派，應從作品的思想傾向、人物描寫、語言運用等各個方面去考察，過去有些戲曲論著往往只就曲調的本色或華美、豪放或清麗來分析，現在有些文學史又只從題材內容來分，都不能更好說明問題。

二、戲曲史上不同流派的形成，反映了不同階級階層對現實的態度和他們的美學觀點，因此總是跟當時的階級形勢、文藝思潮密切相關。從文藝本身看，又總是跟它以前的文學流派有繼承關係。因此我們不能把它們孤立起來看。

三、我國古典戲曲基本上可分為本色、文采二派。現實主義是前者的特徵，其中部分優秀作品又往往帶有積極浪漫主義的色彩。後者中的王實甫、白朴基本上仍是現實主義作家，從馬致遠到鄭光祖、喬吉，就愈來愈表現脫離現實的傾向，多數作品又帶有濃厚的感傷情調和消極浪漫主義色彩。

四、元人雜劇里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在戲曲史上的影響是深遠的。關漢卿、高文秀等一派本色作家，由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表現了受壓迫人民的反抗鬥爭，長期以來在民間戲曲里有深遠的影響。明清以來民間流行的《賽琵琶》、《白蛇傳》以及三國、水滸、楊家將等故事戲，基本上繼承了這一派作家的創作道路發展。他們寫下層人民如何對敵鬥爭取得勝利，寫農民義軍領袖之間如何面對事實，分清是非，從而團結對敵，對今天的讀者也還有一定的歷史教育意義。至於鄭廷玉、武漢臣一派，就在《琵琶記》、《白兔記》、《殺狗記》等南戲以及明末清初李玉、朱素臣等的作品如《人獸關》、《翡翠園》、《雙熊夢》等戲曲里得到繼承。這些作品中雖也有片段反映現實的，整體說來是宣揚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教條和迷信思想的。王實甫、白朴等文采作家的進步思想傾向在湯顯祖的《牡丹亭》、孟稱舜的《嬌紅記》等作品里得到繼承。而馬致遠、鄭光祖、喬吉等作家却在更多的以名士風流自命的作家里發現了他們的同調。明清傳奇作家里還有混合鄭廷玉、武漢臣和鄭光祖、喬吉二家為一手的，沈璟的《紅蕖記》、蔣士銓的《香祖樓》、《空谷香》等傳奇就明顯表現了這種傾向。他們既宣揚了地主階級的封建道德，又投合那些封建文人的生活趣味。因此向來文人們都把他們捧得很高，今天看來就很少可取了。

潮州方言詞考源

李新魁

近年来因为編写《潮州方言詞典》的关系，对潮州方言的語詞逐个地进行研究，查考它們的源头和本来的书写形式。作这项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一）想了解潮州方言的詞汇系統与汉语共同語詞汇系統的关系如何；方言語詞的来源怎么样，是新創生的多呢，还是保留古汉语或从其他方言借入的多。（二）通过詞語的考証弄清楚詞与詞之間的关系和界限。比如說某些詞語在語音形式上相同，这些同音的詞語之間的关系是同音关系、算是同音詞呢，还是多义关系、算是多义詞？要弄明白这个問題只有把各个語詞的本来面目搞清楚才能作最明确的判定。（三）透过詞語的考究深入探討各种語音现象和語法现象。好像“文白异讀”問題只有通过口語詞的考証才能准确归納出文讀（讀音）和白讀（語音）之間的語音对应关系。（四）解决各詞語的书写形式問題。潮州方言中很多詞語只有其音而无其字，这些詞語在詞典中以什么符号来表示呢？是径直用音标或者用□号表示呢，还是借用同音字来表示？考虑起来这两种办法都不合适。滿卷都是□号或音标未免令人望而生厌，而大量借用同音字則往往会使詞与詞之間在书写形式上的界限分不清楚，也打乱“詞条按領头字排列”的体例。只有把各个詞語本来的书写形式寻求出来才能比較完滿地解决这个問題。說起来，这也就是前人所做的“考本字”的工作。不过我的目的不单在考“字”，而更主要的是考“詞”，即考求各个方言詞与古汉语或其他語言、方言的語詞有什么关系，找出它們的源头。本詞查考出来了，自然也就解决了“字”的問題。因此，与其把这一工作叫做“考本字”，不如說是“考本詞”。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時候，我們一方面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前人的一些經驗教訓，这就是尽量避免牵强附会的毛病。如翁輝东的《潮汕方言》（下文簡称翁书），由于作者沒有运用严格論証的原則，对語詞的音义加以随意曲解，因此，他考求出来的本詞就很多不准确。

應該以什么原則来进行这一工作呢？我們认为：每一个詞都是音、义的結合体，要考求各个方言詞的本詞必須从音和义两方面来进行严格的論証。要确定古代文献中某一个詞就是现代方言某一个詞的源头，必須在讀音和意义两方面找到密切联系的証据，具体的表现是：两者的讀音和意义必須完全相合，如果不完全相合，應該有語音演变、詞义发展的証据来加以闡明，不能单凭語音或意义一个方面的相同、相近或两者都沒有什么內在联系便主观断定某詞就是某一方言詞的源头，也不能簡單地以“一音之轉”、

“音近义通”、“双声、迭韵”等說法代替严格的音、义方面的論証。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牵强附会、主观臆断的毛病。当然，由于語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方言的口头語詞又不是絕對按严格的规律变化的，这就难免在方言詞与本詞之間有某些細小的出入，有不完全吻合的情况。这种情形会給我們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需要研究者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采取馬虎的态度。我們在工作过程中就試圖按这样的原則来做。

潮州方言是从古汉語分化出来的，古代汉語中許多語詞还保存于现在的潮州方言之中。潮州話的一般生活用詞几乎全是古語詞的遺留，这些語詞大都可以在上古或中古时期的文献中找到它們的本詞。一些詞語看起来甚“土”甚“俗”，可是仍然有它的来历。如潮州話称“浅水”为“涸湘水”〔P'aŋ⁴P'iŋ⁴tsui²〕，这也是一个古詞。《广韵》：涸，普伯切；湘，博陌切；“涸湘，浅水”。类此的例子很多，这說明潮州方言詞汇的富于“保守性”。

潮州方言詞語的保守性不单表现在保存大量古汉語的語詞这一点上，而且也表现在詞語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潮州方言詞有許多保存古語詞的原义，沒有像其他方言一样发生引申或变化。如“賽”这个詞，《說文》作“报也”，赵宦光《說文长箋》說：“今俗报祭日賽神借相夸胜曰賽”。今义扩大为一般的“竞赛”，但潮州話仍存古义，一般竞赛不用“賽”而用“𢱿”〔tau³〕，以祭神物品相夸胜才用“賽”（如“賽大猪”、“賽糖獅”）；又如“說”的古义是“解說”或“讲解”，一般的言談不用“說”，后代才用于一般的談說。潮州話一般言談也不用“說”，而是用“諗”〔tɛ̃³〕，“說”只用来表示“讲解”（如“說书”——“讲课”），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情形，一方面表明潮州方言詞汇的稳固性或保守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潮州方言从古汉語分化出来的时期很早，即至少在这些詞語改变意义之前。

通过对潮州方言詞語比較全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潮州方言詞的源头主要就是古汉語的語詞，方言的新創生成成分并不太多，而接受外語的影响也很有限（主要是借用了少量的馬來語詞）。就整个詞汇体系来看，它与閩南方言（潮州話主要是从閩南方言分化出来的）有很大的一致性。这种种情况，表明了潮州方言詞汇发展的稳固性。

下面，我們把已經查考出本詞的詞語挑出一部分写出来，一方面以便就正于讀者，另一方面也提供研究汉語詞源学和方言詞汇的同志們一点参考材料。本文所收录的語詞約占已考出本詞的詞語的十分之一。写进本文的詞条主要是出于下述几点的选择：（一）較為常用的；（二）代表各方面用語的；（三）前人沒有考証过或論証不当的；（四）可以反映出潮州方言与古汉語詞汇方面的关系的。詞条按意义相近挨次排列；注音用宽式国际音标（声调用阿拉伯数字加于右上角表示：1 = 阴平 ˥₃₃，2 = 阴上 ˨˥₄₂，3 = 阴去 ˨˩₁₃，4 = 阴入 ˨₂，5 = 阳平 ˥₅₅，6 = 阳上 ˨˥₃₅，7 = 阳去 ˨˩₁₁，8 = 阳入 ˨₅）。由于篇幅有限，說明尽量从簡。

翁〔aŋ¹〕 潮州話称丈夫为“安”，称“公鸡”为“鸡安”，本詞当为“翁”。《广

韵》东韵：“翁，老称也，亦烏頸毛，烏紅切”；《广雅·释亲》：“翁，父也”；《汉书·高帝纪》集注也说：“翁者，父也”。可知翁原只用于称父，潮州話則用以称夫。

母〔bou²〕 潮州話称妻子为“亩”，方言字写作“𡗗”，本詞当为“母”。即与以父称称夫一样以母称称妻。《说文》：“母，牧也，从女，像怀子形。一曰像乳子也”。《广韵》厚韵：“母，莫厚切，父母”。案“莫厚切”一音与〔bou²〕完全相合，厚韵字在潮州話口語中多念〔ou〕音，如“后、牡、亩、部、剖”等；又明紐字潮州也多念〔b〕母，如“米、馬、煤”等。故〔bou²〕即“母”。以母称妻还可以从“翁姐”的叫法上得到旁証。潮州話合称“夫妻”为“翁姐”，查“姐”的本义也为“母”。《说文》：“蜀謂母曰姐”；《广雅》：“姐，母也”；《广韵》：“羌人呼母”。由此也可証知潮俗确以母称称妻，“亩”当为“母”无疑。

𡗗〔kia²〕 儿子。一般写为“仔”字。案原詞当是“𡗗”而不是“仔”。《广韵》：“仔，即里切，《说文》克也”，音义俱不相合。《集韵》獮韵：“𡗗，九件切，閩人呼儿曰𡗗”；顾况《哀𡗗诗》：“郎罢别𡗗，𡗗别郎罢。閩南方言以父为郎罢，以子为𡗗”；姚宽《残語》也说：“閩人謂子曰𡗗”。潮州話为閩南方言的一支，称儿子为〔kia²〕与上引諸說完全相合，可见原詞为𡗗无疑。又潮州話中有“死𡗗𡗗”（“死𡗗”）〔si²kaŋ²kia²〕一詞，則是不同讀音的詞素的結合：前一𡗗字念的是“讀音”，后一𡗗字念的是“話音”。

𡗗〔k'a¹〕 指脚或腿部。一般徑直用“脚”字表示。其实潮州話中的〔kio?⁴〕（如“脚錢”）才是“脚”（《广韵》：“脚，居勾切”），〔k'a¹〕当是“𡗗”。《说文》及《文选·射雉赋》徐注：“𡗗，脛也”（案“脛”即“脚”义，《说文》脚字下注云“脛也”）；《玉篇》：“苦交切，脛也”；《尔雅·释畜》郭注：“𡗗，膝下也”；《考工记·輪人》郑注：“人脛近足者細于股謂之𡗗”。音义全合。翁书以为“π”，誤。

𡗗〔p'a¹〕 潮州話称膀胱为“抛”〔p'a¹〕，原詞当是“𡗗”。《说文》：“𡗗，膀光也”；《广雅·释亲》：“膀光謂之𡗗”；《广韵》肴韵：“匹交切，腹中水府”；《史记·仓公传》：“风痺客𡗗”，正义：“𡗗，膀胱也”。

𡗗〔am⁶p'uaŋ⁵〕 围巾。《说文》：“𡗗，复衣大巾，或以为首𡗗”（《广雅》：“𡗗，带也”）；《玉篇》：“步丸切，复衣大巾”；《广雅》：“𡗗，巾也”；《广韵》桓韵：“𡗗，大巾”，音义全合。

手𡗗〔ts'iu²ŋ²〕 袖子。《类篇》：“𡗗，委远切，袖端屈”；《方言》郭注：“衣標江东呼𡗗，音婉”，查“委远切”一音与〔ŋ²〕完全相合（“远”字潮州口語即念〔hŋ⁶〕）；而衣標也即衣袖。標，《玉篇》：“衣袂也”；《类篇》：“袖端也”。

𡗗〔k'a¹kiou²〕 綁腿布带。旧时士兵多“拍𡗗𡗗”（打綁腿）。《广韵》：“𡗗，古了切，脛布也”；《玉篇》：“脛行膝也”。音义全合。翁书作“脚糾”，誤。

日昼〔dzik³tau³〕 中午。《玉篇》：“昼，知又切，日正中”；《广韵》宵韵：“陟救切，日中”。案宵韵字潮州口語多念〔au〕音，如“臭、留”等，音义全合。翁书謂“应作日聞”，“盖正午之时，日地对照，殆有两星陵击意”，語殊牵强。

冥〔mē⁵〕 晚上。一般以“夜”为〔mē⁵〕，实为誤解。案〔mē⁵〕非“夜”，“夜”当讀为“也”（《广韵》：“夜，羊謝切”）。〔mē⁵〕的原詞为“冥”（字又写作“暝”）。《集韵》：“冥，眉兵切，暗也”，又：“夕也”；《广韵》青韵：“莫經切，暗也，幽也”；《玉篇》：“冥，夜也”，音义全合。可知原詞为冥，以夜为冥，属“訓讀”现象。

东司〔taŋ¹si¹〕 厕所。案古代厕所多建于房屋之东面，故曰“东司”。古人多用此詞，如《传灯录》：“赵州諗謂文远曰：东司上不可与汝說佛法”；又朱暉《絕倒录》載宋人拟《老饕賦》有“寻东司而上茅”之句。翁书引《詩·陈风》“东门之池”为証，謂“东司”原是“东池”，妄逞臆說。

猪𦍋〔te¹ko¹〕 潮州話称公猪为“猪哥”，原詞当为“猪𦍋”。《說文》：“𦍋，牡豕”；《玉篇》：“古暇切，牡豕”；《广雅·释兽》：“𦍋，雄也”；《方言》八：“猪北燕朝鮮之間謂之𦍋”；《左传·隱公十一年》：“郑伯使卒出𦍋行出犬鸡以詛射穎考叔者”，正义：“𦍋，謂豕之牡者”。

松树〔seŋ⁵ts'iu⁷〕 潮州話称榕树为“承树”，案实即“松树”。潮州話之所以称榕为松，盖古松字与榕字通同，《說文》松字又作𣎵，謂“松或从容”；《集韵》松字下注云：“祥容切，古作𣎵、𣎵或书作榕”。故潮州以“松”称“榕”。《五杂俎》說：“榕木惟閩广有之……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案松字古作𣎵，則亦与榕通用矣”。

藻〔p'io⁵〕 浮萍。一般把“萍”字当作“藻”，也属“訓讀”。《广韵》宵韵：“藻，符霄切，《方言》云，江东謂浮萍为藻”；《尔雅》注也曰：“萍，江东謂之藻”。

粿〔kue²〕 潮州話把米制糕餅称为〔kue²〕，一般写为“粿”。案粿非原詞，粿义为“精米”，本詞当是“𣎵”。《广韵》：“𣎵，古火切，餅𣎵食”。字又写作“𣎵”。《玉篇》：“古火切，餅子也”。

侯栗〔kau⁵lak⁸〕 潮州話称栗子为“猴力”，原詞当作“侯栗”或“猴栗”。《广志》：“关中侯栗大如鸡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虔州南有漸栗，形如枣核；李卫公会客盘中有猴栗”。侯栗之称，唐代已然。栗，《广韵》质韵：“力质切，坚也，又果木也，《汉书》曰：燕秦千树栗，其人与千户侯等”。栗之称侯栗，疑与千户侯之說有关。案质韵字潮州口語多有念〔ak〕韵者，如“密、漆”等，故栗也作〔ak〕音。

蓮藪〔nōi⁵kau⁶〕 潮州話称蓮藕为“蓮厚”，本詞当为“蓮藪”。查藪字《玉篇》作“古鮑切，藕根”；《广雅》：“藪，株根也”；《类篇》：“藕根也，江东謂之藪”。音义全合。

竹篙〔tek⁴ko¹〕 潮州話称竹竿为“竹哥”，并径直把“竿”字念为“哥”音。案“竹

哥”的原詞为“竹篙”，《集韻》：“篙，居勞切，《方言》：所以刺船謂之篙”。字又写作篙，《廣韻》豪韻：“篙，進船竿，古勞切”。潮州話中確把船竿称为“船篙”；豪韻字在潮州口語中多念〔o〕音，如“高、牢、毛、刀、逃”等，故篙字也念〔ko¹〕音。

火燂〔hue²t'a⁷〕 冬天取暖用的手爐。燂，《集韻》東韻：“他東切，以火暖物”。手爐用以暖手，故曰“火燂”。

筆鎔〔pik⁴t'ap⁴〕 筆套兒。鎔《廣韻》合韻：“他合切，器物鎔頭”；《說文》：“以金有所冒”；《諾皋記》：“宜車坊槐樹下，有大蝦蟆扶二筆鎔。”音義俱合。翁書以為“筆榻”，非。

柴燂〔ts'a⁵tsau¹〕 潮州話稱燒焦的木薪為“柴遭”，原詞當為“柴燂”。《廣韻》豪韻：“燂，作曹切，火余木也”，音義全同。

銍〔sa⁷〕 潮州話稱鐵生銹為“生雙”，原詞當為“銍”。《廣韻》庚韻：“銍，所庚切，鉄銍”；《集韻》：“師庚切，鉄衣也”；《玉篇》：“鐵也”。“鉄衣”即銹，“鐵”也為銹（鏽）字；《集韻》鏽（銹）字下注云：“鉄生衣也”。

𠂔〔p'i³〕 潮州話稱事物之半（或一方、一邊）為〔p'i³〕，如“一〔p'i³〕門”（一扇門），“許〔p'i³〕無人坐”（那一邊沒有人坐）。案此詞的原詞為“𠂔”。《廣韻》霰韻：“𠂔，普麵切，半體也”，音義全合。

𠂔〔bi⁴〕 潮州話稱潛伏、躲藏為“𠂔”，如說“𠂔在樹后”，案原詞當是“𠂔”。《集韻》盾韻：“𠂔，莫筆切，潛藏也。”古明紐字潮州口語多念〔b-〕音，如“蜜、篾”等，故“𠂔”聲母也念〔b-〕。

𠂔〔siam²〕 躲避，如說“𠂔雨”（避雨）。《說文》：“𠂔，不媚前却𠂔𠂔也，失冉切”。桂馥《說文解字義詁》云：“董斯張曰：人來而避曰閃……閃當作𠂔”。案閃為𠂔之俗寫，閃之本義無𠂔意（《廣韻》：“閃，出門貌”）。《吹景錄》云：“俗謂人來而避曰閃。”

𠂔〔siu⁵〕 游泳。《廣韻》尤韻：“𠂔，似由切，人浮水上”；《說文》：“𠂔，浮行水上也”，字或作𠂔，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七：“江南言拍浮為𠂔”；又《淮南子·說林訓》：“舟復乃見善𠂔”。𠂔方言字寫作“余”，《桂海虞衡志》載：“粵中俗字有余，云人在水上也。”翁書作“游”，非是。

𠂔〔bi⁷〕 潛游。《集韻》：“莫佩切，沉溺也”；《廣韻》：“𠂔，內（納）頭水中”。音義全合。案“沉溺”也是人或物在水下之意。

𠂔〔hua⁷〕 潮州話稱跨步為〔hua⁷〕，一步也叫“一〔hua⁷〕”，案〔hua⁷〕即“𠂔”。《廣韻》月韻：“𠂔，王伐切，《說文》踰也”。《說文》引《易》曰：“衆而不𠂔”；《玉篇》：“𠂔，走散也。”案經籍中“𠂔”與“越”時通用，義俱與“跨”同，《玉篇》：“跨，越也”。翁書作“跬”，案跬《說文》釋為“半步”，音作“丘弭切”，義雖略似而音不合。

𠂔〔nek⁴〕 用力蹂躪，如說“𠂔被”（蹂躪被子）。《廣韻》陌韻：“𠂔，女白切，踐

也”；《玉篇》：“踏足貌”；《类篇》：“蹂也”。音义俱合。

𨔵〔piā³〕 潮州話把跑得很快(或动作迅速)称为“拼”，如說“拼到雄死”(跑得很快)。原詞为“𨔵”。《广韵》映韵：“𨔵，北孟切，走也。”《集韵》：“北諍切，走也”。案映韵字潮州口語多念为〔iā〕，如“命、鏡、行”等字，故𨔵也念〔iā〕音。

𨔵〔liou⁶〕 牛馬跑(或指人跑)，如說“只馬囉𨔵”(一匹馬在跑)。𨔵，《說文》：“行脛相交也，牛行脚相交为𨔵”；《玉篇》也說：“牛行后脛相交也，力弔切”；《方言》：“以足鈎之为𨔵”。音义俱合。

𨔵〔lou⁶〕 搖动。如說“阿兄囉写字勿𨔵床”(哥哥在写字不要搖动桌子)。𨔵，《广韵》姥韵：“郎古切，搖动”；《集韵》：“籠五切，《广雅》𨔵也，一曰动搖”。

𨔵〔lok⁴〕 掩住器皿出口振蕩的动作。如說“个罇爰洗着介伊𨔵一下”(那个瓶子要洗必須振蕩一下)。𨔵，《广韵》：“卢谷切，振也”；《周礼》曰：𨔵鐸，郑玄云：掩上振之为𨔵”。音义全合。

𨔵〔dzue⁵〕 用手搓东西的动作。如說：“𨔵衫褲”(搓衣服)。𨔵，《說文》：“摧也，一曰两手相切摩也”；《玉篇》：“仔佳切，摧也，曰两手相切摩”；《广韵》：“乃回切，又奴和切，手摩物也”；《集韵》：“奴回切，拊摩”。案此字又作𨔵。《資治通鉴》：“王志取庭中树叶𨔵服之”，注曰：“𨔵，两手相切摩也”。

𨔵〔so¹〕 撫摩，如說：“𨔵伊个头”(撫摩他的脑袋)。𨔵，《集韵》：“桑何切，摩𨔵也”；《玉篇》：“手𨔵𨔵也”；韓愈《石鼓歌》：“誰复著手更摩𨔵”。字又写作𨔵，见《集韵》。

𨔵〔t'au²〕 展开，解开，如說：“𨔵包物介伊𨔵开来”(这包东西給它解开来)。𨔵，《集韵》厚韵：“他口切，展也”。音义全合。翁书以为𨔵，誤。案𨔵，《說文》：“𨔵也，土刀切”，音义全不相合。

𨔵〔t'iap⁸〕 把东西排好、摆整齐叫做“𨔵”。《玉篇》“𨔵，徒猎切，排也，收也”；《广韵》帖韵：“徒协切、挂、𨔵”；《集韵》帖韵：“达协切，排也”。

𨔵〔tui²〕 潮州話把用力拉东西的动作叫“𨔵”，如說：“𨔵索”(拉繩子)。𨔵，《篇海》：“都罪切，著力牽也”。音义俱合。翁书作“𨔵”，誤。𨔵音“初委切”，义为“量度，捶”(见《說文》)，俱不合。

𨔵〔tug³〕 潮州話把用力搖动(条状)物体的动作叫做“𨔵”，如說：“条索你介伊𨔵一下”(那根繩子你給它搖一下)。𨔵，《玉篇》：“都困切，引也，𨔵也”；《广韵》愿韵：“都困切，𨔵𨔵”；《广雅》：“引也”；《集韵》：“𨔵也”。字又写作“𨔵”。

𨔵〔tua⁶〕 牽引。例：“只电船后畔𨔵二只柴船”(一条汽船后面牽引着两条木船)。《广韵》帮韵：“徒可切，引也”。案帮韵字在潮州口語中多念〔ua〕，如“我、𨔵”等，故𨔵也念〔ua〕音。

𨔵〔k'i⁵〕 潮州話把抓住或扯住物体的动作叫做“𨔵”，如說：“𨔵伊个衫”(抓住他的衣服)。案原詞当作“𨔵”。《說文》：“𨔵，急持衣襟也”；《玉篇》：“急持衣襟行

也”；《集韵》侵韵：“渠金切，急持也”；《埤苍》：“撿，捉也”；《三苍》：“撿，手捉物也”，音义完全相合。撿又写作擒。

擎〔k'ia⁵〕 潮州話把持、拿的动作叫做“擎”，如說“擎笔写字”（持笔写字）。擎，《广韵》庚韵：“渠京切，举也”；《集韵》：“举也”又“持也”；《玉篇》：“持高也，撑也”。案庚韵字潮州口語中多念鼻化音〔iā〕，如“京、惊、兄、兵、行”等，个别完全丧失鼻音成分，擎字就是如此。

挈〔tsa⁴〕 带。如說“挈书册来”（带书本来）。挈，《集韵》合韵：“作答切，持也”；《玉篇》：“挈也”。案挈《说文》作“悬持也”，《广韵》：“挈，提挈，又持也”，义均与持、带同。翁书以为賁，非是。

揠〔ts'a⁴〕 潮州話把搀扶的动作叫做“揠”，如說：“阿弟趲落去，揠伊起来”（弟弟跌倒了，扶他起来）。揠，《玉篇》：“初責切，扶也”。案字又作揠，《广韵》麦韵：“揠，楚革切，扶揠也”。

掀〔kia⁴〕 潮州話称拨动的动作为“掀”，如“掀算盘”。掀，《广韵》月韵：“居月切，掀拨物也”；《集韵》：“紀雀切，拨也”。

𦵏〔sua⁴〕 撒，放。例：“煮羹着𦵏盐”（煮菜必須放盐）。𦵏，《集韵》：“桑割切，《说文》：散之也”；《五经文字》：“𦵏，放也”；《方言》：“散，杀也”，案此杀字即𦵏。又此字后代演为“撒”，《集韵》：“撒，桑葛切，散之也，一曰放也”，音义与𦵏全同。

傳〔sai⁷〕 潮州話把放置或豎直的动作叫做“傳”。如說：“个鍋傳放床頂”（鍋放在桌上）。傳，《广韵》志韵：“式吏切，置也”；《释名·释言語》：“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周礼·大宰》注：“傳又立也”。案傳字又作事（见《广韵》），《礼记·仲尼燕居》：“事之謂立置于位也”；《汉书·蒯通传》集注引李奇曰：“东方人以物插地中为事”。

搥〔le⁷〕 推。如說“搥門入来”（推門进来）。搥，《说文》：“推搥也，而隴切”；《广韵》：“推搥貌也”；此字又写作“茸”和“搥”（见《广韵》）。《汉书·司马迁传》：“而仆又茸之蚕室”，顏注：“茸，推也”；《广雅》：“搥，推也”。搥又作“𦵏”。《广韵》肿韵：“𦵏，推車，或作搥”；《淮南子·览冥訓》高誘注：“𦵏，推也”。搥属日紐字，日紐字古出于泥母，而泥、来紐字之声母潮州話中常互換（如“农”念〔loŋ⁵〕而“林”念〔nim⁵〕等），故日紐字間也念为〔l〕母，如“蕊、汝”，搥之念〔l-〕，也是一例。

𦵏〔ts'o⁴〕 撕断。例：“张紙乞伊𦵏掉”（那张紙給他撕断）。𦵏，《广韵》薛韵：“七絕切，断𦵏絕”；《集韵》：“促絕切，断也”。音义全合。

𦵏〔k'ok³〕 打脑袋的动作。如說：“𦵏伊个头”（敲他的脑袋）。𦵏，《说文》：“击头也”；《广韵》：“苦角切，𦵏，打头”；《集韵》：“枯沃切，打也。”此字又写作“搥”和“𦵏”。《吕氏春秋·当务篇》下：“见六王五伯，将𦵏其头矣”。注云：“𦵏，音𦵏，击也”。

𢵘〔pa⁷〕 用掌节击头的动作。例：“𢵘到伊个头痛死”（打得他的头很痛）。𢵘，《类篇》：“皮敎切，手击也”。

拈〔lak⁸〕 用棍子横着打的动作。“拈着伊个𢵘”（打到他的腿）。拈，《广韵》鐸韵：“卢各切，打也”；《集韵》：“历各切，击也”。

𦉳〔pi⁶〕 潮州話称編織东西的动作为“𦉳”，如“𦉳草鞋”。𦉳，《广韵》銑韵：“薄法切，《说文》交也”（案玄应《一切經音义》十五引《说文》作“交𦉳也”）；《通俗文》：“織繩曰𦉳”；《仓頡篇》：“𦉳，交織也”；《通鑑》：“梁蕭方諸以五色彩𦉳”鮑泉髣注云：“𦉳，交結也”。案銑韵字潮州口語中間也念〔i〕，如“扁”，故〔pi⁶〕为𦉳，音义全合。

經〔kəi¹〕 織。例：“經布”。經，《集韵》青韵：“坚灵切，《说文》織也”；《玉篇》：“經，經緯以成縉帛也”；《韓非子·外儲說》：“吳起使其妻織組而幅狹于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又《論衡·量知篇》：“恒女之手，紡績織經”。音义全合。

𦉴〔ti¹〕 潮州話称縫衣服为“𦉴衫”，𦉴，《广韵》至韵：“直利切，刺𦉴針縫也”；《类篇》：“𦉴，紕也”。案紕也为縫，《广韵》：“紕，直一切，縫紕”；《玉篇》：“持栗切，縫衣也”，故翁书誤認“紕”为本詞。紕音与“鉄”同，不合，作𦉴音义始全合。

𦉵〔bio⁵〕 窺視。如說：“𦉵睇伊囉做呢”（窺探他在干什么）。𦉵，《广韵》微韵：“伺視”；《玉篇》：“莫悲切，伺視也”。按此字《说文》作𦉵（从见），《说文》：“𦉵，司也，无非切”；《广雅》：“见微，𦉵也”。此字又通作微。《国語·晋語》：“公使覘之”，韦昭云：“覘，微視也”；《汉书·郭解传》：“使人微知賊处”，顏注：“微，伺問之也。”

看相〔k⁴aŋ³siō³〕 潮州話称仔細端詳为“看相”，即細看之意，如說“看相着二块物唔平样”（仔細看两块东西并不一样）。潮州話一般不用“看”而用“睇”，习惯上以“看”当作“睇”字，把“看”也念为〔t⁴ōi²〕，事实上〔t⁴ōi²〕当为睇字之音，“看”当为〔k⁴aŋ³〕，这一“看”字即保存于“看相”一詞之中。“看相”一詞也正好保存古汉语的原义。看，《说文》：“睇也，从手下目”，何謂“从手下目”呢？《九經字樣》解釋說：“凡物见不审則手遮目看之，故看从手下目”，所以看有“审視”义；相，《说文》：“省視也”；《书·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郑注：“相，視也”；《周礼·大司徒》：“以相民宅”，注：“相，占視也”，相也具“审視”之义。看与相构成一联合式合成詞。

瞞〔io⁷〕 因光綫太强或动搖不定而看不清楚。如說：“睇了目瞞瞞”。瞞，《集韵》：“弋笑切，《说文》視誤也”。

𦉶〔moŋ⁵〕 因光綫不足或視力不好而看不清楚。如說“无挂目鏡撮字睇着𦉶𦉶”（沒有带眼鏡那些字看起来模模糊糊）。𦉶，《说文》：“目不明也，木空切”；李善注《文选·洞箫賦》引《埤蒼》曰：“𦉶，視不审諦”。

喝咽〔huaŋ⁴ hi³〕 潮州話称打呵欠为“喝戏”，案原詞当为“喝咽”。《广韵》至韵：“咽，虛器切，息也”；《方言》：“息也”，注：“許四切，东齐曰咽”；《玉篇》：“火利切，息也”，“喝”义为“呼”，见《集韵》；“喝咽”即呼出气息，此即“打呵欠”。翁书謂“喝戏”为“呵欠”之轉，牵强之甚。

壓〔uaŋ⁴〕 大声叫喊。如說“隔壁有人囉壓”（隔壁有人在大声叫喊）。壓，《广韵》曷韵：“烏葛切，大呼用力”；《集韵》：“阿葛切，大呼用力謂之壓”。

訛〔a³〕 潮州話称爭辯为“訛”，如說“二人訛到面紅嘴赤”。訛，《集韵》效韵：“于敎切，言逆也”。言逆即言語相抵触之意。

詠〔tok⁴〕 潮州話把罵称为“詠”，如說“詠到伊无滴困好”（罵得他一无是处）。詠，《玉篇》：“猪角切，訴也，責也”。

噉〔am⁶〕 把食物放进口里的动作叫“噉”。如說“挾块肉伊噉”。《广韵》：“噉，烏感切，手进食也”；《玉篇》：“含也，一感切”。

欬〔tsuŋ⁴〕 吮吸，如“欬奶”。欬，《广韵》：“子聿切，飲也”；《玉篇》：“子律切，吮也”。音义全同。

嗽〔suŋ⁴〕 潮州話又称吮吸为“嗽”，如“嗽蔗湯”（吸甘蔗汁）。嗽，《说文》：“吮也”；《通俗文》：“含吸曰嗽”；《广韵》屋韵：“嗽，桑谷切，吮也”，此嗽即嗽之或体，见《集韵》。嗽，《集韵》：“輸玉切，吸也，吮也”；又：“苏谷切，吮也”。《汉书·邓通传》：“文帝尝病癰，通常为上嗽吮之”。

歎〔ha¹〕 潮州話称张口噓气为“歎”，如小儿跌地常哄曰“歎歎补”。歎，《说文》：“溫吹也”；《玉篇》：“出气息也，出曰歎，入曰哈，虎胡切”；《广韵》模韵：“荒烏切，溫吹气息也”。案模韵字上古音属魚部，魚部之主要元音为〔a〕，歎念〔a〕（〔a〕），为上古音之遺。

歎〔puŋ⁵〕 吹，如“歎风”（吹气）。歎，《说文》：“吹气也”；《玉篇》：“歎气也”；《颜氏家訓》：“见馬嘶歎，陆梁莫不震懼”。《集韵》此字作“鋪魂切”，音义俱合。

歔〔huk⁴〕 潮州話称撮口吹气使火起为“忽”，如說“忽紙媒”（吹引火紙条），原詞为“歔”。《说文》：“歔，有所吹起”；《玉篇》：“許勿切，暴起也”；玄应《一切經音义》六引《仓頡篇》：“歔，猝起也”。音义全合。

涉〔tsuaŋ⁴〕 泼水的动作。如說：“砵面盆底撮水介伊涉掉”。涉，《集韵》末韵：“子末切，水濺也”，《广韵》作“姊末切”，义同。

訓〔pak⁴〕 潮州話称認識为“訓”，如說“訓字”。一般以“識”为訓，也属“訓讀”现象。《玉篇》：“訓，兵別切，分契”；《广韵》薛韵：“方別切，分契”；《集韵》：“笔別切，分契也，析理也”。“分契”、“析理”均有認識、辨別之义。

慳〔heŋ⁶〕 潮州話称恨或厌足为“幸”，如說“死絕幸伊”（很恨他）、“食到幸死”（吃得很厌膩）。原詞当为“慳”。《玉篇》：“胡頂切，恨也”；《广韵》迥

韵：“怪，胡頂切，怪恨”。翁书作“恨”，非。

相閹〔sio¹ hek⁴〕 不和或互相怨恨为“相閹”。如說：“二人常时囉相閹”（两人常常不和）。閹，《說文》：“恒訟也，《詩》云：‘兄弟閹于牆’；从鬥从兒，兒善訟者也，許激切”。《尔雅·释言》：“閹，恨也”，郭注：“相怨恨”；《曲礼》：“很（恨）毋求胜”，注云：“很，閹也，謂爭訟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詩》“兄弟閹于牆”注云：“閹，訟爭貌”。《广韵》錫韵：“閹，斗也，恨也，戾也又相怨也，許激切”。

𢵚〔ā⁵〕 潮州話称貪心独占財物为“𢵚”，如說“撮物籠总乞伊𢵚去”（那些东西全部給他独占了）。𢵚，《广韵》覃韵：“烏含切，貪愛”；《集韵》：“烏含切，貪也，愛也”。〔ā〕为覃韵之鼻化音。翁书謂〔ā⁵〕为“爭”之音变，毫无根据。

佻〔kaŋ⁴〕 和，跟，如說“佻伊作一下去”（跟他一起去），一般写为“甲”字。佻，《广韵》合韵：“古沓切，併佻聚”；《集韵》：“葛合切，《說文》：合也”；《玉篇》：“佻，合取（聚）也”。

𢵚〔tau³〕 潮州話称比賽为“𢵚”，如“𢵚輸贏”。𢵚，《玉篇》：“丁豆切，物等也，角力竞走也”；《广韵》候韵：“都豆切，𢵚（校）也；角力走也，又相易物俱等”。音义全合。

塵糟〔o¹ tso¹〕 不洁称为“塵糟”。塵，《广韵》豪韵：“于刀切”；糟，“作曹切”。本韵字潮州口語中多念〔o〕音（例见前），故塵糟也念〔o〕，以“塵糟”表不洁，元人口語已有。元陶宗仪《輟耕录》說：“今以不洁为塵糟”。翁书作“咬咀”，非是。

謬謬〔taŋ⁴ tiŋ⁸〕 潮州話謂囉嗦多話、語无伦次为“謬謬”。謬，《集韵》：“竹洽切”；謬《集韵》：“陟栗切，謬謬，言无伦脊也”。音义与潮州話全合。

癰癰〔kuan³ pian¹〕 潮州話称半身不遂（偏枯）为“癰癰”。癰，《玉篇》：“公玩切，病也”；癰，《說文》：“半枯也”；《玉篇》：“匹仙切，半枯病”；《广韵》：“芳連切，身枯”。

曝疱〔p⁴ ok⁴ p⁴ a⁶〕 起疱（泡），如說“只手擎鋤头磨到曝疱”（手拿鋤头磨得起疱）。疱，《玉篇》：“薄教切，疱疮也”；曝，《广韵》屋韵：“蒲角切，肉肤起也”；《集韵》：“皮破起”。

癢〔tsi⁶ ɔ⁶〕 痒，如說“爬癢”（搔痒）。癢，《广韵》彌韵：“慈演切，小痒”；《玉篇》：“慈剪切，小痒也”；《集韵》“在演切，《广雅》：癢癢蟬也”。

庥〔miŋ⁴〕 潮州話又称痒为“庥”，如說“一身庥死”（全身很痒），“庥”又常与癢連用，說成“癢庥”。庥，《集韵》质韵：“尼质切，痒也”。

𧄸〔p⁴ oŋ³〕 潮州話称浮肿为“𧄸”，脸肿为“面𧄸”。𧄸，《集韵》絳韵：“匹降切，面肿”。音义俱合。

𧄸〔t⁴ u⁸〕 肥称为“𧄸”，又常与肥連用說成“肥𧄸”，如說“𧄸个奴因肥𧄸肥

膾趣味死”（这个小孩儿胖胖的很好玩）。膾，《广韵》沒韵：“陀骨切，《说文》曰：牛羊曰肥，豕曰膾”；《广雅》：“膾，盛也”；《集韵》：“随沒切，肥也”；《左传·桓公六年》：“五牲醢肥膾”。說法与潮州話全同。

𦍋〔ni³〕 潮州話称略肥为“𦍋”，或与肥連用称“肥𦍋”。𦍋，《正字通》：“乃計切，《说文》：肥也”。音义全同。

瘠〔saŋ²〕 潮州話把瘦叫做“瘠”，有时将瘠与瘦連用，如說“黃縷瘦瘠”（又黃又瘦的样子）。瘠，《广韵》梗韵：“所景切，瘦瘠”；《集韵》：“瘦謂之瘠”。

𢦏〔tsɔi⁷〕 多。如說“今日开会人来𢦏死”（今天开会人来得很多）。《广韵》寘韵：“𢦏，支义切，多也”；《广雅·释詁》三：“𢦏，多也”。翁书作祇，非。

𡗗〔kek⁴〕 潮州話称穷为“𡗗”，如說“伊好𡗗”（他很穷）。《广韵》：“𡗗，居六切，《说文》，穷也”。

𣎵〔tɔi⁷〕 坚实、坚硬，如說：“𣎵块柴𣎵死”（这块木头很坚实）。𣎵，《集韵》霰韵：“堂練切，木理坚实”。案霰韵字潮州口語中多念〔ɔi〕，如“殿、先、佃、棟”等，故𣎵也念〔ɔi〕音。方言字作“有”。

𣎵〔p⁴ā³〕 潮州話中与𣎵意义相反的词是“𣎵”，方言字写作“冇”，意义为“不坚实”或“虚弱”，如說“伊个身份𣎵死”（他的体质很虚弱），“个包浮酵浮了𣎵𣎵”（包子发酵发得松软松软的）。𣎵，《说文》：“大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詁》說：“大也者，謂空大也，木工凿空曰𣎵”；《广韵》效韵：“𣎵，匹貌切，起釀，亦大也。”案效韵字潮州口語多念〔a〕音，如“抛、敲、教、孝、罩、豹”等，而〔a〕字音又常常鼻化为〔ā〕（如“怕”），故𣎵念为〔p⁴ā³〕；又“起釀”、“空大”等均有“不坚实”义。音义全同。

𣎵〔k⁴o²〕 水浅叫做“𣎵”，如“溪底个水𣎵死”（小溪里的水很浅），“退潮”叫“𣎵流”。𣎵，《广韵》皓韵：“苦浩切，水干”。本韵字潮州口語多念〔o〕，如“抱、倒、嫂、稿、好、宝、保”等，𣎵字也然。翁书作“涸”，非是。

𣎵〔kɔ¹〕 潮州話謂“多汁”、“稠状”为“𣎵”，如說“一間𣎵𣎵溶”（滿地湿漉漉的），“撮糜冷𣎵𣎵”（粥成稠状）。𣎵，《广韵》歌韵：“古俄切，多汁”；《集韵》：“居何切，《说文》：多汁也”；《广雅》：“淖也”（《字林》：“濡甚曰淖”）；《淮南子·原道訓》：“甚淖而𣎵”，高注：“𣎵亦淖也，饘粥多𣎵者謂𣎵”。

𣎵〔ta¹〕 干。例：“𣎵撮柴曝𣎵正好烧”（这些木柴晒干才好烧）。《集韵》：“𣎵，丑交切，热也”，又“暴也”；《玉篇》：“干也，爆也”；《广雅·释詁》三：“𣎵，干也”。翁书謂〔ta¹〕为“干”字之輾轉演变，大謬不然。

𣎵〔tam⁵〕 湿。例：“个衫乞雨沃到𣎵𣎵”（上衣給雨淋得湿漉漉的）。𣎵，《集韵》覃韵：“都含切，湿也”。

𣎵〔hiam¹〕 潮州話称“辣”为“𣎵”，“辣椒”叫做“𣎵椒”。𣎵，《集韵》盐韵：“馨兼切，辛毒之味”；查《广韵》严韵又有“𣎵”字：“盧严切，辛之辛味曰

蘇”(《集韻》作“草味辛毒”),当与“菰”同源。

涪[kuǒ²] 沸。如說“水涪了”(水沸了)。涪,《說文》:“沸也”;《廣韻》:“古玩切,沸也”;《荀子·解蔽篇》:“涪涪紛紛,孰知其形”,注:“涪涪,沸貌”;《楚辭》:“氣涪沸其若波”;《春秋繁露》:“莖待纒以涪湯而后能為絲”;《史記·龜策傳》:“腸如涪湯”,司馬貞索隱注曰:“涪,沸也”。涪的來源甚古。

文学教学工作座谈重新学习 毛主席文艺思想問題

重新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努力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指导自己的文学教学和文学理論研究工作,这是广东部分文学教学工作者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座談会上的共同的自觉的要求和愿望。

五月廿三日,广东語言文学学会筹委会邀請了一些文学教学工作者交換关于重新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問題的意見和暢談学习心得、体会。

座談会上,多数的同志,都認真地检查了过去虽然多次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但由于未能很好地遵循“理論与实际統一”的原則和活学活用的方法,結果,还是不能真正做到运用毛主席的立場、观点、方法去具体地分析和解决文学研究和教学中碰到的問題,更不能解答当前文艺实践中提出的理論問題,自己的某一些錯誤的文艺思想也未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除。大家认为,应该从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中得到启示,結合自己工作的特点,認真重新学习,努力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有的同志还特別強調,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組成部分,要学好毛泽东文艺思想,就必须学好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大家都觉得这种看法很有启发。有的同志还結合自己的学习情况,具体說明不理解《矛盾論》和《实践論》的基本原則,根本談不到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刻理解。

会上还进一步交換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問題:在当前重新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高潮中,必須联系哪些实际?經過了热烈的談論,一致的意见认为:第一,首先应当联系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斗争的实际,用毛泽东文艺思想之“矢”,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之“的”;第二,应当联系我国文艺思想斗争的实际,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級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第三,应当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彻底批判和清除自己头脑中的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观点。

多数同志还坚决表示要在学习过程中爭取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去,进一步通过与工农兵群众的結合,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学习社会結合起来。大家认为,文学教学工作者不只要多爭取下乡下厂参观訪問,更重要的是投身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好毛泽东思想。

(集)

改造山坑低产田的主要措施及其经济效果

(广东省清远县南冲公社白芒大队的调查)

鄺 国 基

广东省山坑田面积约占水田总面积的26.1%。这类山坑田多数是全年亩产稻谷500斤以下的低产田。把它们加以改造，建设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对于贯彻“封山、治水、改造低产田”的山区农业生产方针，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南冲公社原是一个生产条件落后的山区，近年由于进行了艰巨的改造山坑低产田工作，连续三年大增产，在大旱的一九六三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达到水稻亩产811斤，超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亩产800斤的指标，成为全省农业战线标兵单位之一。白芒大队则是这个公社中综合整治山坑田，从低产变高产，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果的范例。本文是从农业技术经济学的角度，对该大队改造山坑低产田的主要措施及其经济效果进行研究的调查报告。

(一)

白芒大队位处清远县西部，山高水冷，阳光不足，耕层浅薄，土质瘦瘠。全大队52个自然村，36个生产队，501户，2,033人，876个劳动力（包括176个辅助劳动力）。耕地面积1,644.38亩（水田1,624.38亩，旱地20亩），其中属低产的山坑田644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9.6%。每人平均只有0.82亩耕地，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1.98亩。有耕牛248头（其中役牛186头，每头平均负担8.84亩耕地）。生猪406头，平均每户养0.81头。

过去的白芒大队之所以低产，主要原因是山坑田面积比重大。山坑田之所以低产，除了社会历史根源外，就自然条件看：山高林密，光照不足，常年气温、水温、土温较低，又受早春寒潮和晚秋寒露风威胁，禾苗生长发育不良，谷粒结实差，“过冬青”比较严重。同时，虫、病、鼠、鸟的为害，亦常招致减产失收，此其一；山坑田绝大多数是黄泥田、沙质浅脚田，土质瘦瘠，耕层浅薄，一般三、四寸，有机质分解慢，有效养分含量低，此其二；田块分布在两山相交、三面环山之间，山坑倾斜度大，田块小，梯级多，集雨面积广，又缺乏完善的排水系统，地下水位高，土壤中锈、毒质难以排出，特别在雨季，山间黄泥、砂石随洪水冲刷稻田，破坏地力，此其三；第四，山高路远，地势复杂，644亩山坑田零星散布在94条山坑、50个山坳上，人畜翻山越岭，农事工作量一般比平原多一、二倍，农忙时往往错过季节而失收。

过去，当地群众虽然有改低产变高产的强烈愿望，但在个体经济条件下，只能是一种幻想；农业合作社时期，农业生产无疑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也未能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因此，长期以来，群众

思想上形成了重視村边垌田^①，忽視山坑田的偏向：对垌田，精耕細管，做到“村边田，去耍髻”^②；对山坑田，粗耕少管。所以山坑田产量一般都是年产三、四百斤，少的一、二百斤，甚至有种无收。只有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依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总路綫的指导和大跃进的鼓舞下，白芒大队的劳动农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鼓足干劲，才实现了根本改造山坑低产田的宿愿。

(二)

针对低产原因，該大队在近年改造山坑田的基础上，在一九六二年冬，狠抓几条根本性措施，对山坑田进行全面改造：

环山开沟，全面整治排灌系統

“有收无收在于水”。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据調查，全大队过去有鉄锈水田80多亩，經常受黄泥水侵蝕的农田140多亩，种不保收的“望天田”80多亩。即是說，經常患水害的就有300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一九六二年冬，全大队集中640多个劳动力，在94条山坑上兴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分別按不同的山势地形，环山修筑防洪沟385条，并沿田块普遍开挖排水沟，使全部山坑田的排灌系統初步形成，并采取集中突击和經常維修相結合的办法，坚持把这一工作搞好。这是改造山坑田的最关键的措施，也是迅速解决水利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一措施的效益是多方面的：山坑田虽然三面环山，山地集雨面积大，逕流大，以及土质中有冷、锈、酸、毒的不利因素，但是有了上述水利設施，可以降低地下水位，有效地排除冷泉水、鉄锈水、山洪水，雨季可以杜絕黄泥水冲刷农田，冬季又利于排除积水，提早犁冬晒白；其次，有了完善的排灌系統，水温、土温得以提高，助长禾苗正常生长发育；另外，原有的望天田中，有15亩获得水源，其他60多亩可种旱作物；使耕地面积得到充分利用。由此可见，水利问题解决了，使山坑田生产条件中最不利的因素变为最有利的因素，并为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創造了新的前提。

辟蔭除障，改良稻田外界环境

全面鏟光田基草，并把离田两丈内的山边野草荆棘，全部鏟光、砍光、烧光。这样做，一可以减少稻田的蔭蔽，扩大光源（据調查測定，一般增加日照一至三小时），提高水温、土温，加速肥料有机质的分解，促使水稻根系发育，冬季又有利于晒田；二可以减免虫病鼠鳥栖息为害。据調查，前几年当地晚稻三化螟白穗率約1.5—2%左右，稻苞虫每亩虫口密度达1万头，加上鼠鳥为害，累計每年损失稻谷3万多斤，約占常年晚造总产量的7%。辟蔭除障后的一九六三年，虽然邻近大队的病虫威胁严重，但白芒大队晚稻白穗率仅0.1%，稻苞虫、稻纵卷叶虫也极少发现，鼠鳥为害也显著减少；三可以扩大有机质肥料来源，并把改良外界环境同积肥、送肥結合起来，就地积制，就地施用，节约劳动用工。由此可见，辟蔭除障对改良稻田外界环境，获取大面积平衡增产，效果极为良好。

增施精肥磷肥，培养地力

为了根本改变过去山坑田不施肥或少施肥的习惯，从一九六二年起，各生产队把秋后至明春共八

① 垌田指地势平坦，面积較宽广，阳光較充足的谷地、盆地的水稻田。

② “去耍髻”：当地青年妇女回娘家或趁墟玩要去，发髻打扮得光洁、整齐。村边垌田的耕作管理，常常达到“去耍髻”的要求。

个月所积累的猪屎尿、牛栏粪、草木灰、硃沙灰分别沤制、腐熟、作为精肥，在早造备耕时优先运送到山坑低产田去，平均亩施基肥1,500斤；晚造，实行稻秆回田（每亩约500—600斤），并亩施精肥300多斤，连同稻秆一起犁翻田。这项措施的主要作用是：施足基肥，促使禾苗早回青，多发根；增加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减少养分流失，增强土壤保水保肥能力；有机质肥料属综合性肥料，兼有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氮、磷、钾肥分，而且精肥肥效长，能够持续地、均衡地提供养分，满足稻株生长发育过程的需要，使禾苗健壮，增强抗虫、病、倒伏的能力。实践证明，实行增施精肥和稻秆回田，普遍获得了立竿见影的增产效果。

施用磷肥是改造山坑田的另一重要环节。一九六三年平均亩施过磷酸钙110斤，整个山坑田的生产起了显著变化：禾苗提早回青，生长普遍良好；增强了稻株对氮素及其他肥分吸收能力；熟期提高7至10天，而且抽穗一致，有效穗数多，穗黄叶青，青枝蜡黄，穗大粒重，结实率和千粒重比过去显著提高；此外，由于增加土壤中的有效磷含量，土壤较松软，其耕性有所改良，发赤田也得到较好的改造。

磷肥之所以特别重要，主要是山坑田的有效磷含量很低，一般在百万分之7至11，有些在百万分之3至4，这就要增施磷肥，才能适应水稻对磷素的需要；其次，磷肥还有利于减轻铁锈水对稻株的毒害，使发赤田得到更彻底的改良；此外，随着施肥水平的提高，亦需要相应加强磷素的比重，使氮磷钾肥适当配合，避免偏施氮肥的不良作用。

良种上山，早播早插，插密长密

一九六三年晚造，全大队插植的溪南矮、中山红、新西林、白壳矮等良种1,345亩，占水稻总面积98%。不论塌田或坑田，全面实现了良种化。

为了充分发挥良种的丰产性能，白芒大队采取因田用种的原则，根据山坑田的地形、土壤、水利、光照等条件，安排不同的品种。例如晚稻品种溪南矮适应性强，有耐肥、抗病、抗倒、稳产特点，无论塌田或坑田都可获得高产；中山红秆硬粒实，喜蔭耐瘠，适宜安排在肥力较低的高坑田；新西林虽然迟熟，但比较耐瘠，只要加强管理，安排在浅脚田中，也能发挥粒多穗大的效果。

矮秆、迟熟、高产良种能够上山，固然是由于有了环山开沟、辟蔭除障、增施肥料为前提，使良种与水、肥、土、温诸因素相互配合；另一方面，培育壮秧，早播早插，种密长密，也是发挥良种丰产性能的重要因素。例如，一九六三年晚造，一律在芒种前后播种，立秋前完成插秧。在插植上，根据山坑田特点，插密长密，依靠主穗，分别采取 4×5 、 4×6 ，每科10至12条苗，亩插25万苗左右的规格。实践证明，上述措施带来显著增产效果。据四个生产队抽割的21亩溪南矮，平均亩产422斤；又据五个生产队抽割的8.09亩计算，新西林种平均亩产450斤；在大屈垦生产队试割的中山红种，亩产最高达542斤。由此可见，在水足肥丰、精耕细管的条件下，选用良种的增产效果是极为明显的。

犁耙、施肥、播种、插秧、管理“五优先”

采取犁耙、施肥、播种、插秧、管理“五优先”，改变过去次肥、弱秧入山坑，先犁耙、先插、先管门口田的习惯。“十年早，九年好”。这反映了农业生产具有强烈季节性。对山坑田尤其如此。因为山坑田低温寡照，有利于水稻生长的时间短，而目前的矮秆高产良种生长期较长，全生育期一般在145天左右。因此，晚稻在抽穗扬花期间，常遭寒露风为害而减产。一九六一年试种的白壳矮，芒种后夏至前播种，立秋后插秧；翻秋的地财、南特16号，在大暑后播种，立秋后插秧，结果“过多

“青”的禾苗100多亩，輕者損失五、六十斤，重者有種無收，全大隊損失稻穀15,000斤。

實行“五優先”以後，早造犁耙在立春至驚蟄完成，比過去提早兩個季節；立春前施完肥，春分前基本完成播種，清明前後完成插秧，這三項分別提早一個季節；耘田、除草、施肥、防治蟲病鼠鳥，都按先坑田後垌田的原則進行。特別在晚造，各生產隊進一步貫徹“五優先”，禾苗生勢健旺，抽穗一致，熟期提早，避過寒露風，結實極為良好，“過冬青”現象得到克服。從而第一次獲得山坑田晚造平均畝產361斤。

“五優先”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為這項措施把“管”字認真貫徹，使精耕細管和其他增產措施結合起來，體現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計劃管理的優越性，進一步發揮“農業八字憲法”的巨大威力。

如上所述，山坑田經過初步改造，一方面改善了原有的不利的生產條件，為農作物生長發育提供良好的外界環境；另一方面，由於投入每個單位耕地面積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顯著增加，促進了勞動力、勞動工具及勞動對象等生產諸要素的協調，因而提高了集約經營的水平。以一九六三年同一九六二年比較：每畝耕地增加硫酸銨230.5%，過磷酸鈣293%，種籽25%，有機肥30%；勞動用工、畜工都有相應的增加。集約經營水平的提高，促進山坑田從低產變高產，集中反映在一九六三年大增產的兩個特點：一是出現一批高產田。如晚造畝產400斤以上的高產田415畝，占山坑田面積64.4%；二是出現一批高產隊。計全年畝產1000斤以上的有4個隊，900斤以上的有10個隊。最低產的太平坑下圍隊，全年畝產795.5斤，基本達到《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規定的畝產八百斤的指標。在這一年，全大隊36個生產隊，隊隊都增了產。這些成績，是在大旱之年取得的，這不僅反映了現階段農業生產力水平有了新的提高，還表明了發揮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通過改造的山坑田，可以挖掘巨大的增產潛力。

改造山坑田，對提高農業生產經濟效果也極為明顯，即使同大豐收的一九六二年比較，也可以看出：稻穀總產量增長22.3%，畝產量提高21.7%，留種籽量增加50%，飼料糧增加57%，養豬數量增加234%；此外，在每人每月稻穀消費水平提高了15.6%的條件下，商品糧仍增加了33.5%。

各生產隊在獲得增產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生產經濟效果，特別是山坑田最多，低產田面積比重較大的生產隊，其增產幅度和經濟效果提高的更為顯著。例如太平坑下圍生產隊，耕地面積30畝（水田28.5畝，旱地1.5畝）中，深山高嶺的低產坑田18.5畝，占總耕地面積60%強，一向被認為是個“五耗（蟲病鼠鳥）嚴重，社員食少憂多”的低產隊，但在改造山坑田以後，生產面貌大改觀。

現將太平坑下圍生產隊改造山坑低產田前後平均每畝物質耗費、勞動耗費和所得經濟效果表列如下：

太平坑下圍山坑田改良前後每畝每造物質消耗比較

項 目 處 理	物質消耗合計 元	其 中							
		種 籽		硫 酸 銨		過 磷 酸 鈣		農 藥	
		斤	元	斤	元	斤	元	斤	元
改 前 (1962年早造)	1.86	22	1.76	0	0	0	0	0.25	0.1
改 後 (1963年早造)	8.84	29	2.32	25	4.13	30	2.19	0.5	0.2
對 比	+6.98	+7	+0.56	+25	+4.13	+30	+2.19	+0.25	+0.1

太平坑下围山坑田改良前后每亩每造用工比較

单位: 工作日

处 理 项 目	每 亩 用 工 合 計	其 中										
		犁冬	防洪沟 鑿田旁	鑿田基	犁耙	搭田基	育秧	送肥	插秧	田間 管理	收割	积肥
改 (1962年早造)	31.1	1.5	0	4.6	4	2	2	2	6.5	3	3	2.5
改 (1963年早造)	46.6	1.5	4	4.6	4.5	2	2.5	3	7.5	7	4	6
对 比	+15.5*	0	+4	0	+0.5	0	+0.5	+1	+1	+4	+1	+3.5

* 每亩增加劳动用工15.5个, 其中用于追加在整治环山沟、鑿田旁及田間管理共8个工; 用于追加积集有机肥的3.5个工, 做到每亩增施牛栏粪20担, 粪水两担, 灰肥3籮。

太平坑下围山坑田改良前后早稻經濟效果比較

处 理 项 目	每 亩 产 量 (斤)	每 亩 产 值 (元)	每 亩 投 資 (元)	每 亩 用 工 (工作日)	每 亩 成 本 (元)	每 亩 收 益 (元)	每工作 日主产 品产量 (斤)	平均每人 每月稻谷 消費水平 (斤)	平均每劳 动力提供 商品粮 (斤)
改 (1962年早造)	203.0	15.63	1.86	31.1	16.79	-1.16	6.52	16	-18.4
改 (1963年早造)	504.6	38.85	8.84	46.6	31.21	7.64	11.57	45.3**	40.5
对 比	+301.6	+23.22	+6.98	+15.5	+14.42	+8.8	+5.05	+29.3	+58.9

* 每工作日折价系按当地每劳动日值0.48元計。 ** 1963年根本改变了一向依靠国家供应粮食的状况。

应该指出, 白芒大队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改造山坑田, 并取得显著成果, 归根到底还在于: 第一是这个大队的党支部系統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第二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进行的农田建設,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为大规模改造山坑田, 打下了物质基础; 第三是几年来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过程中, 总结了正面和反面的經驗, 摸索出一套符合山坑田生产特点的先进技术, 进一步提高了栽培管理水平。

(三)

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中, 必須讲求經济效果。經济效果的大小是衡量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經济上合理性高低的主要标志。由于农业生产中自然再生产与經济再生产的过程相互交錯, 评价某項措施的經济效果大小, 既要考察該項措施是否符合客观自然条件, 能否为农作物生长发育創造良好的外界环境, 即技术上的合理程度; 又要考察該項措施在經济上的合理程度。因此, 不仅要看这些措施能够增产多少农产品, 还要看在投入同样的劳动数量, 实行那一項措施能够增产更多的农产品, 以便从中选择出耗費最少, 而經济效果最高的技术措施来加速生产发展。从白芒大队的情况看, 今后要更好地提高改造山坑田的經济效果, 除了要再接再厉贯彻既有的改造措施, 还必须把全部山坑田建設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 并且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要实现这些要求, 門路无疑是很多的。根据我們在当地調查所得的情况, 觉得下列两点对在广东省与此相类似的地区提高山坑田經济效果方面会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关于稻薯輪作問題

白芒大队现有水稻面积1,452.5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88%。过去由于低产, 扩大水稻种植面积, 实

行双季稻連作，以保証粮食生产，这是必要的；但由于山坑田经过改良，稳产高产农田逐步扩大，在符合国家计划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水旱輪作田，实行早季水稻、晚季番薯的輪作方式，这比之作物单一、双季稻連作有较大效益。当地群众历来也有早造水稻→晚造番薯→冬季犁冬晒白的水旱輪作习惯。据大屈墾生产队調查，山坑田实行稻薯輪作，其經济效果高于双季稻連作。情况如下表所示：

大屈墾生产队山坑田稻薯輪作、双季稻連作經济效果比較

处 理 項 目	每亩用工 (工作日)	每亩投資 (元)	每亩成本 (元)	每亩产量(斤)		每亩产值 (元)	每亩收益 (元)
				主 产 品	副 产 品		
双季稻連作	81.5	43.86	58.98	850	禾秆 850	69.7	10.72
早季稻、晚番薯輪作	41	39.37	59.05	1050 (早稻 450 鮮薯2400*)	(禾秆 450 薯藤2000)	87.1	28.05
对 比	+9.5	-4.49	+0.07	+200		+17.4	+17.33

* 鮮薯4斤折稻谷1斤。

上表看出，虽然稻薯輪作的每亩用工增加9.5个，每亩成本增加0.07元，但每亩投資却减少了4.49元，亩主产品产量則增加200斤，同时，亩产值和亩收益亦分別增加了17.4元和17.33元。

白芒大队的劳动农民群众认为，稻薯輪作的好处很多：（一）山坑田昼夜温差大，种番薯产量高，一般亩产平均可达3000斤（鮮薯）左右，总产值较大；（二）水旱輪作有利于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显著提高下造作物产量；（三）种番薯的耕作管理用工虽然较多，但当地劳动力充足，矛盾不大，反而使劳动力得到合理利用，提高集約經營水平；（四）种番薯主要多施有机肥料，相对节约了化肥、磷肥，以之用于稻田，可提高粮食产量，做到稻薯增产；（五）调节主杂粮比例，适应群众多种需要；（六）每亩番薯約产副产品鮮薯茎叶2000斤，用作飼料，可供育肥一头牲猪的需要；按当地积肥条件，每头猪每年积集猪屎800斤、猪尿20担，用作精肥，可以解决2—3亩山坑田用肥。可见，在山坑田适当安排稻薯輪作是有利的。

应该指出，輪作制的改变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各个生产队的具体条件不同，山坑田的面积、田类构成各异，群众习惯和耕作技术水平亦不尽相同，所以安排各种作物的比例、耕作輪作方式，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以求最大限度地挖掘土地潜力，提高經济效果。

二、关于提高施用磷肥經济效果問題

“收多收少在于肥”。山坑田施用磷肥的增产作用是肯定了的。但是，仅靠肥多，不一定就能够高产；即使高产，也不一定經济效果就大。只有使用得当，才能最大地发挥肥效，取得较大增产效益。特别是从施肥技术的經济合理性来考察，亦要求以最大限度节约劳动耗費，增产更多的农产品。由于改造山坑低产田需要的磷肥较多，更需要注意合理施用。

要提高施用磷肥的經济效益，不仅要掌握磷肥的性能，还要针对地区特点，采用合理的施肥方法。根据施用磷肥的实践經驗，一般來說，渾制过的比直接施用好；混合氮肥施用比单一施用好；用作基肥比用作追肥好；作秧头肥比大田撒施好；用于瘦田比用于肥田的效果好。

同时，磷肥的施用量也应从經济上的合理性着眼，以适度为宜。当地群众认为，一般每亩每造施二、三十斤，瘦田施三、四十斤，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盲目求多，作物产量即使增加了，但由于物化

劳动耗費太多，經濟效果反而下降。

为了提高施用磷肥的經濟效果，还可以通过以磷增氮的途径，結合当地冬种豌豆，以磷肥来增产綠肥，然后，再用綠肥来肥田。据試驗，在豌豆田亩施磷肥15斤作基肥，可收豌豆109斤、鮮茎叶319斤，折合每亩收获物总含氮量5.68斤，比不施磷純增氮量1.56斤，每斤磷肥增产氮量0.104斤（见附表）。当地群众历来有多种习惯，虽然由于生长季节較短，一般产量稍低，但如果引种早熟品种，仍可达到豆肥兼收的目的。因此，以磷增氮无疑是一条成本低、花工少、收益大的办法，特别是增加氮肥和有机质肥，对改良土壤及下造作物增产，作用尤其明显。

处 理 項 目	以 磷 增 氮 效 果 比 較				
	各 处 理 产 量		收 获 物 总 含 氮 量 (斤/亩)	比 对 照 純 增 氮 量 (斤/亩)	每 斤 磷 肥 增 产 氮 量 (斤)
	籽 实 (斤/亩)	茎 叶 (斤/亩)			
35斤磷肥作基肥	127	364	6.39	2.27	0.065
15斤磷肥作基肥	109	319	5.68	1.56	0.104
对 照(不施磷肥)	80	207	4.12		

本表是根据广东省农科院土化系綠肥組1962年試驗材料制成的。

实践证明，改造山坑低产田，是一个包括技术措施与經濟措施的综合生产措施。白芒大队的經驗表明，改造山坑田的各项措施彼此間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約的。这就要求投入的活劳动、物化劳动，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各个环节适当配合，才能取得較大的經濟效果。白芒大队的經驗也表明，改造山坑田，既要考察各项措施在技术上的合理性，还要考察其經濟上的合理性，从中选择出經濟效果最高的改造措施方案。白芒大队的經驗亦表明，改造山坑田也必须学会运用“两分法”，既要看到山坑田的低产根源，找出改造低产的措施；又要看到生产落后的地区的有利条件，找出建設旱涝保收、穩产高产农田的途径。白芒大队的經驗还表明，改造山坑田，不仅要依靠物质技术力量，还要依靠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处理技术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关系时，必须坚持人的因素第一。毛主席历来教导我們要充分重視人的作用。他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貴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广东經濟学界討論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論問題

四月下旬，广东經濟学界就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論問題举行討論会。会上以卓炯同志的《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問題》，张仲深同志的《关于馬克思再生产理論核心問題的探討》等論文为基础进行討論，着重探討了如下的几个問題：

关于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核心問題。

一种意見认为，在商品經濟条件下，再生产一旦离开了社会产品的实现是无法进行的，以两大部类对比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产品的实现是社会再生产进行的前提。所謂实现問題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質形式补偿的問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再生产理論同实现論看成是同义語。因此，可以說，社会产品的实现問題是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核心。持这种意見的同志不同意把再生产的核心問題理解为生产安排，即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時間的問題。

另一种意見认为，第一部类的 $V+M$ ，同第二部类的 C 保持一定的对比关系原理是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核心。馬克思再生产原理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生产都有效，就是指的这个核心。

还有一种意見认为，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核心是一个补偿問題，具体說来，在存在商品貨币关系的条件下是物質替换和价值补偿問題；在不存在商品貨币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則仅仅是物質替换問題。

关于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尺度問題。

有的同志针对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問題爭論的几种不同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們认为，在区分社会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无论是以使用价值作为尺度，或是同时以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尺度，还是以不变价格計算社会产品总量作为尺度，都是不够恰当的。因为在理論上，馬克思从来就沒有作过这样的論述，在现实經濟生活中作这样的区分，也是沒有多大意义的。不言而喻，增加产量和产值是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但是問題不是在于要不要增加产量和产值，而是在于如何才能增加产量和产值，即如何組織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問題。因此，应该把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尺度問題与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問題联系起来考察。这样說来，区分的尺度只能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而扩大再生产既然有两个源泉，那么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尺度就应该有两个：一个是用积累作为尺度，这就是說，剩余产品轉化为积累就是扩大再生产，另一个是用增产节约作为尺度，这就是說，有增产节约就是扩大再生产。把这两条綜合起来就是：这两条都沒有就是简单再生产，其中有了一条就是扩大再生产。

許多同志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們认为，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尺度与如何实现扩大再生产是两个問題，不能把它們混为一談。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和非积累这两个源泉，只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条件。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有一个过程，其中，取决于許多方面的因素，例如，积累的分配和使用是否合理，特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等等，都有直接的联系。往往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了积累，但不一定就是扩大再生产。有的同志还指出，增产节约只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但有增产节约，并不一定就是扩大再生产。特别是那些經濟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互交错的生产部門，往往由于偶然的因素而使产量增加，并不一定就是扩大再生产。还有人补充說，把非积累因素，归結为增产节约是不科学的。持这些意見的同志认为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尺度还是要从生产周期的終点、从生产的结果，即从使用价值方面，或从使用价值和价值方面来判断是不是扩大再生产，才是恰当的。

討論会最后还討論了积累的源泉問題。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看法，他們认为，承認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两个源泉的观点本身，并不必要区别积累是来源于剩余产品还是非剩余产品。因为从上一年度来看，不論是通过积累来源扩大的再生产，还是通过非积累来源扩大的再生产，其結果仍然要在社会总产品中表现为补偿产品部分、必要产品部分和剩余产品部分；如果从本年度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来看，那又不外分为积累来源的部分和非积累来源的部分。而认为必須把剩余产品和非剩余产品区分开来的同志所提出的非剩余产品的三个源泉：其中第一个来源指节省了的补偿基金，是和非积累来源相重复的；第二个来源指通过积累把消費基金轉为积累基金以及第三个来源指人民公社社員不参加消費品分配的基本建設用工，国家干部、职工所作的生产性义务劳动，倒可列入非积累的来源当中，而充实其內容。（鳴）

学术研究

一九六四年第三期（总第十五期）六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0.50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